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8年第4期 总第24期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8 年第 4 期 • 总第 24 期)

顾问: 叶兴国 李邦君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谢丹迎 王群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谢 蓉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05 月权威视点.....1

05 国际观察.....4

国内运行分析: 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8

二、金融动态

全球通胀形势愈显严峻.....20

“越南诱发金融危机”真相 大摩报告始作俑者.....21

中国需警惕热钱危机.....23

人民币升值放慢的意味.....24

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 如何? 26

中国应救助越南 27

改进金融服务可解融资困境.. 31

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渐成“双刃剑” 32

中国流动性之忧.. 33

中国股市为何暴跌? 34

准备金率再度上调 1 个百分点 显央行从紧货币政策决心..... 34

亚洲各国采取措施抑制通胀. 35

三、商务英语动态

Teaching for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a Focus on Conversational Routines.....36

Using TV Commercials in ESL/EFL Classes 45

Colloquial American Business Jargon Defined.....50

四、法学动态

最高检公安部权威解读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补充规定.....52

金融监管竞争、冲突与协调——兼论我国混业经营监管的制度选择....53

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61

中国法学教育的结构失调及对策.....65

五、高教动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年度项目招标公告.....6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08 年度课题招标公告.....68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与当代高水平大学的使命.....69

中南大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75

暨南大学全国首开应急管理专业.....76

国内高校主办的首份综合性人文社科英文刊创刊.....76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成立.....77

周济: 使高校思政课成为让大学生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78

李卫红: 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是思政教育生动教材.....78

建立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机制.....79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变迁及其未来趋势——以美国大学为例..... 82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本期要目

- 05 月权威视点
- 05 国际观察
- 国内运行分析
边际保护、加权福利
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2008年6月

第4期[总第二十四期]

05 月
权威
视点

梅新育：警惕热钱大规模回流风险

热钱正在成为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热钱进入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推高资产市场的泡沫。而如果热钱出现大规模回流，则可能给我国金融秩序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走势逆转的风险主要来自资本流动方向逆转，而资本流动方向逆转的潜在风险又来自以下两个基本机制：美国次贷危机传染，以及国际游资认为中国大陆汇率和资产市场收益到顶而套现，在华外资企业积累了巨额留存收益、海外游资主体借贷投入中国市场等因素又将强化这两个基本机制的冲击力。”梅新育说。

梅新育认为，次贷危机正在继续深化，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如果海外机构投资者、外资企业等为了弥补总部损失而大举出售在华资产，把资金调回母国，人民币汇率将受到沉重的向下压力。

梅新育认为，尽管我国经济目前因人民币升值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一旦人民币汇率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同样要蒙受严重冲击。因此面对热钱挑战，除了强化监管之外，还需要坚决拒绝一次性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防范因人民币升值周期到顶热钱迅速套现回流的风险。

点评：自从2002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兴起以来，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中国大陆楼市、股市等资产市场。然而，目前中国楼市已风声鹤唳，股市也出现大幅波动，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也意味着日益逼近这一轮升值周期的顶点。不少海外游资主体实际上是借贷投入中国市场，如果危机深化导致其偿债能力削弱，他们将很有可能不得不加快抛售中国资产套现回流。

郎咸平：中国经济过热是局部效应

“当前的中国经济并非过热，而是地产、钢铁、基础建设等局部过热，制造业等大部分领域面临过冷。”经济学家郎咸平5月8日在出席交通银行百年庆典时表示，目前决策层针对经济过热的系列宏观调控应避免一刀切。

郎咸平表示，决策层对当前经济的判断有失偏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货币政策定调由“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并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明显通胀列





为首要任务。对此，郎咸平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并非过热，因此一刀切的“从紧”政策并不合适。

郎咸平说，当前和地方GDP相关的行业确实呈现过热，比如地产、钢铁、水泥、银行、证券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而大部分制造业却面临过冷。更为让人忧心的是，决策层眼下的宏观调控措施可能加剧这一分化，使得过热行业更热，过冷行业更冷。

郎咸平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宏观调控会产生三种情况：

第一，从紧定调下，政府严格控制信贷，致使银行收紧对过冷部门的信贷投放，从这些行业抽离资金投向本身已经过热的基础建设；

第二，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使得应投资实体经济的资金被抽回，转而投向已经过热的楼市、股市；

第三，由于制造业利润率已经极低，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开发地产，出现“海尔现象”。

这三种情况都显示，宏观调控加剧了资金从过冷行业流向过热领域。郎咸平建议，决策层应采用“温补之术”，要对冷热行业分开处理，鼓励那些过冷的制造业，压抑眼前过热的少数行业。

吴敬琏：目前不能管制物价 调高准备金率回报很低

“目前的经济情况，最不能做的就是管制或者冻结物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5月14日在上海称，“有舆论说，燃油不能涨价，涨价会推动通胀。但资源价格太低正是造成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吴敬琏还表示，刚刚发生地震事件对经济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说：“我们的经济体以及经济总量很大，所以这些事件的影响是有限的。”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央行准备用各种手段，选择不同的目标来处理目前的经济问题。吴敬琏表示，央行目前使用的办法“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而这些副作用最主要表现在对于商业银行的运营造成的困难。“央行发行票据、调高准备金率等措施把一部分流动性给冻结了，而这些措施回报是很低的。”

吴敬琏认为，货币要紧缩固然是目前解决的方案之一，但人民币汇率要加快升值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他还提出，在人民币升值后，国家可以采取相应的财政手段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税就可以是其中之一。

万季飞：防污染产业和不合格产品向中国转移



在5月16日举行的中国生态文明与绿色竞争力国际论坛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表示，国际贸易的环保化乃大势所趋，中国需将环保纳入经贸发展战略，建立以生态文明为中心的绿色增长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要防止国外污染产业和不合格产品向中国转移。

万季飞说，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提升，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创造商业价值，还可以尽量避免由环保引起的贸易纠纷。





他说,只有实行绿色生产、绿色管理和绿色销售,才不致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因为,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提高,只有绿色产品才能迎合人们的消费需求,而且,绿色产品和绿色消费的兴起也会进一步优化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对此,在本次论坛上,与会的各方代表共同签署了一份国内外企业绿色行动的倡议——《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竞争力北京宣言》,承诺将改进生产工艺,防止对环境的污染,生产绿色产品,提升自身的绿色竞争力。

龙永图:应更关心和注重打造软实力

在黄山召开的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呼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不仅要关心硬实力发展,应更关心和注重打造软实力。

龙永图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就是这个国家的对外亲和力和影响力。他认为,在国际上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有一种怀疑感。如何打造中国在全球的良好形象,塑造中国能够影响世界进程的软实力,这变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

龙永图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多年来雄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怎么样打造中国的软实力”上。

他表示,打造软实力首先要靠文化吸引力。善待他人,善待周围的自然环境。其次要建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降低政府的服务成本。此外,建立一个现代商业信息体系平台,发展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在内的专业服务,建立一整套专业服务队伍,也都是打造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樊纲:救灾不是调整从紧货币政策的理由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抗震救灾不应成调整宏观政策理由,我们反倒要看到这种灾难对经济活动加速的影响,而不是要调整经济政策、放松宏观政策。

樊纲认为,自然灾害要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非典那样的灾难,它没有毁坏物质财富,但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健康。从对 GDP 影响的角度看,会降低人们的需求,从而降低经济的活跃程度,也就降低了 GDP 的增长。

另一类是像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它的特点是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并毁灭了大量物质财富,这种灾害毁掉了过去积累起来的很多东西。因此,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会带来大量的物质需求,并需要大量的建设,会加快 GDP 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樊纲表示不同意一些说法,认为现在要抗震救灾,就要放松或调整宏观政策,我们可以有别的理由来讨论是否要调整宏观政策,但抗震救灾本身不是调整货币政策的理由。

点评:此前,由于本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 8.0 级地震,给当地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有市场人士指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应适当松动。





张威：外贸总额三分之二来自 APEC 成员

在 2008 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主办的第三届亚太地区文化用品行业经贸合作论坛上，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副主任张威介绍了她以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为基础计算得出的结论。2007 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贸易额达到 14671.9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67.5%。其中，出口额为 7762.9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 63.7%，进口额为 6909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 72.1%。

此外，亚太地区也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2007 年，来自亚太经合组织 11 个主要成员对中国的实际投资总额达到 437.6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58.5%。

张威分析说，目前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具有一定机制性的合作；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在内的论坛性的合作；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等在内的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合作。

张威说，目前中国对外谈判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显示出亚太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签署，不仅带来了贸易转移、贸易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竞争促进效应等，对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世贸：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 5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评估报告》指出，过去 2 年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外资政策继续发挥作用，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 10%，但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份报告是在世贸组织开始对中国进行两年一度的贸易政策审议之际发表的。报告说，持续的贸易自由化一直是中国长期结构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略的目的是建立外向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促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减少贫困。

报告说，过去几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断增长，2004 年为 1490 美元，2006 年则超过 2000 美元。与此同时，每日生活费在 1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 10% 左右。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和贫困人口减少充分证明，使自由贸易和外资政策与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结合起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05 月

国际
观察

通胀恐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近日，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在 5 月 24 日举行的国际资本市场论坛上，经济学家们纷纷表达了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此外，他们还担心美国经济下滑将影响欧洲和亚洲的经济。经济学家们还预测未来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凹陷形”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费达翰表示，在原油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刺激下，今年全球通胀增长还将维持较高水平。





费达翰指出,一方面,中国、印度、中东等新兴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据IMF统计,2001年到2007年,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对石油的需求量已达到全球总量的56%。生物能源的兴起也推高了粮食价格。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和利率下调使得商品存货成本下降,商品的流动性提高。这些因素叠加将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雷曼兄弟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休伯罗曼则认为,由于原油价格高企,本月通货膨胀率在亚洲地区将有可能更高。亚洲通胀持续的概率大概有25%。他同时批评了目前亚洲地区有些国家控制食品和原油价格的做法。指出这样将会增加政府补贴开支、原材料需求和企业成本。这一系列连带性结果也将影响亚洲的出口和内需,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联合国拟订综合性战略应对粮食危机

5月12日,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工作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首次闭门会议,讨论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策略问题。主持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将制订一项综合性战略,帮助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渡过危机。

潘基文在会后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此次会议的重点是“为应对食品价格危机所带来的挑战而制订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这项战略预计将包括短期和长期所应采取的行动,例如提供粮食援助、社会保障倡议和促进农业生产等。

潘基文说,工作组将把这项战略的要点提交给即将于6月初在罗马举行的粮食问题高级别会议。工作组总协调人、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霍姆斯将与会员国政府就此进行协商,工作组也将在必要的情况下再次召开会议。工作组希望世界各国确保其在粮食出口等方面所制定的政策不会进一步加剧当前的粮价上涨,并确保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粮食供应不受阻碍。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发达国家应向受粮价上涨冲击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还呼吁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立即履行承诺,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5亿美元紧急援助资金。

点评:高涨的粮食价格正掀起一场全球危机。当前全世界的食品价格上涨了约40%,这种发展态势正使得全球约1亿人陷入危机,其中贫困国家和地区的贫困人口受到的冲击更大。

分析人士指出,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高涨引发全球性通胀,不排除未来出现全球性滞胀的可能性。这次粮食价格的上涨不论是一次性上涨还是持续上涨,或都会持续一两年的时间。在上世纪70年代,当国际粮食库存达到最低水平以后,曾出现全球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

彭博调查显示全球投资者信心逐渐恢复

根据彭博社最新调查,5月份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两个月来持续提高,这或暗示着全球信贷危机的艰难阶段已经过去。

彭博职业全球信心指数从4月份的14.5提高到5月的22.7。以往的经验表明,信心指数在50以下表明投资情绪消极,而3月份该指数曾经下探到13.1。





美国受访者的调查显示,人们正在降低对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期望,对于美元前景更加乐观。截至目前,美元对欧元汇率已经从4月22日最低点1美元对1.6019欧元上涨了3.7%,美国经济的信心指数也从10.6攀升到15.7。

亚洲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全球经济信心乐观程度明显提高,测量值从11.0上升到21.0,增长近一倍,表明亚洲这个拥有较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地区之中,投资者对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寄予更多的期待。亚洲地区的经济信心指数从33.7上升到37.3,增幅虽然不大,但近2个月来,MSCI亚太综合指数已经从3月17日的阶段底部向上攀升了15.18%。

另外,在日本的调查中,测量值从13.9上升到18.7,而日经255指数近2个月获得了20.91%的上涨空间。

与此同时,欧洲的调查数据略显悲观。其中,西班牙持续10年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在所有的调查参与者中,西班牙的被调查者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表现得最为消极。

特里谢:物价稳定是首要问题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5月19日警告称,目前信贷危机尚未见底,全球正在经历一场持续而重大的市场调整,维护物价稳定是目前全球各经济体的首要任务。

特里谢表示,控制通胀是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好方式。决策者需将控制通胀作为重中之重。特里谢指出,因原油与食品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压力正在上升,且极具风险性和挑战性。特里谢同时警告称,由于能源和价格持续上涨,存在发生第二轮通胀效应的可能性,政府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

特里谢将当前物价状况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的物价进行了比较,并表示,此次将采取强硬立场,以避免当时欧洲出现的大量失业情况再度发生。特里谢认为,中长期内物价稳定、通胀和经济增长间关系并不平衡,而物价稳定是首要问题。对于维护物价稳定的问题,特里谢表示,全球普遍认同维持中期物价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实现该目标的可能性。在通胀压力下,欧洲央行必须保持中长期物价稳定。

此外,特里谢重申,目前信贷危机带来的问题尚未过去,全球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且非常重大的市场调整。上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全球经济从次贷危机中康复将需要一段时间。而德国银行CEO阿克曼则认为,虽然次贷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但已近尾声。

点评:欧元区仍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前的通胀水平不容乐观。数据显示,因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欧元区3月通胀率达到3.6%这最高历史纪录。4月欧元区通胀率虽回落至3.3%,但仍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上限水平。

欧盟拟改革休耕和农补制度

为应对高粮价的挑战,欧盟委员会5月20日提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草案,试图通过放宽增产限制和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增加产量。

这份提交给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审议的草案指出,在短期内可通过修改共同农业政策增加产量,并严密监控零售行业,确保零售商公平竞争,遵守市场规则。





根据该草案,欧盟将彻底废弃实行了16年的强制休耕规定,并逐步提高牛奶生产配额,直至2015年3月底完全取消。欧盟1992年决定,要求农场主每年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土地闲置,不得耕种,休耕比例在2000年被固定为10%。此举原本是为了避免生产过剩,但随着近年来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欧盟成员国去年下半年已决定暂停实行休耕令一年。

此外,该草案还要求今后欧盟每年400多亿欧元的农业补贴进一步与产量脱钩。不再根据产量的多少来决定农场主领取的补贴数额,而是综合考虑环保、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等因素。同时,欧盟委员会还提高了申请欧盟农业补贴的“门槛”,削减大农场主的农业补贴,以降低发放补贴的成本。

点评:同一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也就粮食问题召开会议。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发达国家停止农业补贴。他说,发达国家目前仍在发放巨额农业补贴,造成发展中国家那些最贫穷的农民收入大大减少,这是“不可接受的”。

近年来,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频遭诟病。美国民主党智库专家、哈斯商学院教授 Laura D'Andrea Tyson 表示,美、日、欧每年的粮食补贴占到了整个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区总的农业收入的75%。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必须要对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改革。

拉美国家竞争力处于中下游水平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日前发布的2008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拉美国家的竞争力普遍处于中下游水平,而且大部分国家的排名和去年相比有所下降。

今年的报告涵盖了55个经济体,智利是拉美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国家,名列第26位。紧随其后的秘鲁排在第35位,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列第41位、第43位、第50位和第52位,委内瑞拉则在55个经济体中连续第三年排名垫底。

和去年的排名相比,巴西的竞争力从第49位上升到第43位,进步最为明显。拉美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智利的名次没有变化,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排名下降了三倍,阿根廷的名次也下降了一位。另一个拉美国家秘鲁去年没有参加排名,因此今年的排名和去年相比没有可比度,但是秘鲁的国际竞争力超过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经济大国,让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意外。

点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是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主要经济体经济竞争力的年度研究报告,自1989年起每年发表一次。这项报告根据4个大指标及其下属的300多个小指标来进行竞争力评估。4个大指标分别是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



第二季度美经济前景“令人忧虑”

五月初,美国公布了一系列经济数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状况“依然疲弱”。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仍不乐观,家庭和企业开支受到抑制,就业市场进一步走软,金融市场仍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信贷紧缩形势和住房市场收缩加剧可能对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0.6%，与去年第四季度持平，高于市场预期的0.2%。不过，约占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二的个人消费开支当季仅增长1.0%，增速低于前一季度的2.3%。此外，作为次贷危机导火索的美国住房市场尚无回暖迹象，第一季度住房市场投资降幅高达26.7%。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人数也显示，美国4月份就业人数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不过降幅远远低于之前几个月，这或许意味着经济在经历了数月的停滞之后或已开始起步。美国4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2万人，4月份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至5%。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表示，尽管能源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经济不利，不过美国经济长期基本面相当坚实，目前没有滞胀迹象。保尔森表示，目前正集中精力使现有的经济刺激计划迅速传递给消费者并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无实施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的打算。

来源：国研网

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作者：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尹翔硕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

国内 运行 分析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耐人寻味地表现了美国政府保护落后夕阳产业的行为，传统的经济贸易理论很难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更多的文献从政治角度分析原因，但夕阳产业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假设似乎也很难成立。本文的研究顺延政治原因的线索，但不同的是笔者给出了政治决策一个更好和具有可信度的微观基础。即从效用理论“一元不等于一元”定律出发，提出和定义了“边际保护”的思想，该思想直接引致政府的福利加权计算，从而影响贸易政策偏向于保护夕阳产业，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

关键词：边际保护，加权福利，贸易摩擦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并且出口额在2006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如果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2008年我国的贸易总额将会超过德国而位居第二位，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超过美国。然而，与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相比，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情况也是毫不逊色。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特保及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并成为全球贸易的焦点。这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最引入关注，原因之一是美国是我国的最大贸易国，也是最大顺差国，中美贸易直接关系我国对外贸易的生死存亡；原因之二在于美国也是我们的主要贸易摩擦国，理所应当的会受格外关注。然而，我们知道，要解决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首要的必须找到摩擦的原因，这样才能够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国内外很多文献研究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国外方面，文献基本从保护主义的动机出发，指出贸易一方的贸易保护行为导致了摩擦的产生，这些文献大多从一般性角度研究问题，较少只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具体分析。如 Sturm 在他的论文“产品标准、贸易争端和保护主义”





中指出,贸易进口国总是倾向于制订较高的标准,以保护国内产业,结果就是贸易争端不断;Yoshimatsu 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动因。他的结论是,保护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动机是贸易摩擦的原因,且摩擦的程度与两国间产业相互关联程度相关;Bown 就 GATY 框架下保护主义导致贸易争端的事实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报复性心理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可以解释贸易争端的存在;Irwin 和 Pavcnik 分析了空中客车和波音两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文章在假定离散选择、差别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分析两家航空公司的竞争行为,同时估测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争端情形,发现两家企业对于政府的游说和寻租行为导致了贸易争端的产生和激化;Baron 的文献总结和归纳了企业行为对于贸易摩擦形成的影响,论文以柯达和富士胶卷的竞争为例,研究了企业的综合竞争策略(包括市场策略和非市场策略)与国际贸易争端的产生,作者指出,正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综合竞争策略向本国政府寻求保护的寻租行为导致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争端。

国内方面,基本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归咎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石磊、寇宗来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不对称,从而贸易摩擦不断;陈泰锋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卧;胡静寅指出经济民族主义是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政治方面,李丽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引起了贸易摩擦;查贵勇、高凡也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性原因。

以上的文献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犹如国外文献指出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总体来说也是美国的一种产业保护行为,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但让人费解的是,中美贸易基本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型贸易,我国出口美国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对于这样一种美国的夕阳产业,为什么还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如此重视,千方百计地去保护呢?保护落后肯定对于美国经济总体来说是不利的,同时这些夕阳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也不应该会有很大的政治游说力量,那么政府的保护又是源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揭示的问题。

二、中美贸易及摩擦现状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统计数据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一致的趋势是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快速增长,且中国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这也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频繁不断的一个原因。





表 1

1984—2006 年中美及美中进出口贸易基本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美中贸易(美国数据)			中美贸易(中国数据)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1984	3 004	3 381	-337	2 313	3 837	-1 524
1985	3 856	4 224	-368	2 336	5 199	-2 866
1986	3 106	5 241	-2 135	2 633	4 718	-2 085
1987	3 497	6 910	-3 413	3 030	4 836	-1 806
1988	5 017	9 261	-4 244	3 399	6 633	-3 234
1989	5 807	12 901	-7 094	4 414	7 864	-3 450
1990	4 807	16 296	-11 489	5 314	6 591	-1 277
1991	6 287	20 305	-14 018	6 198	8 010	-1 812
1992	7 470	27 413	-19 943	8 599	8 903	-304
1993	8 767	31 183	-22 416	16 976	10 633	6 343
1994	9 287	41 362	-32 075	21 421	13 977	7 444
1995	11 749	48 521	-36 772	24 744	16 123	8 621
1996	11 978	54 409	-42 431	26 731	16 179	10 552
1997	12 805	65 832	-53 027	32 744	16 290	16 454
1998	14 258	75 109	-60 851	38 001	16 997	21 004
1999	13 118	81 786	-68 668	41 946	19 480	22 466
2000	16 253	100 063	-83 810	52 104	22 363	29 741
2001	19 234	102 280	-83 046	54 300	26 200	28 100
2002	22 053	125 167	-103 115	69 959	27 227	42 731
2003	26 806	151 620	-123 960	92 510	33 882	58 628
2004	34 721	196 699	-161 978	124 973	44 652	80 321
2005	41 836	243 462	-201 626	162 938	48 734	114 204
2006	51 624	287 052	-235 428	203 516	59 222	144 294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商务部网站数据 <http://www.mofcom.gov.cn>;美国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贸易统计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

再看看美中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以服装、鞋帽、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在美国这样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是处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快地淘汰这些产业是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夕阳产品对美国出口,受到了越来越强的贸易摩擦阻碍,从贸易理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说,保护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事实却是中美贸易摩擦匪夷所思的喋喋不休。

表 2 是近年来美国向 WTO 提出的贸易争端申诉情况,表 3 是我国入世以来美国对我国发起特保措施的案例情况。另据 WTO 网站的贸易争端统计资料显示,从 WTO 成立以来至 2007 年 4 月底,美国作为申诉国共提出了 88 项争端案件,而作为应诉国共被提出 97 项案件;其中,中国向 WTO 提出的美国贸易争端案件 1 项(DS252),美国则提出关于中国的贸易争端案 5 件。这些中美贸易争端案件中,美国基本都是针对我国对其出口较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出的,这无不显示了其贸易保护的动机。





表2

2000—2007年美国向WTO申诉的贸易争端情况

年 份	申诉 总数	对中国 申诉量	对中国申诉具体情况		
			编号	时间	事 件
2000	8	0	—	—	—
2001	1	0	—	—	—
2002	4	0	—	—	—
2003	3	0	—	—	—
2004	4	1	DS309	2004/3/18	集成电路增值税问题
2005	1	0	—	—	—
2006	3	1	DS340	2006/3/30	对其汽车部件进口的措施
2007(1—4月)	4	3	DS358	2007/2/2	中国的出口退税、税收减免以及其他出口补贴措施
			DS362	2007/4/10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DS363	2007/4/10	视听、娱乐产品和出版物的贸易及销售权利

资料来源:根据WTO网站贸易争端数据整理 <http://www.wto.org>

表3

入世以来美国对我国发起“特保条款”案例一览

时 间	案 例	备 注
2002年8月21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原产于中国轴承传动器展开特别保障措施调查	入世首例特保措施调查
2003年2月18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原产于中国的钢丝架特别保障措施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	2003年4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拒绝了该项建议
2003年9月9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球墨铸铁供水配件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	—
2003年11月18日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针织布、文胸及睡衣启动特别保障措施,设定7.5%的增长限额	—
2004年12月1日	美国纺织品执行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人造长纤维物(第620类)进行特别保障措施立案调查	该申请由美国纺织品团体协会、美国国家纺织协会和“团结起来”美国劳工组织提出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17]

2007年1—4月,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这些受调查的产品也基本都是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或者是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业处于全球分工链的底端,由我国来生产和供应对于世界总福利的提高是有益的,但美国还是会以贸易摩擦的形式进行保护。从2004—2007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总量以及针对中国的调查案件数来看,我国受调查的案件数几乎占到了总数的1/2。美国之所以没有把摩擦的矛头瞄准和具有同种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而却把摩擦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虽然说这可能有对我国贸易量大的缘故,但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具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倾向。为了解释该现象,以下将提出笔者的猜想和证明。

三、边际保护、加权福利与摩擦的形成

实际上,现有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原因的文献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解释美国保护落后夕阳产业的原因。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我国出口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其原因肯定是该项措施能够增加美国的福利,至少是能够增加美国政府的福利,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政治性原因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考虑到夕阳产业在美国应该是一个弱势群体,这就决定了很难让人想象他们会具有如此大的政治游说力量。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美国政府制定保护落后产业的政策措施,笔者以为这是加权福利和不同群体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化力量在起作用。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边际保护”(Marginal Protection)的概念。所谓边际保护,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对于现象的描述,也说明了其背后的原因。首先,边际保护可以理解成是对夕阳产业的保护,因为边际产业本身就是落后夕阳产业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际保护的概念是对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现象描述。其次,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说当我们持续消费同一件物品时,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量,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增加程度是递减的。按照这种原则,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来说,个体收入的基本平均就会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的总福利,而收入的差距过于极化不利于总福利的提高。正是这样的原因,一国政府往往会更多地关注穷人和低层次劳动力的利益和收入状况,因为他们的“一元”能够产生比富人的“一元”大得多的总福利,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一元不等于一元”命题。由此,政府往往就会更多地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美国夕阳产业的从业人员一般应该相对是低收入群体,对于他们的保护也就无可厚非,从而美国保护落后产业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边际保护的概念还有保护收入边际效用较高的群体所在的产业的含义,揭示了贸易摩擦的原因。

加权福利的概念也是起源于福利经济分析,它的起初构想应归功于 Harberger,是指在经济政策中,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明确地将分配问题考虑在内,应用分配加权,从而使一元钱对富人的价值少于对穷人的价值。加权福利的思想后来又被运用到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成为加权的福利贸易政策。该观点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对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计量,但由于每一元的得益或损失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一样,所以在计量中不同集团的权数就不同,有的较大有的较小。结果,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就导致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偏爱的集团倾斜。在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政府政策的偏向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政策往往偏向低工资工人;有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政策常常有利于城市工人而不利于农村。

至此,笔者的思路就已经非常的清晰,由于夕阳产业工人处于低收入层次,对于他们的保护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总体福利,所以政府的边际保护想法促使他们在进行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时,给予夕阳产业利益更大的权数,这样加权福利结果得到的政策就是挑起贸易摩擦和争端,抑制他国的出口,保护本国产业。笔者用图1来描述该贸易摩擦形成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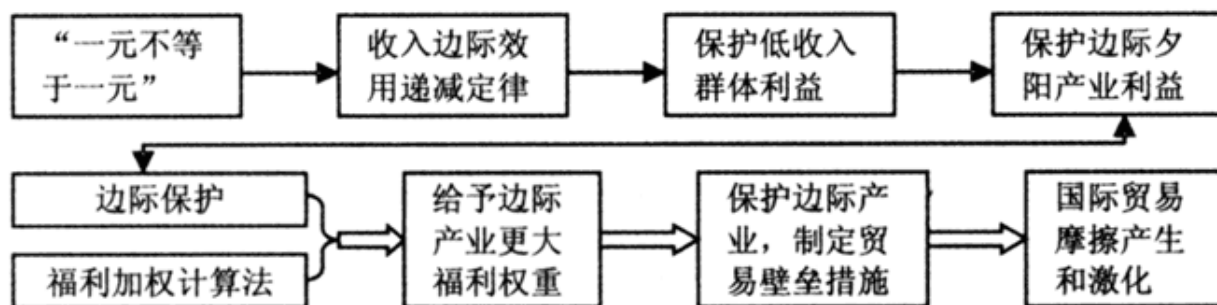


图1 边际保护、加权福利引致贸易摩擦的机制



四、模型分析

笔者的模型借鉴 Brander 和 Spencer 以及 Bagwell 和 Staiger 的方法,不同的是,由于分析的需要,笔者将舍弃三国模型,而建立两个国家,一种商品的局部均衡模型,同时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模型中引入边际保护参数。笔者假设两个国家为本国 H 和外国 F,两国各有一个代表性厂商 h 和 f,它们生产一种同质产品,两个代表性厂商是一种竞争关系(没有合作),其中厂商 h 在生产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它向 F 国出口,两个厂商在 F 国市场上竞争。由于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结构环境,两个代表厂商均不能控制该同质产品的世界价格。笔者以上所作的假设基本是根据我国向美国出口贸易的情形来确定的,这样推导的结果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一般地,笔者设定厂商 h 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 $Q(P_h)$ 和 $\Pi(P_h)$, 这里 P_h 表示 H 国出口到 F 国的产品价格,同时也表示该类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同理,设定厂商 f 的供给和利润函数为 $Q(P_f)$ 和 $\Pi(P_f)$, 这里 P_f 表示 F 国国内该商品的价格。笔者再假设 F 国对于该产品的需求函数是 $D(P_f)$, 这里的 P_f 是 F 国国内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函数的基本定律,有 $D'(P_f) < 0$ 以及 $Q'(P_f) > 0$ 和 $Q'(P_h) > 0$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构下,应该有 $P_h = P_f$, 但笔者假设, F 国出于保护本国边际产业,会采取一定的贸易措施,制定贸易壁垒 τ , 假定这是一个大国模型,则该贸易壁垒使 H 国出口价格下降,而使 F 国国内价格上升,也就是 $P_f = P_h + \tau$, 这里 $\tau \geq 0$, 如果 $\tau = 0$, 则表明 F 国没有设立贸易壁垒,也就是没有贸易摩擦。这样,在局部均衡框架下,令厂商 h 的产品全部是用来出口的,所以有以下的市场出清条件:

$$D(P_f) = Q(P_h) + Q(P_f) \quad (1)$$

由以上的出清条件(1),在大国模型下可知 H 国的市场出清价格 $P_h^*(\tau)$, 且有 $P_h^{**}(\tau) < 0$, 即贸易壁垒 τ 越大, 价格 P_h^* 越低。而 F 国的市场出清价格为 $P_f^*(P_h, \tau) = P_h(\tau) + \tau$, 显然 τ 越大则 P_f^* 越高, 即 F 国的商品价格随着该国贸易壁垒的强度增加而递增。

为了使分析更加易于理解和方便,笔者遵照 Bagwell 和 Staiger 模型的方法,引入一个具体化的函数例子,这样可以使笔者以下的均衡分析有一个具体的解析形式。该具体化的函数是从一般均衡结果推导出来的,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是 $Q = (L)^{1/2}$, 这里 L 是劳动,再假设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且劳动工资为单位量 1, 这样厂商的最大化行为由以下规划确定:

$$\begin{aligned} \max \Pi &= P \times Q(P) - wL = P \times Q(P) - Q^2(P) \\ \text{F. O. C} &\Rightarrow \frac{\partial \Pi}{\partial Q} = P - 2Q = 0 \Rightarrow Q = \frac{P}{2} \Rightarrow \Pi(P) = \frac{P^2}{4} \end{aligned} \quad (2)$$

再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 (C - C^2 / 2) + N$, 这里 C 和 N 分别表示贸易商品的消费量和基准商品 (Numeraire Good) 的消费量, 这样, 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形式为:



$$\begin{aligned} \max U &= \frac{C - C^2}{2} + N \\ \text{s. t. } P \times C + N &= wL = L = Q^2 = \frac{P^2}{4} \end{aligned} \quad (3)$$

由(3)式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D(P) = C(P) = 1 - P \quad (4)$$

所以笔者有以下具体形式的函数:

$$\begin{cases} D(P_f) = 1 - P_f \\ Q(P_h) = \frac{P_h}{2}, \Pi(P_h) = \frac{P_h^2}{4} \\ Q(P_f) = \frac{P_f}{2}, \Pi(P_f) = \frac{P_f^2}{4} \end{cases} \quad (5)$$

上式(5)中,笔者没有把两个企业f和h的比较优势状况区分开来,这样的假设下似乎两个企业是对称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笔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国国内贸易政策制定,而不用将分析集中于两个企业的收益多少,故而为了分析方便,假设了对称的企业,这不会影响分析结论。再由市场出清条件(1),可以进一步计算出:

$$\begin{cases} P_h^* = \frac{1}{2} - \frac{3}{4}\tau \\ P_f^* = \frac{1}{2} + \frac{1}{4}\tau \end{cases} \quad (6)$$

要让贸易能够开展,必须满足 $P_f^* > P_h^* > 0$,所以 $0 \leq \tau < 2/3$ 。笔者再来分析政府对于福利的计算方法,假设F国政府在计算本国福利时,认为本国边际产业工人收入的边际效用高于其它产业,所以出于边际保护的目的,他们会采用加权福利算法。受到Baldwin以及Grossman和Helpman以及Bagwell和Staiger政治经济变量引入法的启示,笔者引入加权福利变量 β ,这样两个国家政府的福利函数分别为:

$$\begin{cases} W_F(P_f, \tau) = \beta \Pi(P_f^*) + \int_{P_f^*}^1 D(P) dP \\ \quad + \tau Q(P_h^*) \\ W_H(P_h, \tau) = \Pi[P_h^*(\tau)] \end{cases} \quad (7)$$



这里,笔者只取了一个加权福利参数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其大小表现了政府对于厂商收益的关注程度和边际保护动机的强弱。而由于边际保护的存在,政府的福利计算中肯定会给予厂商的福利更大的权数,也就是 $\beta \geq 1$,当 $\beta = 1$ 时,表示政府没有给予该边际产业保护,而如果 $\beta > 1$,则边际保护存在。式(7)中,笔者认为F国的总福利包括三块, $\Pi(P_f)$ 是厂商的收益, $\int_{P_f}^1 D(P) dP$ 是消费者剩余收益,而 $\tau Q(P_h)$ 表示由于F国的贸易壁垒带来的政府转移收益。将以上(5)和(6)式中的具体函数代入(7)式,可以计算出以下结果:

$$\begin{aligned}
 W_F(P_f^*, \tau) &= \beta \Pi(P_f^*) + \int_{P_f^*}^1 D(P) dP + \tau Q(P_h^*) \\
 &= \left(\frac{1}{2} + \frac{\beta}{4}\right) P_f^{*2} - P_f^* + \frac{1}{2} + \tau \frac{1}{2} (P_f^* - \tau) \\
 &= \left[\left(\frac{1}{2} + \frac{\beta}{4}\right) \times \frac{1}{16} - \frac{3}{8}\right] \tau^2 + \left[\frac{1}{4} \times \left(\frac{1}{2} + \frac{\beta}{4}\right)\right] \tau \\
 &\quad + \left(\frac{1}{4} + \frac{\beta}{8}\right) \\
 W_H(P_h^*, \tau) &= \frac{P_h^{*2}}{4} = \frac{1}{4} \left(\frac{9}{16} \tau^2 - \frac{3}{4} \tau + \frac{1}{4}\right)
 \end{aligned} \tag{8}$$

第一,我们来看纳什均衡结果。

这里纳什均衡的结果就是F国政府根据其自身福利的最大化,选择和得出最优的贸易壁垒程度,由此决定了本国市场商品的价格以及H国的出口价格。即:

$$\begin{aligned}
 \max W_F(P_f^*, \tau) &= \max \left\{ \left[\left(\frac{1}{2} + \frac{\beta}{4}\right) \times \frac{1}{16} - \frac{3}{8}\right] \tau^2 \right. \\
 &\quad \left. + \left[\frac{1}{4} \times \left(\frac{1}{2} + \frac{\beta}{4}\right)\right] \tau + \left(\frac{1}{4} + \frac{\beta}{8}\right) \right\} \\
 \text{F. O. C} \Rightarrow \frac{\partial W_F}{\partial \tau} &= \left[\left(\frac{1}{16} + \frac{\beta}{32}\right) - \frac{3}{4}\right] \tau + \left(\frac{1}{8} + \frac{\beta}{16}\right) = 0 \\
 \Rightarrow \tau^* &= \frac{4 + 2\beta}{22 - \beta}
 \end{aligned} \tag{9}$$

同时,要使F国能够获得最大的福利,还必须要满足二阶条件,也就是:



$$\frac{\partial^2 W_F}{\partial \tau^2} < 0 \Rightarrow \frac{\beta + 2}{32} - \frac{3}{4} < 0 \Rightarrow \beta < 22 \quad (10)$$

以上笔者已经计算出了均衡状态下F国将选择的贸易壁垒强度,由上式,很显然,当 $\beta = -2$ 时,F国将选择自由贸易,不再设立贸易壁垒,这个结果似乎有悖常理,其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比较厌恶该类产业的存在,或者说该产业是一种污染环境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业,抑或这种产业已经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政府会给予其-2的权数,政策选择就是引入完全竞争,让其走向破产。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 $\beta = 1$ 时,也就是政府没有边际保护的动机时, $\tau^* = 6/21$,说明政府天然就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激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笔者的模型设计不够准确。但无论如何,显然根据(9)式有以下的结果:

$$\frac{\partial \tau^*}{\partial \beta} = \frac{48}{(22 - \beta)^2} > 0 \quad (11)$$

这意味着, τ^* 随着 β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 β 的降低而降低,即如果政府的边际保护动机越强,则实际的贸易壁垒强度越大,也就是贸易摩擦越剧烈。至此也就说明了,边际保护的动机引致加权的福利计算方法,又导致了贸易摩擦,或者是引致了贸易摩擦的加剧。(10)式中,笔者得出 $\beta < 22$,否则贸易壁垒 τ^* 的值就为负,为负的含义是政府对于进口进行补贴,这可能的情况是该产品对于F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即使给予本国厂商很高的福利权数,但其供应还是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所以必须通过进口补贴来激励进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不存在的,就像 β 一般来说也不会太大一样。笔者将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结果用表4来列出。

表4 β 不同取值下的纳什均衡结果

均衡	τ^*	P_I^*	$Q(P_I^*)$	WF^*	解释
$\beta = 1$	$\frac{6}{21}$	$\frac{3}{42}$	$\frac{3}{84}$	$\frac{45}{112}$	政府在没有加权保护动机时,也会选择保护本国产业,引起贸易摩擦
$\beta = -2$	0	$\frac{1}{2}$	$\frac{1}{4}$	0	在政府厌恶本国厂商存在,给予-2的权数时,该国不会制定贸易壁垒,没有贸易摩擦,也没有福利
$\beta > 22$	< 0	> 0	> 0	> 0 或 < 0	当政府给予厂商福利非常大的权数时,本国国内供给反而不足,必须通过进口补贴来满足国内需求。该情况一般不存在,可以排除
$1 < \beta < 22$	$\frac{4 + 2\beta}{22 - \beta}$	$\frac{12}{22 - \beta}$	$\frac{6}{22 - \beta}$	$\frac{5(\beta + 2)}{44 - 2\beta}$	这是本文假设的正常情况下均衡,该结果中,贸易摩擦程度随着边际保护程度 β 的增加而增加,即边际保护引起贸易摩擦

资料来源:根据以上模型均衡结果计算整理。

实际上,笔者可以把(9)式中的结果变换为 $\tau^* = \frac{48}{22-\beta} - 2$, 这样可以很容易地画出 β 和 τ^* 之间的函数图形, 通过图形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图 2 所示。同时, 综合以上的分析, 笔者可以得出结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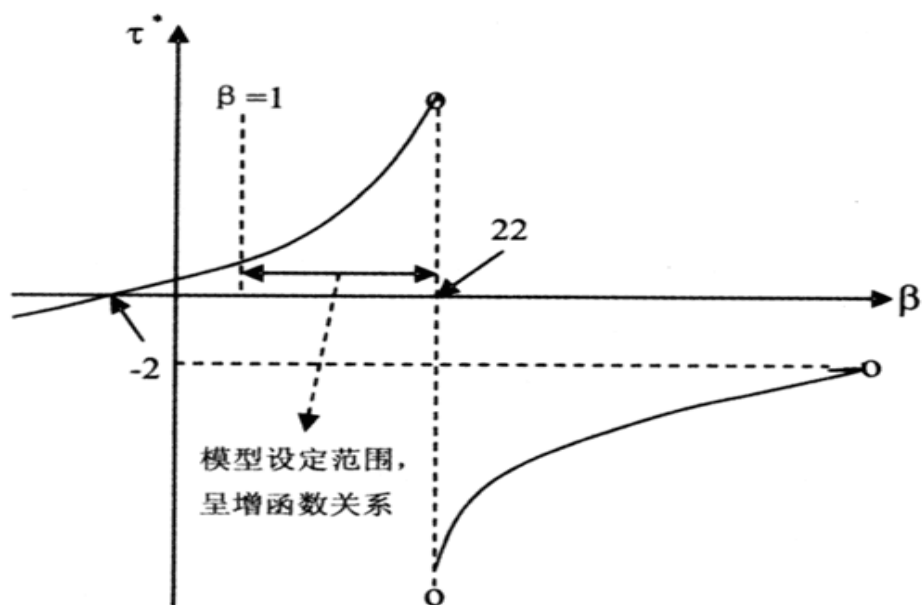


图 2 β 和 τ^* 之间的函数关系

结论一: 一国政府具有天然保护本国产业的动机, 只要该产业不是具有负外部效应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利, 政府就会采取保护措施; 同时, 边际保护和加权福利增强了政府的保护动机, 边际保护程度越高, 则实际制定的贸易壁垒越高, 贸易摩擦也就愈剧烈; 这就证明了, 由于边际保护的目的, 即使是对于一国的夕阳产业, 保护和贸易摩擦也会发生。

第二, 我们再分析效率均衡的结果。

效率均衡就是从整个世界福利最大化角度来看的最优均衡状态。显然, 世界的总福利应该是 F 国的福利和 H 国的福利之和, 这里的福利计算是没有任何权数的。所以, 效率均衡是由以下规划确定的:

$$\begin{aligned} & \max [W_F(P_f^*, \tau) + W_H(P_h^*, \tau)] \\ & = \max \left[\prod(P_f^*) + \int_{P_{f^*}}^1 D(P) dP + \tau Q(P_h^*) \right. \\ & \quad \left. + \prod(P_h^*) \right] \end{aligned} \quad (12)$$

再将(5)和(6)式的结果代入(12)式中, 可以得到:



$$\begin{aligned}
 & \max \left[\frac{P_f^{*2}}{4} + \frac{1}{2} - P_f^* + \frac{P_f^{*2}}{2} + \tau \frac{P_h^*}{2} + \frac{P_h^{*2}}{4} \right] \\
 &= \max \left[\frac{3}{4} \left(\frac{1}{2} + \frac{\tau}{4} \right)^2 + \frac{1}{2} - \frac{1}{2} - \frac{\tau}{4} + \tau \left(\frac{1}{4} - \frac{3}{8} \tau \right) + \frac{1}{4} \right. \\
 & \quad \left. \left(\frac{1}{2} - \frac{3}{4} \tau \right)^2 \right] \\
 &= \max \left[-\frac{3}{16} \tau^2 + \frac{1}{4} \right] \quad (13)
 \end{aligned}$$

$$\text{F. O. C} \Rightarrow \frac{\partial W}{\partial \tau} = \frac{3}{8} \tau^* = 0 \Rightarrow \tau^* = 0$$

$$\text{S. O. C} \Rightarrow \frac{\partial^2 W}{\partial \tau^2} = -\frac{3}{8} < 0$$

以上的结果说明,在全世界福利最大化均衡状态下,应该让 $\tau^*=0$,也即F国没有设定贸易壁垒,是一种自由贸易的状态。这也再次证明了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全世界总福利的提高了,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然而现实的情况,由于贸易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对称的收益,再加上边际保护等原因,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是现实世界的常态。由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能够得到结论二。

结论二:在实现全世界福利最大化的效率均衡状态下,可以推出 $\tau^*=0$,即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均衡,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必然损失世界的总效用;但贸易政策是一国单边的决策过程,单边福利最大化的结果决定了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以上模型分析的结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边际保护和福利的加权算法引起贸易摩擦以及加剧贸易摩擦程度的过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且中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属于即将被淘汰的夕阳和边际产业,但美国政府为了保护该产业从业人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和收入,从而产生了边际保护的想法,制定较高的贸易壁垒,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

五、总结及启示

综上分析,笔者给出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原因的一个解释,那就是边际保护动机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加权福利计算,又引起了对于边际产业的过度保护,从而产生贸易摩擦滋生和激化。正是这样的原因,美国政府会令人费解地保护对于本国经济长期增长并不利的夕阳产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当然,笔者并不排除由于贸易过度失衡导致美国政府不满,但同时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无论两国之间的贸易如何失衡,只要市场是充分发挥作用的,贸易对于两国经济都是有益的,这再次说明,也许边际保护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笔者提出的边际保护思想和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分析有着交叉的一





致思路,那就是贸易摩擦是由于某种原因引起了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产生了偏向。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分析认为是企业的政治游说活动影响了政府,笔者的边际保护思想则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那就是从收入边际效用差异出发,认为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边际效用高的原因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给出边际产业更大的福利计算权数,而最终制订更高的保护贸易政策,贸易摩擦也就接踵而至。

找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对于我们制定应对策略就会有很好的启示。

第一,贸易摩擦是美国政府的边际保护行为,该行为不可能因为简单的外在影响而消逝,所以我们应该能够预测到,中美贸易摩擦会长期的持续下去,只要我国对美出口保持较高的价值,摩擦不可避免,所以我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必须做好长期贸易战。

第二,解决贸易摩擦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只有当美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我国,也就是相互依赖程度基本对称时,美国自然就会考虑到贸易摩擦的后果而毫不吝惜地舍弃边际保护的目的。

第三,我国经济贸易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提高质量和提升结构是下一步的主要任务,从此意义上来说,贸易摩擦也许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让我们不得不腾出一定的空间和精力来发展较高层次的产品生产,这也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所在。

第四,任何贸易摩擦不可能仅是一个原因和因素所引起和导致的,所以笔者的分析仅是给出一个方面的合理而有力的解释,不可能囊括所有,也不可能解释一切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深化。



<i>SIFT</i>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 <u>全球通胀形势愈显严峻</u> ● <u>“越南诱发金融危机”真相 大摩报告始作俑者</u> ● <u>中国需警惕热钱危机</u> ● <u>人民币升值放慢的意味</u> ● <u>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如何？</u> ● <u>中国应救助越南</u> ● <u>改进金融服务可解融资困境</u> ● <u>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渐成“双刃剑”</u> ● <u>中国流动性之忧</u>
金 融 动 态 JIN RONG DONG TAI	<<<<<<<更多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6 月	第 4 期 [总第二十四期]

经济脉搏

全球通胀形势愈显严峻

作者: Joanna Slater

通胀担忧正在全球不断加剧，金融市场也随之颤抖不已。

周二的中国股市是最新一个受害者。基准上证综合指数收盘暴跌 7.7%，创下年内最低收盘价。此前中国政府推出了旨在从金融系统中进一步回笼资金的新措施，以此遏制通货膨胀。

印度国家政府雇员在举行罢工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样是在周二，越南政府宣布下调汇率，意在缓解市场因通胀率蹿升而承受的压力。

而在美国，听闻前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贝南克(Bernanke)有关油价高企将加剧通胀上行风险的警告后，投资者纷纷抛售了美国国债。对 Fed 动向最为敏感的 2 年期国债价格大幅下挫、收益率抬升，因为投资者越发相信，通胀当前，Fed 今秋可能就得被迫加息。周二，2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上周五的 2.4%跃升到了 2.9%。

与此同时，原本很可能降息的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按兵不动。该行表示，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影响，通胀风险已大到不能再承受降息的程度。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也在考虑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

发展中国家看起来显得尤为脆弱，它们当中有些国家曾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和通货膨胀进行过艰苦斗争。许多经济学家年初时曾不无担忧地表示，受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增长乏力可能是发展中国家今年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然而现在通货膨胀正在

变成一个更严峻的潜在问题。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跟踪调查了 24 个大型发展中国家；其调查显示，1 年前它们当中四分之三的通胀率都能达到或低于原定目标；而今他们无一能实现原定目标。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估计，这些国家的通胀率已经倒退回了 2002 年的水平。

广告中国 2006 年年初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的升幅还不到 1%，此后 CPI 一路上升，近几个月来更是超过了 8%。再看印度，当地股市今年迄今已经累计下跌了 27%，仅在过去两天就跌去了 4%；印度 5 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也超过了 8%。

控制通胀的典型手法是加息。但这有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并令股市承压。这还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稳定本币汇率的努力难度加大。对于这些倚重出口业来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稳定汇率是一项重要任务。

当然，全球经济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弹性。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周二发布的《全球金融发展》(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年度报告中预计，今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投资规模仅有温和下降。

对于那些有大量人口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国家来说，能源及粮食价格的飞涨是个格外严峻的问题，但在此轮商品价格飙升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导致通胀的外力在发挥作用了。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资本的大规模涌入阶段，这导致了投资过热以及外汇储备急剧增加。



在这些地区，内需和信贷规模也在快速增长，此外，当地就业市场也较为吃紧。

不过，过高的通胀也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供职于 Harding, Loevner Management、管理着价值 70 亿美元全球股票的西蒙·哈列特(Simon Hallett)说，在良好的状况保持了多年之后，新兴市场的风险实际上也越来越高。

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央行都面临着严峻考验。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认为，许多国家的央行都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收紧货币政策，相反，它们只采用了一些临时措施，如对面粉和汽油等消费品实施价格控制以抑制通胀。一些国家政府试图下调高昂的补贴，但却有可能激怒民众。在埃及的 Burullus 镇，政府官员们停止向市民出售补贴面粉后，上周末该镇爆发了抗议活动。

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在发展中国家管理着 700 亿美元的资产，该公司负责新兴市场的联席主管科蒂斯·纽伯恩(Curtis Newbourn)说：“通胀的加剧超出了央行的反应速度。”他说，公司已经减持了这些市场发行的证券等付息金融工具。

上周末，中国出台措施收紧信贷，投资者们对此反应强烈。中国政府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当前的 16.5%提高至 17.5%，以进一步抑制贷款发放。这已是今年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更让人不安的是，人们普遍担忧对美出口的放缓，而且担心本周四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会显示出该国 5 月份的通胀仍居高不下。

在其他一些通胀已经无法控制，或是受到价格上涨和其他经济弱点双重冲击的国家，股票、债券和货币被投资者们弃若敝屣。

直到最近，越南还是想寻找下一代热门市场的投资者的心头所好。但一份报告显示，越南 5 月的消费价格涨幅较上年同期高出 25%，令越南盾在外

汇期货市场的价格下跌，同时引发人们担忧将会出现金融危机。

中国的通胀率虽尚未达到上述水平，但也是投资者们担忧的重大源头之一。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上海的中国问题研究负责人王志浩(Stephen Green)指出：“现在该是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了。”

在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几个主要新兴市场，两位数字的通胀已经降临，或是预计不久就会到来。仅上周，俄罗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上调了关键利率。但一些投资者担心这样还不够。

就算上调了利率，以亚洲国家为首的许多政府仍在实施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关键政策利率低于通胀率，从而会刺激投资者借贷，而不是储蓄。

安本资产管理公司(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驻伦敦的新兴市场债券组合经理埃德温·古铁雷斯(Edwin Gutierrez)寄希望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高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说：“这些人没有跟上形势。这是一场危险之极的游戏。”

投资者表示，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可谓一枝独秀。虽然价格压力相对较轻，但巴西央行迅速行动，提高了利率。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巴西遭受了极其严重的通胀，最后才得以解决问题。在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下属的 DWS Scudder 管理着价值 30 亿美元的新兴市场股票的特伦斯·格雷(Terrence Gray)说：“对于恶性通胀的后果，巴西比任何人都清楚。”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2008 年 06 月 11 日

“越南诱发金融危机”真相 大摩报告始作俑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海敏、张皓雯发自河内、北京

国际投行去年对越南经济的评价是一片光明，今年却又称越南经济一片黑暗；权威专家称：其实没那么糟糕。

货币贬值，股市大跌、外资撤离、通货膨胀、投资过热……

历史会重演吗？越南目前经历的种种似乎与 11 年前的泰国惊人地相似。最近几天，国内外媒体陆续报道说，新一轮可能蔓延东南亚乃至中国的金融危机正在越南酝酿。

越南经济突然成为媒体炙烤的焦点，这都是从





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开始的。

唱衰亚洲声音又来

“亚洲正在进入自 1997 年以来最糟糕的几年。从首尔到雅加达，从北京到新德里，各国官员正在与迅速恶化的通胀形势作斗争。造成上世纪 90 年代混乱局面的主要是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而今天的局势还包括经济过热。”

彭博社 6 月 4 日发布题为《亚洲奇迹再次面临危险》的文章，其中描述和判断反映了西方观察家对越南乃至亚洲经济的悲观基调。“越南政府最近公布的按年率计算的 5 月份通胀率达 25.2%，为 13 年来最高水平”“自去年 11 月以来，越南股市已累计下跌了 55%”“惠誉国际评级 5 月 30 日将越南主权债券的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越南民众开始用越南盾购买黄金，或者换成美元和人民币”……

这些“坏消息”频繁以不同形式出现。它们反过来成了各方人士判断越南经济进入“金融危机”的依据。

大摩报告始作俑者

关于新金融危机将危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报道，大多引用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这份 5 月 28 日发表的报告认为，越南正面临一场类似于 1997 年泰国泰铢的“货币危机”，因为越南央行在国内通胀高企和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下，仍让越南盾币值过于坚挺。

摩根士丹利驻香港分析师纽纳姆在研究报告中认为，越南已经出现了很多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其中包括高估的货币币值、经济处于危险的失衡状态以及偏低的外汇储备。此外，12 个月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显示，交易员们正在押注越南盾兑美元未来一年会贬值 39%。

纽纳姆认为，越南盾可能会重蹈泰铢的覆辙。当时，由于投机者认为泰铢估值过高而大量抛售，导致泰铢兑美元贬值 45%。越南地产价格下跌的同时，国内不良贷款数额可能上升，“越南盾可能面临类似（泰铢）的下行风险，它的贬值可能会在本地地区引发（危机的）蔓延。”

这份报告把越南推到风口浪尖，媒体关注热度没有减弱的迹象。

投行被指夸大其词

“毫无疑问，越南经济正处于困难阶段。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上述的评价显示夸大了困难。”世界银行驻越南代表处临时总经理、首席经济专家马

丁·拉马并不认同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他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目前尚无充分因素表明，越南会像 1997 年的泰国那样爆发金融危机。

“摩根士丹利这些银行去年对越南经济的评价是一片光明，称其是亚洲新虎。今年又自打掌耳光，称越南经济一片黑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宾克斯说，他认为尚未看到货币危机的要素。

在北京，中国银行(601988 行情,股吧)全球金融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都认为，虽然越南经济存在问题，但现在并未发生“危机”。

危机传言急需澄清

袁钢明分析，股市暴跌、通货膨胀和民众拿钱买黄金等保值产品，这三个主要因素被看作越南将要或正在发生金融危机的依据。实际上，这几个因素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不能就此判断中国就面临危机。

“越南不是资本开放的国家，越南盾贬值不是资本大进大出导致的，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大家都越南盾去换美元或其他货币来保值，必然造成本国货币大量贬值。”袁钢明认为，越南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而非金融危机。

谭雅玲则指出，亚洲国家与 1997 年金融危机时相比，资金实力已经大大不同，“现在最充裕的外汇储备都在亚洲”，各国防范风险的能力都得到了增强，即便越南真出现金融危机，亚洲其他国家也有能力应对影响。

UNDP 的宾克斯认为，由大型投行发动的舆论炒作将对越南经济产生短期影响，进入越南证券市场及房地产的短期投资将大幅减少，因而维持吸引外资将是越南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而世行的拉马建议，越南政府实施调控政策要公布相关信息，一方面解除公众疑惑，一方面稳定企业界心态，告诉外界越南经济要素仍是稳定的。

来源： 新华网 2008 年 06 月 10 日





中国需警惕热钱危机

作者：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当前越南经济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越南国内通胀高企，同时又伴随着资本大规模外逃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有人担心越南的危机可能传递到中国，但这种担心是很难成立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越南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迥异：当前越南面临的是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压力以及失控的通货膨胀，而中国面临的是贸易盈余、财政盈余、货币升值压力以及可控的通货膨胀。

不过，虽然中国不可能爆发越南式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中同样潜伏着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这便是热钱集中撤出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国际收支逆转以及全面金融危机。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从 2005 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迅速上升。2005 年到 2007 年三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超过 8000 亿美元，占 2007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一半以上。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进入 2008 年以后，随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的加快，热钱流入的规模有增无减（参见图：“热钱”大量涌入）。2008 年第 1 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 1539 亿美元，同期贸易顺差为 415 亿美元，实际利用 FDI 为 274 亿美元。用“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的方法粗略估算，则第 1 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高达 851 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加额的 55%。2008 年 4 月中国外汇储备增加 745 亿美元，同期贸易顺差为 167 亿美元，实际利用 FDI 为 76 亿美元，则今年 4 月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为 502 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加额的 67%。

有观点认为，用贸易顺差与 FDI 不能解释的外汇储备增长额来计算热钱规模是并不准确的。在外汇储备增长额中，既包括新增外汇资金流入，也包括由于欧元、日元升值带来的外汇储备规模增长，还包括外汇储备资产获得的投资收益。如果考虑到后面两种因素，则流入的热钱规模将会降低一半左右。

但应该看到，上述计算方法依然遗漏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其一，从 2007 年中期开始，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以外汇资产缴纳法定存款准备

金，这事实上降低了外汇储备的增长规模；其二，从 2007 年第 4 季度到 2008 年第 1 季度，央行向中投公司提供了至少 600-7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则流入的热钱规模将重新上升。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在贸易顺差和 FDI 中也隐藏了大量的热钱流入。例如，通过出口高开发票、进口低开发票的转移定价策略，热钱就通过贸易渠道流入国内。此外，企业也常常使用预收货款、延迟付款，甚至伪造贸易合同等手段。再如，在 FDI 资本金结汇之后，这些资金未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生产性用途，而是直接趴在银行账户上赚取人民币升值收益以及利差，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赚取资产溢价。

除了企业之外，推动热钱涌入中国的主体也包括个人。2007 年仅中国居民将美元转换成人民币的规模就高达千亿美元以上。一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逐渐放宽了对中国居民换汇的限制，目前中国居民每年的外汇兑换额度已经从 2 万美元上升到 5 万美元；另一方面，香港金管局给香港居民向内地汇款大开方便之门，目前香港居民每天可以通过银行将 8 万人民币的款项汇至国内。容易观察到，香港居民到深圳存款的风潮愈演愈烈，与香港汽车到深圳加油的景象“交相辉映”。

目前国内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热钱流到国内什么地方去了？从 2007 年 10 月起，中国 A 股市场步入下降通道，房地产市场也陷入萎靡，这两个市场上都未出现成交量大幅上升的局面。难道新近流入的热钱仅仅满足于趴在银行账户上赚取汇差和利差？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热钱对一国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热钱大规模流入会加剧一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推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热钱突然大规模撤出，将会刺破一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并通过负向财富效应与托宾 Q 效应作用于实体经济。此外，热钱的大规模流出可能导致中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账户逆差，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将发生逆转。随后而至的则可能是全面、持久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正是出于对热钱大规模流出的担忧,使得央行在改变人民币升值策略的问题上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保持目前小幅稳健的升值策略,那么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刺激下,热钱将继续涌入,直至局面失控;如果转为实施一次性升值或自由浮动,则人民币汇率的超调可能引发热钱突然之间大规模流出。

中国应怎样应对热钱的大规模流入呢?首先,即使面临汇率超调的风险,仍然应该调整人民币的现有升值策略,打消投机者的单边升值预期。其次,

应加强对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流出的管制,这具体包括:其一,加强对外债的监控;其二,加强对通过贸易和 FDI 渠道流入的热钱的识别和管理;其三,加强对经常转移项目的管理,尤其是境外捐赠;其四,加强对地下钱庄的打击;最后,收紧对中国居民和香港居民自由换汇的额度。毕竟,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策。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8 年 6 月 10 日

专家观点

人民币升值放慢的意味

作者:沈明高(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

在出现由市场主导的双向波动前,任何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讨论都是暂时的

市场对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持续居高不下,改变或者弱化市场的单边预期,被认为是抑制通胀和防止热钱流入的关键。

一般而言,市场预期一旦形成,要改变它是非常难的。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自 2005 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脱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时升时贬,速度时快时慢,最大升幅和跌幅均达到政策规定的上下限。但是,人民币双向波动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渐进式升值某种程度上反而助长了升值预期,外资流入有增无减。

去年 11 月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名义升值速度呈现加快态势。去年 11 月到今年 3 月累计升幅达 6%,接近去年全年升值水平。境外 NDF(非交割远期交易)市场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也同步上扬,3 月 13 日最高时,市场预期未来 12 个月升幅高达 11.7%,远高于一年前的约 6%。相应地,在高升值预期下,外资流入速度不断加快,今年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61%。

然而,最近 NDF 市场的急剧波动表明,改变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远比想像的要容易。

今年 4 月 15 日,NDF 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一年期汇率报价,预示着未来 12 个月人民币升水从一个月以前的 11%以上,下降到了 10.4%,一个月后更快速下滑到了 5.4%,基本回到一年前的水平。5 月 7 日更创出了近几年罕见的单日跌幅,12 个月报价从前一天的 8.1%跌至 6.4%,1 个月报价甚至从

上一天的升值 4.5%转为贬值 0.4%,NDF 市场几乎崩盘。市场预期从人民币大幅升值到小幅升值,甚至从多到空的逆转,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与近期人民币实际升值速度放慢直接相关。今年 2 月、3 月,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年化升值水平都在 15%左右,4 月却降到了 3.2%,进入 5 月,人民币几乎横盘,5 月 15 日比一个月前贬值 0.6%。

现货市场汇率与远期市场汇率的高度关联性表明,即期汇率对远期汇率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具有决定性影响。这表明,要改变近期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只要放慢人民币升值速度即可,不需要更高技术含量的政策操作。但是,这种“过去决定未来”的模式至少有三方面含义:

首先,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从根据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走向来判断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或认为经济基本面变化对汇率不具影响力。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环境中,任何传言或暗示都很容易左右市场预期,增加不确定性,甚至引起市场恐慌,结果是市场投机气氛渐浓。

其次,市场对政府关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承诺缺乏信心,认为政策有随时逆转的可能,不升值或缓升值的做法不符合汇率改革的初衷。如果政府过度依赖调整短期升值速度来干预升值预期,有可能出现市场预期紊乱,不利于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第三,流量改革放慢,将加剧存量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困难。短期人民币升值速度放慢,可能助





长市场对长期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短期稳定可能以长期中的大幅升值为代价。当人民币币值与经济基本面的分歧越来越大,比如外部结构失衡依旧,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特别是国内流动性过剩局面进一步恶化及通货膨胀高企,人民币被迫一次性升值的风险就可能加大。

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改革达成既定目标之前,脆弱的升值预期有可能导致市场过度反应和外汇市场激烈波动,不符合改革的长期利益。市场多空的快速逆转,增加了短期内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短期的升值停滞甚至贬值,有可能使汇改回到原点,造成低效率的短期反复,或错失资本账户改革良机。

在目前中国面临外部经济放慢、内部通货膨胀和生产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下,人民币升值适当放慢有其合理成分。有理由相信,今年后三个季度人民币升值幅度很难超过一季度升幅。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美国经济放慢的风险依然存在,这有可能增加出口压力,而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实质上可以替代人民币升值的要求。

第二,随着次贷风险逐步释放,美国经济触底的可能性在提高,美联储进一步减息的可能性在下降,美元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货币的贬值有可能告一段落,今年下半年美元有可能企稳并略有反弹。如果属实,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即意味着相对于欧元或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效果将有很大改善。

第三,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5%以上,再加上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企业面临利润挤压,就业压力有上升趋势。人民币升值步伐放慢,可以帮助企业适当消化升值和其他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避免企业大量倒闭或歇业。

第四,在今年夏天北京奥运会之前,人民币升值放慢也是经济稳定的需要。

由于上述不确定性,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里,关键不是要不要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多少。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有限,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升值预期,反而可能助长投机。渐进升值的好处只有通过较长期地持有人民币资产才能实现,而一次性升值可以使投资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好处,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时间成本较低、回报较高。因此,除非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幅

度足够大,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但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过大,由此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有可能抵消升值的正面意义。

同样,人民币升值节奏放慢,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有一次性贬值或渐进式贬值的可能。目前,一部分出口企业因人民币升值出现利润空间的缩小甚至歇业,这是人民币升值应有的结果。人民币升值的应有之义,就是淘汰一部分只有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条件下才能生存的企业。对行业的领头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大部分可以通过缩减其他生产成本的方式来消化。这些企业不但可以在升值过程中生存,更可以通过生产效率提高和低成本扩张,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只是加快了国内行业整合的速度,而行业整合最终是效率提高的过程,也是逐步磨练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过程。

当然,这样的过程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当国内行业整合完成,胜出者将有可能参与海外的行业并购,并逐步成长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企业。谁能够掌握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发展自己,谁就是真正的行业领导者。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真正能够改变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是人民币升值本身。当人民币升值到一定水平,市场做空力量会逐步从无到有地成长起来。当做空力量能够与做多力量一较高下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才有可能。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判断人民币均衡汇率大概在什么范围内。在出现由市场主导的双向波动前,任何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讨论都是暂时的,难以成为主流意见。

这就要求决策者能够抵御诱惑,不为一时之需在短期内人为制造人民币贬值或双向波动的假象。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有足够准备,承受短期内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资流入冲击。假以时日,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结构调整和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才有发挥的空间,才能最终分享汇率改革的好处。

要抵制这样的诱惑,决策者需要类似希腊神话故事里尤利西斯(Ulysses)的“理性的自缚”。尤利西斯在返回希腊的途中,必须经过海妖塞壬(Sirens)控制的海岛,她善用美妙醉人的歌声来迷惑过路的水手,使得船只偏离航线并触礁沉没。为防止塞壬的诱惑,尤利西斯要求所有船员用蜡封住



耳朵,甚至将他自己紧紧绑在桅杆上,终于安全渡过了危险水域,顺利抵达希腊。

来源:《财经》杂志 /总第 212 期 [05-26]

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 如何?

作者: 张 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沈飞昊

人民币升值策略已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继续小幅升值或者一次性升值的策略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较下来,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从中长期来看可能是成本最低的策略。它看起来最为激进,但仔细分析,其实是可行且可控的,尤其是它有助于形成居民和企业的避险意识,促进国内人民币远期市场的发育。

在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改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低于均衡汇率,这早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约 17%,但由于自 2007 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贬值,造成人民币对欧元及日元也呈小幅贬值趋势。但综合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在逐渐升值。随着 2007 年人民币汇率日均波动区间显著扩大,人民币汇率制度从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确已经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即使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需要继续升值。但是对最优升值策略选择,目前至少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人民币应该继续小幅、稳步、渐进的升值策略;第二种认为,人民币应该一次性大幅升值;第三种认为,不妨试行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

人民币小幅升值策略自汇改以来一直在沿用。这样的升值策略,对出口行业的直接冲击较小,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给中国出口企业留下了调整空间。当一段时期内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可以预测时,出口企业可以在与交易对手订立合同时,把人民币升值因素反映进去。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要素价格存在管制,因此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立即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出口企业也有动力去压缩成本、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最终完成出口行业的结构性调整。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策略对出口行业的较小

冲击,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较大冲击为代价的。在这种策略下,国内外投资者都建立了人民币将会不断升值的单边预期。在市场认为人民币升值到位之前,无论是国际投机者还是国内居民都会争相将美元换成人民币,以套取升值收益。这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通过外汇占款发行的基础货币陡然上升。虽然央行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特别国债和定向票据等手段去冲销,但国内依然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这正是 2007 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于是有人戏称,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不能再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这是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必然会被淹死。正确的对策是放下石头,尽快游过深水区。言下之意应采取更加激进的人民币升值策略。

那么,目前人民币汇率是否可以一次性大幅升值呢,比如 15%—20%? 如果能够通过一次性升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达到均衡汇率水平,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策略了。然而,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将会给中国出口行业造成严重打击。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突然上升 15%—20%,会使得中国商品相对于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出口商品处于价格劣势,进而造成中国出口显著下降,冲击经济增长和就业。此外,人民币的均衡汇率究竟是多少,始终都未达成共识,因此一次性升值到底该升多少,很难把握其方寸。如果升值幅度过小,则市场依然预期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热钱依然会流入。如果升值幅度过大,形成汇率超调,则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会贬值,国内居民和国际投机者都会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形成资本外逃,从而对中国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

正是因为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以及一次性升值策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才使得部分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人民币暂行自由浮动。这种方法看起来最为激进,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其实是可行且可控的。

且让我们作一次大胆的思维试验。

假定从明天起,央行出其不意地暂时放弃干预外汇市场,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上升到什么水平?笔者估计,升值幅度很难超过 10%—15%。这一判断建立在对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的基础上。首先,从当前境外人民币无交割远期外汇市场来看,一年期人民币远期汇率的升值幅度也就 10%左右,这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其实也包括部分境内企业)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其次,就笔者对沿海一些地区出口企业相关数据的分析,在与外国进口商订立 2008 年贸易合同的,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在 2008 年将会升值 10%左右。可见,境内外市场参与者都对人民币升值幅度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

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策略的优点还可以列出几点:其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到市场预期水平,有利于分化投资者的预期,打消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从而缓解热钱流入和流动性过剩;其二,由于出口

企业在订立 2008 年合同时已经将人民币升值预期纳入其中,只要人民币汇率不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冲击将是有限的;其三,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有助于形成居民和企业的避险意识,促进国内人民币远期市场的发育;最后,由于自由浮动仅是暂行,一旦市场表现异常,央行还可以恢复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人民币自由浮动不至于失控。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策略已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从中长期来看可能是成本最低的策略。当我们遭遇难以捉摸的深水区时,继续抱着石头渡河的危险越来越大,我们也不能期望用尽全力一次性渡过深水区,更为理性的策略,是放下石头,沉着冷静地划水前行。

来源: 上海证券报; 2008 年 05 月 28 日

中国应救助越南

作者: 何帆、余永定、郑联盛

越南金融风暴

东亚金融危机过去 10 年之后,一场新的金融风暴悄然降临。这场金融风暴的策源地是越南。当前,越南正遭遇着恶性的通货膨胀、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潜在的巨额不良债权,随时准备大举流出的滚滚热钱。这些都是货币危机的典型症状。市场普遍预期越南盾可能大幅度贬值。根据 12 月远期交易市场(NDF)的情况,市场预期越南盾可能会在未来一年下跌超过 30%。

越南是近年来东亚经济中的一颗耀眼的新星。1986 年越共六大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越南开始进入经济起飞的阶段。进入 21 世纪之后,越南年均 GDP 增长率为 7.5%,为东盟各国之首,外界评价其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2007 年越南经济增长高达 8.5%,是 199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越南开始遇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2007 年越南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12.6%,但 2008 年之后,通货膨胀更是如脱缰野马,失去控制。2008 年 5 月,按年率计算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已高达 25.3%。

越南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有其国内总需求方面的因素。由于经济增长过快、投资过热,导致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不断上涨。越南在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7 年以来信贷扩张速度也非常快,这主要是由于外资大量流入,2007 年越南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203 亿美元,证券投资达到 53 亿美元,此外还有大约 80 亿美元的侨汇汇入。越南的中央银行在买进美元的同时,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信贷增长失控。但是,在短短半年之内越南的通货膨胀急剧增长,其导火索是由于外部因素,主要是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食物在越南的消费物价指数中占到 43%。随着国际粮价在 2008 年急剧标升,也影响到了越南的粮食价格。4 月份越南的粮食价格上涨了 34.1%,5 月份上涨了 42.4%。粮价上涨又引起民众的不满,工人纷纷要求提高工资,可能出现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局面。

越南的股票价格和房价上涨速度也非常之快。越南证券交易所的胡志明股票指数从 2003 年 10 月 21 日的 133 点涨到了 2007 年 3 月 12 日的 1170 点,



涨幅达到了 780%，不过从 2007 年 10 月 3 日到 2008 年 6 月 4 日，在短短 8 个月的时间内，该指数从 1106 点下跌到了 396 点，跌去 60%。房地产市场近期也出现了大幅下挫，胡志明市房价下跌一半，河内下跌接近 30%。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资开放的政策上越南比中国更为激进，允许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 49%。越南股市和楼市在短期内急剧上涨并出现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热钱流入分不开的。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为时已晚、收效甚微，甚至引起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控制银行信贷，越南的中央银行在 2008 年 1 月就已经提高了利率，5 月 19 日再次提高利率，基准利率从 8.75% 提高到 12%，但尽管如此，实际利率仍然为负。越南的中央银行还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从 10% 提高到 12%，并强制商业银行购买大约为 13 亿美元的国库券以收紧流动性。越南政府还采取措施控制国营企业获得过多的房地产贷款。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越南的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将急剧提高。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恶化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双重打击。越南政府还实行了减少政府支出、降低进口关税等措施，同时还对食品、电、煤、水泥、钢铁等实施价格管制。

越南的汇率制度一直是事实上的盯住美元制度。为了缓解进口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南政府于 2007 年 12 月 24 日扩大了汇率波动的区间，允许越南盾的汇率每日在 1% 的涨跌幅度内波动。之后，越南盾开始逐步升值。但是这一政策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负面效果。由于本币升值、也由于美国和全球经济放缓造成外部需求减少，越南的出口不断减少，但进口快速增长，使得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08 年前五个月，越南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 144 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贸易逆差额（124 亿美元）。市场已经不再相信越南能够维持汇率高估的政策。外汇市场发生严重的“挤兑”，市场大量买入美元和人民币而不愿意持有越南盾。资本出现大规模外逃。越南的本地居民也开始抛弃越南盾、疯狂购买外币和黄金。

越南应该采取何种政策组合？

对越南政府来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呢？

首先，货币贬值可能已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

单纯是货币贬值，对国际收支会有改善作用。随着货币贬值，出口可能会增加，进口可能会减少，贸易逆差将逐渐消失，甚至出现顺差。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有可能会影响到越南的出口前景。

其次，我们认为在当前局势下，越南不宜再大幅度提高利率，因为利率的急剧上升会导致股市和房市的崩盘，从而给宏观调控带来更棘手的难题。但为了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可采取对长期存款提高利率或进行补贴的方式，克服市场上的恐慌心理。

第三，从财政政策来说，越南仍然有适度增加财政支出的空间。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越南可以采取发行国债等方式融资，且不必担心未来会出现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应尽快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补贴，因为通货膨胀，尤其是食物价格上涨对穷人的影响最大。在短期内打击囤积居奇，稳定市场物价是有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价格管制很难维持，关键性的价格应逐步市场化。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改革的阵痛，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也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越南仍然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靠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反通货膨胀的同时也要注意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此而言，增加适宜的公共支出仍然是有必要的。我们建议公共支出的重点应更侧重人力资本投资而非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会进一步推高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但人力资本投资则无此之虞。对诸如公共卫生和教育进行投资还有两个额外的好处，一是为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在危机时期改善公民的福利。

最后，控制短期资本流动非常关键。加强对短期资本的控制并不会影响到像外商直接投资这样的长期资本流动，而且会为国内的宏观调控带来更大的操作空间。国际游资犹如秃鹫，正等待着货币危机之后，越南的资本市场上死伤枕藉，它们才好进入抄底。因此，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对资本流出的控制，而且同样要加强对资本流入的控制。

亚洲应该联合救援

亚洲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防止越南金融危机的恶化和扩散。总体来说，亚洲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仍然较好，但是和越南接壤的柬埔寨、缅甸等国家



面临着和越南相似的经济困难。此外, 高盛已经降低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股市的投资评级。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仍然没有风平浪静, 大量游资今年年初以来撤离东亚新兴市场, 就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之中受损严重, 需要从境外抽调资金回补。韩国年初出现了韩元贬值、股市下挫, 以及这次越南的金融风暴, 都和这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动向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 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美联储已经暂时停止降息, 甚至可能会加息。一旦美国提高利率, 更大规模的外资很可能迅速撤出东亚, 流回美国本土。即使是基本面情况较好的东亚国家, 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美元贬值, 石油、初级产品和粮食价格上涨, 出口增长放缓等问题的困扰。因此, 如果东亚国家不出手干预、作壁上观, 不是没有再次爆发东亚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自从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亚洲货币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以清迈协议的框架为基础, 亚洲国家大部分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截至 2007 年 7 月, 在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下, 已有 8 个国家之间签署了 16 个双边互换协议, 总金额增长至 830 亿美元。作为清迈倡议的延伸, 今年 5 月 5 日, 东盟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财政部长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表声明, 宣布将出资 800 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

自从建立清迈协议之后, 东亚地区还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 清迈协议的效果并没有得到过验证。如果这一次清迈协议无法及时有效地帮助越南度过难关, 亚洲货币合作将会信誉扫地, 之前的所有成果都会付之东流。

事实上, 越南金融危机恰好是推进亚洲货币合作的一次绝好时机。尽管遇到了经济困难, 但是越南的经济基本面仍然较好, 其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光明。换言之, 越南遇到的问题只是暂时性的“流动性危机”, 而非长期性的“资不抵债危机”。与此同时, 亚洲大部分经济体仍然保持着贸易顺差, 亚洲的外汇储备总额已经超过 2 万亿美元。假设越南今年贸易逆差达到 250 亿美元, 再加上 20 亿美元的短期外债, 总和将超过越南 2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是缺口并不算大。按照市场估计, 越南所需要的贷款支持估计为 300—500 亿美元。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拿出这点钱帮助越南渡过难关, 等于以一瓢之

水消除一场潜在的火灾, 既有利于稳定亚洲的繁荣、又可以增进亚洲的团结。

但是, 越南至今并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所以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建议中、日、韩三国及东南亚联盟经过协商, 分别向越南提供短期贷款安排。由于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也正在筹建, 可考虑在中日韩加东盟框架下, 以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这种多边形式再向越南提供援助。除了东亚国家的支持, 我们还有必要呼吁国际机构,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越南施以援手。但这一次救援应该和东亚金融危机不同, 我们不需要像上次危机时一样, 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东亚提供的苛刻贷款以及荒谬的政策要求。东亚国家这次援助越南, 可考虑将所有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脱钩, 并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援助帮助越南尽快恢复稳定。这将在国际经济历史上, 第一次亚洲人帮助亚洲人的创举。

除了短期贷款安排之外, 有必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承诺向越南提供长期投资计划。这些长期投资应着力于建设基础实施, 尤其是跨境的基础设施。越南长期受到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差的困扰, 但以一国之力大兴土木, 容易遭遇经济过热, 如果借助东亚各国的援助, 其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快更好的完成。通过越南的纽带, 可以将亚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与亚洲最有活力的地区紧密连接起来。越南一边连着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落后地区, 另一边连着中国、新加坡等亚洲最有活力的国家。通过这些跨境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可以为越南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腹地和市场前景, 另一方面也为亚洲彻底完成消除贫困工作奠定基础。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就指出, 将亚洲的落后地区和繁荣地区连接起来, 才能真正将落后地区带出贫困的陷阱。如今亚洲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国家仍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 通过对跨境基础设施的投资, 庶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实现亚洲的全面繁荣。

中国应该援助越南

在援助越南的过程中, 中国理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越南和中国唇齿相依、政治体制相近、文化传统相似, 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关系。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仍然和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远远不相称。援助越南, 既是中国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尽义务,同时也是深化中越经济合作的重要契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一直比较低调,只是强调互利合作,强调不当头,不张扬。但是,和中国的刻意低调事与愿违的是,国际上对中国的猜测甚至敌意始终没有消逝,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不绝于耳。中国已经对其外交策略适时做出了调整,比如,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中国一直扮演着推动者和主要倡导者之一的重要角色。行重于言,只有抓住时机,有所作为,让事实说话,才能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是中国当仁不让,需要坚决维护的。越南金融危机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旁边,如果中国坐视不管,或行动缓慢,将失去一个树立威信、提高声望和影响力的大好时机。

中国不能低估越南的重要性。越南的人口有 8400 多万,国土面积 33 万平方公里。按人口数量而论,越南比德国的人口还多。按国土面积而论,越南比意大利还稍大一些。2007 年越南的 GDP 规模为 720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 54 位。如果和中国的各个省份相比,越南的经济规模在广西之后,但却在云南之前。更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已经成为全球分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和产业内分工的发展,越南将是国际生产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在进一步发展之后,也会向越南,甚至是缅甸、柬埔寨这样的地方转移投资。这对中国和越南将是双赢,因为当前的国际分工强调的是各国间的合作和区域生产网络,同一产业的不同生产环节,有的分布在中国,有的分布在越南,有的分布在日本、美国,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中国已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07 年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额达 151.1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1.9%。但是,中国仍然主要将越南视为出口市场。2007 年中国对越南出口为 119.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9.4%,自越南进口额为 32.15 亿美元,增长 29.4%。中方顺差为 86.84 亿美元,比去年增加 37.05 亿美元,增长 74.41%。越南吸引的外资中以服务业投资居多,占总投资额的 89.9%,主要为房地产和宾馆建设。韩国、新加坡、台湾省、日本等是越南的最大投资

主体。中国在投资越南的 82 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仅名列第 11 位。

中国援助越南,首先要通过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中国应振臂一呼,积极倡导东亚国家联合起来,并以身作则,首先向越南提供贷款援助。在对越南的援助中,中国应积极和东亚其他国家,以及区域外的国家、国际组织协商、协调,争取对越南的援助及时、充足、有效。在向越南提供政策建议的时候,中国尤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政治体制高度相似,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更长,因此唯有中国才能更了解越南所遇到的政治经济约束条件,以及越南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深层问题。

在参与区域和国际援助计划之外,中国作为邻国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可以向越南提供更多的官方援助,用于帮助越南的农村发展、减贫、城市化发展等领域。中国的很多发展经验,可能对越南有借鉴意义。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绩举世瞩目,也可以为越南提供相应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中国和越南应该合作,推动跨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港口、通讯等。北部湾沿岸的中国地方政府,如广东、广西等,对此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越南和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都将提供一次飞跃的机会。中国应鼓励本国的企业更多的到越南投资,建立合资企业,雇佣更多的当地劳工,而不是仅仅把越南视为销售廉价产品的市场。对到越南投资的企业,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如成立专门的基金提供贷款融资等。

为了更好的促进两国间的合资,应考虑逐步在两国之间签订贸易和投资协议。中国应进一步对越南开放市场,鼓励更多的越南企业出口到中国。同时,应鼓励越南吸引更多的中国资本。要让中国的资本在越南生根开花,和越南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中越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是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议,不会像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所谓自由贸易协议、投资协议一样,打着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旗号,却遍布着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的陷阱。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2008-6-10





改进金融服务可解融资困境

作者：吴晓灵（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根据作者将于 2008 年 6 月 10 日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论坛上所作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搞活信贷市场，不但是改进金融服务的要点之一，而且是破解融资困境的重要方式。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不通则会影响机体的健康成长，因而，改进为企业提供融资具有战略意义。同时，金融是一种服务，竭尽全力为企业和城乡居民提供高效的服务是金融发展的根基和金融创新的动力。

居于金融的这些特质，结合中国目前的环境，我认为金融服务改进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搞活信贷市场是今后一段时间金融业为企业、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方面。

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影响，改革前的中国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尽管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在推动直接融资上做了许多努力，但中国目前仍是一个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市场。借贷仍然是人们最常用的融资渠道和最熟悉的融资技术，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由于一时难以满足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的要求，对信贷的依赖尤其严重，但他们的需求往往难以满足。在目前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从紧货币政策的情势下，它们的贷款更加难以获得。如何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环境中为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金融问题。

我认为，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搞活信贷市场是破解融资困境的重要方式。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特点是它不能办理结算业务，因而在其放贷过程中，不会创造新的货币供应，只会改变现有存款结构。这种作用，与金融机构代客发行股票、债券的作用是一样的；即把甲客户暂时不用的钱，通过贷款、股票、债券等方式，转借给需要资金的企业，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搞活信贷市场，不会冲击从紧的货币政策，相反会起到搞活微观的作用。

从紧货币政策的着眼点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而抑制通货膨胀上升，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商业银行的资产增量会新增货币供应，因而要

控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不会新增货币供应，因此，搞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是解决从紧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定位和业务范围的研究，不断完善现有法规，改进对企业的金融服务。

第二，尊重企业和居民的财产权、交易自主权，围绕客户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

尊重财产权和交易自主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货币资金是财产的表现形式之一，企业和居民应该具有对其货币资产的完全处置权，以及以此获取收益的权利。

处置个人货币资产的方式选择应该是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无论是消费、投资、借贷还是捐赠，只要企业和居民的资金使用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他们就有充分的自主权。

从基本职能来讲，借贷也是一种个人财产处置方式，不是金融机构专属。如果资金借出者是在处置自己的资金，这就是市场主体间的民事行为，合同约定即可，不应设置特殊的准入门槛，这是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如果借出方和股权投资方的资金不仅仅是自有资金，还有公众资金，涉及公共利益，那么为了社会稳定，需要设置一定的进入门槛和监督机制，这些资金持有机构就是金融机构。

我们在发展金融业时，一定要分清哪些活动是市场主体的财产处置行为，哪些是公众需要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金融活动。对前者要尊重他们的交易自主权，对后者要关注公众财产的安全。

我们国家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压抑现象，某种程度上是对市场主体的财产自主权不够尊重造成的。因此，尊重市场主体的财产自主权，对其借贷和出资方式加以引导，有利于抑制非法金融活动，更有利于搞活市场经济。

第三，金融服务要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





不同的金融产品,同时政府要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

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般可区分为合格的大额投资人和风险承受力有限的小额投资人,居民和企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自主运用财产,但受知识、经验和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自主的财产处置效率未必很高;让有知识、有经验的专家去运作,资金效率会大大提高。因而为大额投资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如投资理财的私人银行业务,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和各类信托业务应运而生。

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是智力服务,是管理技术,从业人员的执业根基是对客户的忠诚。大额投资人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为寻求较高的投资回报,中介机构的资金投向也可以是一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与金融项目。

监管机构对这些金融活动应采取非审慎监管的原则,主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界定大额投资的金额,限定客户数量;二是为这些业务的开展制定简洁的基础性要求。其余的事就应靠市场主体的自律行为自然运行。

中国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居民和企业的财富积累已到了需要专家理财的时候,做好为大额投资人的金融服务是今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今天的融洽会就是在为这些投资人和金融机构的活动提供平台。

除合格的大额投资人外,中国还有许多小额资金所有者,他们不适于直接进行投资和放贷,需要通过金融机构吸收他们的小额资金,提供专业的资金运用服务。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

小额投资人数量众多,抗风险能力弱,为维护社会稳定,面对小额投资人的金融机构必须采取稳健、保守的经营策略;投资组合中,高风险产品只能占很小比例。

国家对面向小额投资人的金融机构要实施严格的审慎监管,同时要建立保护小额投资人的安全网,如各类保护基金。

保护小额投资人的利益,放开对合格的大额投资人的束缚,提倡专业化的服务是今后金融业发展的方向。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之际,搞活大额融资市场、促进企业并购整合尤显迫切。

加强宏观调控以保持稳定的货币环境,是企业 and 城乡居民服务。在总量控制下搞活微观金融活动更是对他们的直接服务。

当前,学界深入交流观点,寻求和凝聚共识,搞活信贷市场,当可为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来源:《财经》总第 213 期 出版日期:2008-06-09

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渐成“双刃剑”

作者:杨涛(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6月7日,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达到17.5%的历史高位。可以看到,自2003年开始调控经济过热以来,法定准备金率共上调了18次,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常规手段,在实践中,其优点和缺点也更加突出。

作为优点来讲,准备金率政策是央行完全拥有自主权的,调节起来很容易,而且对货币供应量作用迅速,并且能够影响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而作为缺点来看,主要是现有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弱化了准备金率政策的货币紧缩功能。

一方面,我国的准备金制度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法定准备金无法用于日常清算结算,因此,商业银行必须保持一定的超额准备金。在此背景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例如,

假设法定准备金率是16%,超额准备金率为2%,在极端情况下,提高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可能选择超额存款准备金从2%降低到1.5%,不会改变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总比例,也就对银行信贷规模和流动性影响有限,所以我们常看到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冻结”资金,也只是理论上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国对准备金都支付利息,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89%,超额准备金利率为0.99%。这样,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有利于吸存成本低的大银行,打击了许多中小银行。不仅降低了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的“切肤之痛”,而且不利于银行业务发展模式的转变。

另外,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脱媒的加剧,使



更多的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这也使准备金率政策对流动性的作用不断降低。事实上，2007 年以来频繁上调法定准备金率，既表明政策有效性在弱化，也说明市场对政策也已接近“麻木”状态。

那么，在过去，既然准备率政策作用有限，为什么还要经常使用呢？在更大程度上，央行还是要发挥其“符号”作用，表明从紧的货币政策姿态。本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表明上是针对目前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压力，以及投资反弹的压力，在更深层次上，则是为了表明央行继续反通胀的决心，表达从紧货币政策的姿态，以稳定社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我们看到，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中的物价上涨压力并未得到缓解，而且由于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冲击，甚至通胀压力有所增强。同时，由于多次灾害事件的影响，多数公众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不断松动，这在客观上会强化通胀预期，不利于宏观调控的持续性。事实上，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以前有所不同，选择在新的 CPI 数据公布之前出手，更表达了央行对通胀预期失控的担忧。

然而，要注意的是，到今年 4 月底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已降至 1.77%，为 2005 年以来的低点，这表明法定准备金率作为“符号”政策的空间已经缩小。如果进一步挤压超额准备金，导致超额准备金部分被完全“吸收”，那么其“双刃剑”作用就开始显现。而对央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把对冲成本向

银行转嫁的意图，银行的态度也会从暧昧甚至欢迎，逐渐转向反对，这也是西方国家不敢轻易动准备金率的原因。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高达 1 个百分点，比此前的幅度都要高，可能表明 5 月份新的经济运行数据不容乐观。但是，由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影响市场流动性，而流动性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相关关系，考虑到当前通胀压力继续增加，而经济过热的状况却已经缓解，因此必须关注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有，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行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也体现出央行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

应该说，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更多是基于供给面和实体经济的原因，对基于总需求调控的货币政策，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同时，在热钱涌入、经济下滑等问题的纠缠下，利率、信贷控制等政策也难以运用。对此，在强化财政等其他政策的反通胀职责同时，一方面通过完善准备金制度来增强实际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汇储备职能从央行的脱钩等，才能使利率等工具逐渐取代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非常规政策手段，而成为体现货币政策职能的主体。

来源：和讯网每日观察第 340 期 2008 年 06 月 10 日

金融快讯

中国流动性之忧

英国《金融时报》Lex 专栏

出乎市场意料，中国央行周末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 100 个基点。这是年内第 5 次上调，也是上调幅度最大的一次，使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17.5%。中国政府究竟知道什么他人所不知的信息呢？定于本周四发布的通胀数据，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农产品和粮食价格指数预示消费者价格通胀增速略有放缓；此外，在信贷以 14% 至 15% 的同比增幅疾速扩大的情况下，额外冻结 500 亿至 600 亿美元的银行资金，对抑制价格螺旋形上涨作用不大。更可能的是，此举与涌入中国的投机资本有关。迹象之一是外汇储备的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1500 亿美元。尽管官方数据尚未公布，

但初步迹象显示，4 月外汇储备激增 750 亿美元，增速加快了 50%。

要推算出外汇储备的增加有多少来自投机资本流入十分棘手。投机资本即投机于利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资金。外汇储备会计规则和其它方法论的细节不够清晰。中国政府将美元储备置于不同机构的做法进一步扭曲了画面。持有外汇储备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持有约 1200 亿美元作为法定准备金的一部分）和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但渣打(Standard Chartered)估计，在扣除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利息支付与估值收益后，今年前 3 个月每月流入的剩余资金（主要来自证券投资者）为 300



亿美元, 4 月份达 700 亿美元。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遏制此类资金流入。提高准备金率比冲销美元购买成本更低; 但存在一定限度。如今, 包括超额准备金在内, 中国冻结的准备金超过 1 万亿美元, 而一旦准备金率超过 20%, 银行的盈利能力就会严

重受损。以政策手段遏止资金流入是选择之一, 但鉴于资金流数额巨大, 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可能是更有力的手段。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2008 年 6 月 10 日

中国股市为何暴跌?

作者: 李晶(Jing Ulrich 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

中国 A 股指数周二创下 2007 年 2 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投资者对油价高企、通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PBOC)周末期间上调准备金率的决定做出反应。另外, 一项大型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前景也给市场造成了压力。

基准的沪深 300 指数暴跌 8.11%, 收于 3206.56 点, 银行及地产类股领跌。两市将近 1000 只个股跌停。

最新一次准备金率上调的力度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在投资者考虑大宗商品价格不断飙升对中国企业界的影响之际, 这将令市场心态更为谨慎。这一最新举动距离上次调高准备金率不到一个月, 表明政府的紧缩行动仍在进行之中。同时, 这也反映出市场对 5 月份 M2 货币供应量增幅可能在 4 月份 16.9% 的水平上加速的担忧。

在整个亚太地区, 不断上涨的价格越来越成为市场担心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已有初步迹象表明食品价格上涨有所减缓, 中国政府可能仍将对通胀保持警惕。

预计 5 月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将有所减缓, 但中国央行可能担忧石油、煤炭、钢铁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可能导致结构性的核心通胀抬头。

同时, 投资者也开始担心今年剩余时间内的企业盈利前景。

今年第一季度, 由于外部经济增长放缓, 通胀不断加剧, 原材料成本日益上升, 中国国内上市公司税前利润同比增幅降至 17.4%, 低于 2007 财年的 49.4%。亏损公司所占比例则增长一倍, 从 2007 年的 7.5% 升至 15.4%。近来 A 股市场走软本身也起到了放缓业绩增长的作用, 原因是投资收益下降。

未来一段时期,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中国电价管制, 以及退税和月度补贴实施方面的消息。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8 年 6 月 11 日

准备金率再度上调 1 个百分点 显央行从紧货币政策决心

编辑: 王婉媛

路透北京 / 上海 6 月 7 日电——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五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提升 1 个百分点至 17.5% 的历史新高水平, 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

分析人士认为, 央行此举显示了其四川地震后仍严格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心, 同时亦说明升息的空间很小; 而股、债市的短期走势亦料将因宏观调控不改而承压。

中国央行周六稍晚宣布, 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 于 6 月 15 日

和 25 日分别按 0.5 个百分点缴款, 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此前最近一次上调准备金率时间为 5 月 20 日; 央行去年年内已先后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西南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王剑辉认为, 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17.5% 就已经到上限了, 应该不会再度调高了, “但一次上调一个百分点还是很出乎意料, 显示了央行对流动性收紧的力度比较大。这也说明升息的空间很小, 所以只能用足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工具。”





他认为央行此举对市场传递的信息很不乐观。此前市场预期,因四川地震,央行或放松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可能也说明了,央行得到的信息是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仍不乐观,回调幅度可能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于下周四(12日)公布5月CPI数据。而据路透调查显示,受农产品价格回落及翘尾因素影响,5月CPI涨幅预测中值为7.9%,较4月份的8.5%明显回落。

王剑辉并表示,同时投资增长的数据应该也不乐观,特别是四川地震带来的灾后重建,可能都会拉高新增投资数据,这可能会使前期宏观调控的成果付之东流。而央行在这些数据出来之前就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是为了显示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增长的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教授赵锡军认为,除了CPI和流动性的因素外,5月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大也是导致此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央行目前无法使用利率调节,只能依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消除价格上涨的货币性压力”。而他预期,央行未来还有可能继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股、债市短期走势承压

上海一券商交易员称,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市场总体钱太多,外汇占款对流动性影响可能得重新评估,分两次应该是考虑新股发行的因素。

而从央行调整准备金的频率看,今年加息的次数会更少了。

中国央行去年一年共先后六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而今年迄今为止则未有任何升息举措宣布。国泰君安证券一债券分析师表示,前期市场资金面一直偏于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还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冻结资金量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有些出乎意料。推测央行意在对冲外汇占款,从而控制通过膨胀;再考虑到中国建筑近期或启动A股首次公开发行(IPO),未来市场流动性紧缩压力增大,现券收益率面临上行的风险。

上海一保险公司债券交易员亦认为,下周有国开行等债券发行,估计一级收益率会走高,带动二级市场收益率上行。市场会偏空,资金面持续紧张的局面短期不会缓解。

而针对股市影响,华南一基金公司投资人员表示,“(上调准备金率)央行还是认为通胀压力比较大,虽然目前股市基本面不是很乐观,不过前段时间已有较大跌幅,而且现在点位比较低,因此继续大幅下探可能性不大,但短期反弹的机会也很小了。”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06-09

亚洲各国采取措施抑制通胀

约翰·阿格里昂比(John Aglionby)雅加达、罗尔·兰丁金(Roel Landingin)马尼拉报道;者/梁艳裳

印尼和菲律宾央行昨日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成为决策者正在努力遏制通胀不断飙升的最新迹象。通胀飙升是由石油和食品价格飞升造成的。

菲律宾将基准利率调升至5.25%,是该国3年来首次加息。此前几个小时,菲律宾政府宣布,同比通胀率已触及9.6%的9年高位。

印尼将利率上调至8.5%,与上月加息举措类似——当时是印尼自2005年12月利率触及12.75%以来的首次加息。印尼5月份同比通胀率为10.38%,为2006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表示,本周提高汽油价格的印度和马来西亚可能也会很快加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印度央

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可能会在7月份下次利率决策会议前宣布加息。印度目前的基准利率为7.5%。

在亚洲其它地区,台湾表示,5月份核心通胀率(衡量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消费者价格)从3.1%升至3.23%,创下近9年来最大涨幅。中国大陆4月份通胀率为8.5%,但预计中国政府下周将宣布,5月份的通胀率将略有下滑。

印尼的加息幅度仅为许多分析师预期的一半。印尼统计局周一曾警告称,上月国内燃油价格提高28.7%的影响,尚未体现到通胀率数据之中。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6月6日





Guide:

- ◀ Teaching for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a Focus on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 ◀ Using TV Commercials in ESL/EFL Classes
- ◀ Colloquial American Business Jargon Defined

Abstract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re is a lot of diversity in the ways in which speaker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use language to manage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even relatively mundane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can prove to be problematic. Furthermore, for native language teachers these mundane aspects of interaction are often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research used an intercultural teaching methodology to stimulate a small group of Japanese EFL learners to consid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on question "How was your week-end?" The learners' 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s were qualitatively analyzed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 conside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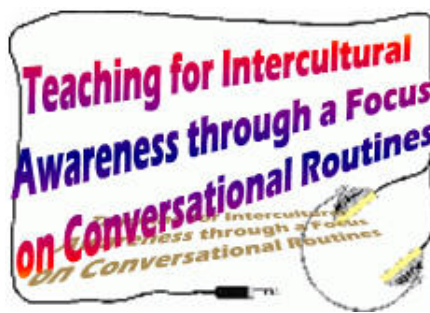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L

Introduct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rsect and the implications that this ha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oral practices,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routinized patterns of oral interaction that are shared by a specific group (Hall, 1993). It is thought that oral practices such as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play a discursive cultural role. That is,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hared frameworks that interactants use to structure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mselves (Atkinson and Heritage, 1984; Geertz, 1973).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ypes of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that speaker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use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social relationships (Scollon and Scollon, 2001; Rose and Kasper, 2001). By extension, the logic and expectations behind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that are taken-for-granted by speakers of one language may well be interpreted very differently by speakers from other background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case of routine formulas, which typically function as contextualization clues - invoking in the listener, expectations as to what kind of discourse should follow. A failure to adequately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formulaic utterances and routine formula as contextualization clues can lead to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Gumperz, 1992).

One exampl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failure to understand routine utteranc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een documented in Beal's (1992) analysis of workplace interactions in Australia. Specifically, she examined differences regarding the way native speakers of Australian English and native speakers of French interpreted the function of the question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when asked in the workplace on a Monday morning. She showed that whilst the act of asking about weekends ha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both groups, a mismatch in underlying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the discourse led both groups to interpret each other's behavior unfavorably. The Australian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the question is a relatively formulaic greeting and not too much detail is expected in response. However, the French participants tended to view the question as a 'real' question and thus thought it proper to give fairly detailed answers concerning their weekends. As a result of this mismatch the Australians expressed frustration at the length of their counterpart's replies, whereas the French found the Australians to be insincere.

Reading Beal's research made me reflect on my teaching experiences in Japan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I had heard Japanese students stereotyped as "socially inept" due to a so-called "inability to answer basic questions".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in Japan are often perplexed when their enquiries into how students had spent their weekends are met with the frank reply "I slept". Rather than social ineptness, what this suggests to me i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routin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weekend in English discourse.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lear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culturally-embedded discourse is unlikely to take place through simple exposure to input due to the fact that learners tend to approach L2 input with L1 interpretive frames (Schmidt,

1994).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language teachers to take an active approach to raising learners' awareness of the cultural nature of particular aspects of interaction (Kramsch, 1993; Rose, 1994).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is one in which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taught explicitl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eacher is responsible for prescribing som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to the students. Rather it means that the teacher is responsible for facil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 (Crozet and Liddicoat, 1999). In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there are several processes which are considered key. The first is the *examination* of L2 input in terms of its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Another is *reflection* on similar phenomenon in the learners' L2. Another key process is *comparison* of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L1 and L2 interaction in regard to a particular interactional phenomenon. To facilitate these processes both the L1 and L2 are viewed as important resources (Byram, 1994; Crozet and Liddicoat, 1999; Kramsch, 1993; Corbett, 2003). A central aim of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is to enable learners to develop awareness concerning the embeddedness of language in culture in both the L1 and L2. As learners come to learn about interactional norm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s having their own internal logic, it is hoped that learners will develop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be on the look out" for culture and construct their own hypotheses about the nature of culture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See Liddicoat, 2005 for an overview of the goals of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documenting the types of understanding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which can be generated by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to teaching aspects of interac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tribute to knowledge in this area through qualitatively examining the nature of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s (Liddicoat, 2006) developed by a small group of Japa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in regard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uestion “How was your weekend?” in spoken discourse.

Method

Subjects

The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were 8 intermediate level Japanese students of English (6 female and 2 male). The students were aged between 18 and 22 and were a part of an ‘English-majors’ stream at a hospitality college in Tokyo. All students had studied English for a total of 6 years in secondary schooling before enrolling in this program. All students had traveled internationally a number of times, but had not spent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abroad studying.

Procedure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was collected during a 100-minute session carried out in week 5 of a 13-week course on English communication. As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s not an official institutional aim of this course, this session was specially devised by the teacher-researcher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ven a single episode of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Students worked in small groups to examine several textbook dialogues depicting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conversing in the work place on a Monday morning. In all dialogues the weekend was taken up as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some dialogues showed very brief, routine-like exchanges, while other dialogues showed the weekend becoming the topic of extended discourse. After having some time to examine the materials,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number of initial speculative questions which encouraged them to analyze various aspects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relevant to understanding the dialogues (McConachy, In Press). The questions were particularly designed to help the learners consider how aspect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the nature of the questions that the dialogue characters asked each other, potentially reflect wider sociocultural struct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questions were prepared to stimulate the learners to reflect on and compare the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the dialogues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norms of Japanese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facilitate this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hat they were free to use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in the discussions. As the students were conducting the discussions, the teacher helped students express their ideas in English, and also provided further questions to clarify student responses and prompt a deeper level of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The initial questions used are listed below:

- ◀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in this conversation?
- ◀ What type of questions do they ask at the start of the conversation?
- ◀ Do you usually ask these types of questions in Japan?
- ◀ Do you feel that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Why? Why not?
- ◀ Do you think that the speaker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hy? Why not? Do you think “shuumatsu” is the same as “weekend”? Why? Why not?
- ◀ Is “shuumatsu” important in Japan? Why? Why not?



◀ Do you think the weekend is important in Western countries? Why? Why not?

The next stage of the lesson involves the students acting out some of the roles from the dialogue with their group members. Whilst the questions above were designed to ai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is activity was designed to encourage learners to consider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norms of interac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have the potential to influence an individual's feelings and conception of self (Byram, 1995). As the learners gained more confidence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role-play colleagues greeting each other at work on a Monday morning. This was conducted in order to allow the learners to experiment freely with the weekend as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 to “try on” this kind of English interaction – in a manner which was comfortable for them. As such, the language production was not viewed as an end in itself, but rather as a means for enhanc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on both a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leve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data for this research came from two sources. The first is researcher notes that were taken during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lesson. The second source is a reflective journal entry that each student was asked to write in either English or Japane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hat they should write about things that they learned in the lesson, but that this would not be used for assessment in any way. Student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reflect on how they felt when performing the role-plays, and how they felt in general towards this type of interaction – specifically,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question “How was your weekend?” The data from both sources were subjected to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matic categories were created from the data, reflecting the researcher's orientation to grounded theory.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had expressed a general unfamiliarity with the use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quality of the weekend and the notion of the weekend in general. In regards to this there wer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During the lesson the students showed a developing awareness of the cultural-embeddedness of aspect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the nature and

amount of questions. This also leads to the learners contemplating the impact of these potential differences on the self, and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ll comments below appear in English, although many have been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during the transcription process by the author.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surrounding the weekend in Japanese

Comments provided by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journals indicate that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involving enquiries into others' weekends are not common in Japan.

- (1) S4: *In Japan we don't usually go out of our way to ask about each other's weekends, so for me, it felt a little strange.*
- (2) S2: *In Japan, we don't really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others “How was your weekend?” so it felt a little strange for me.*
- (3) S1: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asking about weekends. If I were asked, I*





would think “Why do I have to tell people about things like this”. I mean, that is if the other person were Japanese.

Whereas Beal's (1992) research emphasized that even when questions such as these form part of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e discourse that goes along with it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may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As far as the learners above are concerned, discourse surrounding weekend activities is culturally unfamiliar. Without some kind of cultural frame (Goffman, 1974) for interpreting this type of question, the learners may have difficulty determining its significance for English speakers. In fact, at this stage of understanding, it is arguable that routin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weekend may even be imposing or face-threatening for the learner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learners to begin to develop explanatory frameworks for the cultural phenomena they encounter.

Explanations

Whilst all students were in agreement that asking questions about weekends was not common in spoken Japanese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s varied as to why this might be so. Here is one example.

(4) S3: *In Japan we don't usually ask what people did on the weekend, and I think people aren't really interested. I think that Westerners are friendly and this is why they ask about other people's weekends.*

In an attempt to find a way to explain intera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Japanese and English this student has attributed Westerne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friendliness”. The comment about Japanese people not really being interested in what other people do on the weekend seems to imply that the student feels that Japanese people lack this quality of “friendliness”. What can be seen here is a type of stereotyping of both cultures: “friendliness” is perceived as something inherent rather than something that is simply displayed in different way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both cultures.

Below another student provides quite an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5) S5: *I haven't really heard of people exchanging opinions over the weekend in Japan, however I think it's better to talk about it than not. I feel like people in Japan don't communicate enough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tend to bow rather than speak. Verbal communication is important and I don't think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well enough by just bowing.*

This student has drawn on a common image of a Japanese preference for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o explain the lack of oral practices concerning the weekend in Japanese spoken discourse. In other words, the student is suggesting that the lack of importance given to the weekend is simply an extension of a general tendency of Japanese people not to talk too much. Whether or not this is really the case, this student's verbalization of implicit assumptions concerning Japanese culture provides a stepping-stone for a reanalysis of both cultures in that now it has become a conscious phenomenon, capable of being reflected on and examined further. In the interaction below between S1 and S6 which took place in response to the initial questions, the attempt to explicate understandings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uumatsu”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esting conclusion.

In the interaction below it can be seen that through challenging each other's taken-for-granted knowledge of the concept of “shuumatsu”, the students were forced to make explici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ncept that had remained implicit. The result was that they became aware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in an unambiguous way.

(6) S1: *When is shuumatsu?.....It is Saturday and Sunday, isn't it?.*

S6: *I think so...but I'm not sure...I've never thought about it deeply. I heard that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working week was 6 days.*

S1: *Really? Is that true...I didn't know that.*

S6: *I think that's why we had to go to school 6 days a week too.*

S1: *Oh. Wow! I didn't know that. ha ha. But we still don't know what shumatsu is.*

In the reflective journal entry, S1 exhibited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pertaining to the cultural embeddedness of "shuumatsu" vis-à-vis "the weekend".

(7) S1: *I learned that vagueness of the concept of shuumatsu, such as when it begins and ends, might be a Japanese phenomenon. Maybe Japanese people don't think it's important. I think English speakers have a clearer idea of what the weekend is.*

This comment seems to show recognition of the weekend as a cultural artifact. It hints at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certain ideas or concepts affects the way we speak about them, and this in turn contributes to the

(Bruner, 1990). In concrete terms, prevalence of "shuumatsu" in the as being related to the generally, which is in turn reflected

A similar understanding is (8) S6: *In class, the teacher people work from Monday to Japan it might be the opposite. In*

working week is number one, and shuumatsu i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think about so much.

This comment again is interesting in that it allud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oral distinctions such as "working time" and "non-working time", and how these are arbitrarily assigned across cultures. As such, the construal of time itself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al value given to the activities that are considered meaningful within it. S6 implies that as working time is considered most valuable in Japanese culture,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shuumatsu" occupy a relatively unimportant status in the oral practices of Japanese people.

Student comments on aspects of interaction

During the lesson and again in the learning journal comments below, students explicated their perceptions of pote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oles of speakers and hearers in interaction.

(9) S3: *I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t is normal to ask a bunch of questions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but I think we don't do this so much in Japan. We don't really ask for specifics of things like that. We don't usually ask questions such as "Who with?", "When?", and "Where?"*

(10) S7: *In Japan, if we were to ask what another person had done on the weekend, the ensuing conversation wouldn't be very long, however I felt that people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really ask detailed questions.*

Aside from the comments above, S3 and S7 indicated to the researcher, unfamiliarity with the practice of generating such follow-up questions, even in Japanese. Such comments clearly show



way we conceptualize them S1 has perceived the lack of oral practices of Japanese people un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in the 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provided by S6 below.

said that in Australia many Friday to enjoy the weekend. In Japan working is a virtue so the



that the learners have begun to make explicit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interaction, both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What is important here is not so much whether their interpretations are necessarily true, but that they have become aware of aspects of interaction – the role of speakers and listeners in generating talk – and come to see that such important norms of interaction can be configured differentl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analysis below provided by S6 indi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hypotheses concerning not only aspects of interaction, but how this also has an affective dimension.

(11) S6: *I felt that asking a bunch of questions to people in the workplace is very different to things in Japan. In Japan conversations tend to take place with one or two utterances, so I felt that people from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re friendly.*

It can be seen that this learner has associated perceived interactional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questions in interaction as being related to wide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case, the friendliness of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What this shows is that the learner is still making assessments of L2 interactional behavior from an L1 perspective. In other words, this learner has perceived friendliness as something belonging inherently to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rather than something which is also able to be exhibited in Japanese, albeit in different ways. The difference here is perception of whether the act of asking multiple follow-up questions in English discourse is caused by friendliness, or simply a way of showing friendli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ent quoted below shows signs of a more developed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12) S5: *I think Westerners have a friendly feel about them. In Japan this would be thought of as being “over-friendly”, so I really feel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very difficult. I hope that I can communicate enough that the other person doesn't interpret me as being rude.

Rather than completely associating Westerners with the attribute of friendliness, this learner is making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cultures in their own terms. In other words, they have shown awareness of the contextual limitations on the expression of friendliness in a particular type of discours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norms for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Several other students also showed evidence of a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ces in interactional norms.

(13) S4: *I don't know how much I can ask or say without it becoming imposing for the other person. I'm kind of worried about this for when I go overseas.*

(14) S2: *I learnt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asking about weekends is a kind of greeting. I think it's hard to determine exactly how much one should ask and say, and this is something I'm going to keep in mind when I study overseas.*

The above comments show a certain amount of uneasiness with not knowing exactly what the rules of interaction are in regards to the amount of talk. This is perhap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In a certain sense, ignorance of the cultural variability of norms of interaction across cultures may given learners a sense of (false) confidence, that, when slowly stripped away, may leave learners feeling without anything to hold on to. However, the comments above suggest that the learners have begun to develop awareness of the particular aspects of interaction which can vary across cultur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uch differences has implication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other words, what is evidenced here is what might be called *intercultural meta-awareness*. It is intercultural in the sense the learners show evidence of developing recognition of the culturally-embedded nature of concepts and ways of interacting across cultures. It is “meta” in the sense that awareness of the potential complexities of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has helped these learners to understand the need to monitor the nature of their own perception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continue to formulate hypothesis through future interactions. In other words, awareness of the dynamic nature of language, culture, self, and other, has come to be placed as an object of ongoing conscious monitoring and reflection.



Conclusion

Contrary to the default expectations of many native speaker teachers, the common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that English speakers use to manage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not always based on a universal logic – we cannot assume that the intent behind questions will be equally obvious to our students. Even when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are shared, interactional norms may not be. In other cases,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may be absent in the learners’ culture and it will most likely take more than mere exposure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use.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how this might be taugh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he learners in this study have dynamically engaged with the learning material and each other through a process of examination, reflection, and comparison, which has led to numerous understanding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importa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learners have not only become aware of certain aspects of interaction in the L2, but they have also had to *bring to awareness*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concepts which they had taken for granted. This process forced the learners to challenge their own assumptions and begin to develop explanatory frameworks for aspects of interaction in both the L1 and L2. In some of the learners, awareness was generated concerning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actional import of concepts and common-sense ways of interacting across cultures. From this recognition, several learners were able to develop from this, insight into their own needs as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or – intercultural meta-awareness.

On the whole the dynamic nature of culture prevents it from being easily explainable or teachable. In fact, even within cultures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diverse explanations for cultural phenomenon, as this research has shown. The issue of importance is not necessarily that teachers impart cultural “truths” to learners in the classroom, rather that students develop an awareness of the general nature of culture and start to develop the skills necessary for future culture learning. It is key to remember that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is an ongoing process and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aim to incorporate activities which encourage learners to develop the skills of examining input, reflecting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comparing noticed phenomena and developing hypotheses about language and culture.



References

- ◆ Atkinson, J.A., and Heritage, J.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Beal, C. (1992).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Or wh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imple question i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Austral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 (1), 23-52.





-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Byram, M. (1994). Teaching culture and language: 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In D. Buttjes & M. Byram (Eds.), *Mediat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p.17-30).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 Byram, M. (1995).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mobility in multinational contexts: A European view*.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 Corbett, J. (2003).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 Crozet, C. and Liddicoat, A.J., (1999). The challenge of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Engaging with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 In Lo Bianco, J., A.J., Liddicoat, & C. Crozet. *Striving for the third plac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pp. 113-125). Melbourne: Language Australia.
-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 Gumperz, J. (1992). Contextua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A. Duranti and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pp. 229-2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Hall, J.K., (1993). The role of oral practices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our everyday lives: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of interaction with implications of the learning of another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4 (2), 145-166.
- ◆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Cleve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Liddicoat, A.J., (2005). Teaching languag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D. Cunningham & A. Hatoss (Ed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policies, practices and proficiencies* (pp. 201-214). Belgrave: FIPLV.
- ◆ Liddicoat, A.J., (2006). Learning the cultu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personal address forms in French.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6 (1), 55-80.
- ◆ McConachy, T. (In Press). Raising sociocultural awareness through contextual analysis: Some tools for teachers. *ELT Journal*. 63 (1).
- ◆ Rose, K. (1994). Pragmatic consciousness-raising in an EFL context. In L. Bouton & Y. Kachru (Eds.),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monograph series, 5, 52-63. Division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 ◆ Rose, K.R., & Kasper, G. (2001). Pragma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In K.R., Rose & G. Kasper (Eds.), *Pragma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pp. 01-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Schmidt, R. (1994). Consciousness, learning, and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In G. Kasper & S. Blum-Kulka (Eds.),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pp. 21-4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Scollon, R. and Wong Scollon, S. (200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Malden: Blackwell.



Introduction

With the explosion of the Internet's vast repositories of media growing daily, language teachers are receiving almost innumerable amoun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online resources. One resource that fits nicely into the limited English abilities of many ESL/EFL students is the standard television commercial. These short 45 second sound and video bytes offer teachers a tool to teach not only language, but also culture and critical thinking.

Why Use Commercials in an ESL/EFL Class

Using TV commercials in the ESL classroom brings a number of benefits to language teachers. First of all, TV commercials are seconds. Their size is ideal for new Erkaya, 2005). They are not so material like TV shows or movies them easier to select. Finding a generally requires more be used. TV commercials are prepare because of their length. TV designed to be entertaining (Smith times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repeating a song or phrase from a TV commercial?



short, typically lasting 30 to 50 language learners (Davis, 1997; long as to drown the students in do. Their brevity also makes good TV or movie segment preparation and setup in order to easier to select, manipulate and commercials are also catchy and & Rawley, 1997). How many

Another great blessing is that commercials contain authentic content (Smith & Rawley, 1997); they are written for native speakers and spoken in authentic English, and not just the native speakers from one culture; TV commercials are created in many different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students to have exposure to a variety of Englishes. Thus, by using TV commercials from a variety of different locations including the UK, USA, Australia, etc., language teachers can introduce different accents, dialects, and indeed different Englishes, and thereby allow their students to expand the reach of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Another advantage is the variety of voices that TV commercials can provide far outnumber typical listening materials in listening textbooks.

An additional benefit is the visual elements of TV commercials that further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 commercial's meaning. A number of studies suggest (Davis, 1997; Lee, 1994) that students who are exposed to commercials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skills and augment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The visual clues of a TV commercial provide scaffolding for students to assist them to understand the linguistic meanings in the commercial. At the same time, teachers can use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commercial and the cultural elements contained therein to teach critical thinking and culture (McGee and Fujita, 2000). In any teaching context, it is crucial that the curriculum teachers use is based on clear and specific goals so that they can appropriately find materials, methods, and forms of assessment (Richards, 2001).

How to Find and Select TV Commercials

One way to begin searching for a commercial is by determining objectives. Teachers should define the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logical objectives that they desire to focus on when searching for an appropriate TV commercial. For other teachers, identifying specific objectives first and then hunting for appropriate TV commercials makes finding TV commercials more difficult; they prefer



to have general objectives in mind while browsing TV commercials so that that expand their options. Still others have no specific objectives at all; they simply go hunting and locate commercials that appear to be good for teaching language. Then they collect them and devise objectives and make materials later. Whatever process you choose, you will need the TV commercials 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Developing Activities with Commercials

One of the more time consuming activities in the past was locating commercials. Today, they are easi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So, when you are ready to collect URLs or even the TV commercials themselves, you need a place to go hunting. There are a number of sites to locate good commercials, commercial parodies, and short amateur videos. A list of some of the currently popular sites to find commercials is located in Appendix B.

The next step after selecting objectives and finding a good TV commercial is developing activities. The following example will demonstrate the steps we use to develop TV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standard approach we use is:

1. Pre-viewing activities
2. Viewing the TV commercial
3. Securing adequate comprehension
4. Exploring linguistic components
5. Discussing cultural and values laden components
6. Practic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y examining the TV commercial critically

After searching for good TV commercials, we discovered a useful one from Club 18-30. The commercial occurs in a cosmetics shop where a young lady is trying on some lipstick. It is a very simple commercial that contains only three sentences.

Customer: Does this make me look cheap?

Clerk: Oh no. Not at all.

Customer: Do you have any that does? (Club18-30)

It is short and yet it is a complete mor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It also contains limited linguistic information and is entertaining.

Pre-viewing Activities

As is true with most activities, the initial segment is intended to pique the curiosity and enliven the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Thi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beginning a discussion with open ended questions about attraction. Ask students why they dress the way they do or why they wear makeup? What is the message they are trying to send? It is also to begin asking moral type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appropriate dress? Still other teachers may want to create a survey or handout, or develop predicting activities for this brainstorming activity.

Show the Video

Show the TV commercial several times until you are certain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scenario and content. As they are viewing the commercial, ask for clarifications. You may want to view the commercial without sound initially to allow students to experience it with less input





(Smith & Rawley, 1997). Some teachers show the commercial in class; others make this a homework assignment, in which case the commercials should be reviewed prior to continuing to the other activities

Focus on Linguistic Components

Since this commercial contained a limited amount of linguistic and lexical data, it was easy to focus on the 2 only grammar areas available: Yes/no questions and noun clauses. For the lower level grammar element, we created a number of Yes/No question drills and dialogs for the students to complete and act out. Upper level students received noun clause focused activities.

Although there existed few words in this commercial, the topic of appearance allowed us to introduce many new words related to appearance. These new words and explained grammar can be included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like drills, scripts, surveys, information gap activities, and presentations that students can practice or develop and thereby strengthen their language skills.

Explore Culture and Values

In addition to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focus, this commercial also enables teacher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and values laden components. For example, this commercial allows teacher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appearance, why it is or is not important, the rationale for developing an appearance, the cultural importance of identity, etc. Lower level students will need more scaffolding for these discussions, but their interest will be high. Teachers may need to write up communicative forms for students to use in a discussion. More advanced language students can practice discussing topics like identity, appearances, human value or any other cultural/value component evident in the commercial.

When teaching with authentic short videos,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ll four of these components are being transmitted at the same time and is therefore sometimes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m when teaching; they tend to overlap and that is actually beneficial. Better language learning is usually in a context that includes culture and values. So TV commercials make a great snapshot from which to teach all four of these elements. Although that may be true, teachers would be wise to model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a commercial for culture or values.

Practic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lthough the teach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s a common objective in many ESL textbooks and materials, several authors suggest that many Asian cultures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overt critical thinking,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is true. But we recognize that Asian students can think critically; they simply have not been taught, have not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or have been discouraged to do so because of their culture. There are even cultures that discourage critical thinking (Atkinson, 1997). Although that may be true, we would favor Brown's (2004) approach which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to take advantage of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m. In light of its benefits, instructors should consider the value of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fact, since culture, languag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re inexplicably intertwined in Western English, anyone desiring to master English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self expression. We also agree with Day's (2003) conclusion that the benefits of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outweigh any possible problems. Finally, As some of us are Japanese nationals who speak and teach English, we recognize that critical





thinking is also a part of our culture, but the expression of those thoughts is different.

So teaching critical skills is linked to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nalyzing TV commercials is an excellent way to learn and practice critical thinking. Teachers can remind students that commercial makers are trying to convince or manipulate the audience to buy a product or service. Students can use that information to critically analyze the commercial. In our example, teachers can ask students about the intended audience and about the choices the producers made in designing the commercial. For example:

- Who is the intended audience for this commercial?
- Why did they choose this girl to represent their service?
- What message are the producers trying to convey to the intended audience?
- What message does the commercial imply about some girls? Is this an effective commercial? Explain.

These questions can form the basis for in-class or online discussions, or analysis papers.

Conclusio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can provide a treasure trove of languag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 materials are easily accessible and many times are free to use in classes. They not only provide jumping off points to learning discrete linguistic and lexical elements, but also provide an avenue to exploring culture and values.

Bibliography

- Brown, H.D. (2004). Some practical thought about student-sensitive critical pedagogy. *The Language Teacher*. 28(7);23-27. Retrieved from the Internet August 15, 2006 <http://www.jalt-publications.org/tlt/articles/2004/07/brown>
- Davis, R. (1997). TV commercial messages: An untapped video resource for content-based classes. *The Language Teacher*. 21. (3), 13-15. Retrieved from the web July 29, 2005 from <http://www.esl-lab.com/research/cms.htm>
- Club18-30. (2000). Make-up. Retrieved from the Internet on May 15, 2006 <http://veryfunnyads.com/ads/24902.html>
- Erkaya, O.R. (2005). TV Commercials as Authentic Tools to Teach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cal Thinking. *MexTESOL Journal*. 29(1).
- Goldthorpe, J. (1993). Talking back to TV: Media Literacy and writing. Paper presented the annual Conference o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San Diego, CA. (ERIC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63880).
- Katchen, K. (1993). Turning the tables: Choose the videos, construct the course. Paper presented the annual TESOL conference, Atlanta GA. (ERIC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69270).
-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1994). The effect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of using television commercials in a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 Research Report. (ERIC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 McGee, K. & Fujita, T. (2000). Playing the semiotic game: Analyzing and creating TV commercials in an ESL class. *The Language Teacher*. 24(6), 17-24.
- Mendelsohn, David J. and Rubin, Joan (Eds) 1995. *A Guide for the Teaching of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Dormin Press, Inc.
- Smith, A. & Rawley, L. A. (1997). Using TV Commercials to Teach Liste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e Journal of the Imagin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Vol.4. Retrieved from the web July 29, 2005. <http://www.njcu.edu/cill/vol4/smith-rawley.html>

Appendix A

Lesson plans for using an Apple commercial (Think Different-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n_Ied9t4M Here's to the Crazy Ones)

Lesson Plans - Lower Level

1. Pre-activity
2. First viewing
3. Check pre-activity
4. Research one person in the commercial
5. Listening only (words they hear)
6. CLOZE activity
7. Pronunciation practice
8. Analysis of components of commercial

Lesson Plans - Higher Level

1. Show the commercial & comprehension check
2. Discuss the purpose & explain why you agree or disagree
3. Identify the characters
4. Research the people in the commercial
5. Rank the characters
6. Add/remove characters
7. Make your own list from (e.g. historical, personal)
8. Create your own commercial



Appendix B

Websites to find commercials and short videos

- <http://x-entertainment.com/downloads/>
- <http://www.bluefishtv.com/>
- <http://www.stupidvideos.com/>
- <http://www.apple.com/trailers/>
- http://www.movieflix.com/genre_list.php?genre=Commercials
- <http://www.roadode.com/classicindex.shtml>
- <http://www.esm.psu.edu/faculty/gray/movies.html>
- <http://www.youtube.com/>





- <http://www.veryfunnyads.com/>

Note

If the goal is more than merely identifying the web address of the site or video, then you may need a plug-in to assist you. We recommend using DownloadHelper - a plugin that works with Mozilla's Firefox <http://www.mozilla.com>. The plug-in allows users to download any Flash video file from dozens of sites. Simply install the plug-in, restart the browser and head to your favorite video site. Once a page you are viewing contains a TV commercial, click on the download button next to the web address window and save the file. Now you can use this file in your teaching. If you are tech savvy, you can insert the TV commercial into a webpage or add it to your cours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also possible to simply add a link to the TV commercial and thereby avoid downloading TV commercial altogether.

Colloquial American Business Jargon Defined

Saying	Meaning
20-20 hindsight	perfect knowledge but too late
(someone is) the 800 pound gorilla	most important party to a transaction/or in a group
a lick and a promise	incomplete or limited preparation
a ris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	something that benefits all (Pres. Kennedy)
an Old (China. Japan, etc.) Hand	someone with long experience in the place
at loggerheads	disagreement
at the 11th hour	at the last minute
base-tending	protecting one's assets
begin on a shoestring	start with limited finances
bootstrapped	develop by yourself without outside support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from politics, Involving both parties
bring to the table	what you offer to a transaction
cake walk	easily accomplished
carve out a niche	find a special position to monopolize





Catch 22	what ever you do, it won't work (Joseph Heller book)
Chinese wall	separation between two parts of same unit
computer virus or bug	software corruption
deep pockets	wealthy; has ability to pay
do you read me?	do you understand (military communications)
dog and pony show	financial presentation
don't make waves	don't disagree or contradict policy
down in the dumps	depressed
downtime	period when equipment isn't available to perform
draw a line in the sand	make final condition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featherbedding	a job that is not necessary (union term)
fence-mending	apology; smoothing bad relations
free ride	obtaining benefit for no cost
from Day One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scratch	from the beginning
goal-tending	protecting one's assets
going great guns	doing well
hacker	computer expert breaking into a system
hold feet to fire	force, bring pressure
how does that play in Peoria	what is reaction of average person at grass roots
I need it yesterday	jocular way to say it is needed immediately
in the black	profitable
Indian Summer	unusual warm weather after summer is gone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法 学 动 态	➤ 新法解读 ✧ 最高检公安部权威解读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补充规定
	➤ 法治论坛 ✧ 金融监管竞争、冲突与协调——兼论我国混业经营监管的制度选择 ✧ 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 法学教育 ✧ 中国法学教育的结构失调及对策
2008年6月	第4期 [总第二十一期]

新法解读

最高检公安部权威解读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补充规定 划明五种证券类犯罪“起刑点”

内幕交易证券成交额累计 50 万元 获利或避免损失超 15 万元均可被追诉

2008年2月4日,被誉为“股市内幕交易第一案”——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在浙江省丽水市尘埃落定。杭萧钢构公司年仅27岁的证券办原副主任等三名被告人,因内部交易获利4000万元被依法严惩。

整治内幕交易、打击操纵证券市场的非法行为,成为万千股民最迫切的心声,同时也是执法机构肩上的义不容辞的责任。5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有关内容。

“情节严重”、“遭受重大损失”没有具体标准不利于打击证券犯罪

随着证券、期货市场的活跃,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现象明显增多,新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手段和形式也层出不穷,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

据介绍,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原有的部分证券、期货犯罪进行了修改,并且增设了新的证券、期货犯罪罪名,为有效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说,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实施后,其中有些关于证券、期货犯罪的追诉标准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打击证券、期货犯罪的实际。

比如,刑法、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的“情节严重”、“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没有具体的标准,在执法实践中,不便于依法准确打击破坏证券、期货市场的违法行为。

“补充规定的制定是对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的有关证券、期货犯罪构成的细化,有利于司法机关统一执法,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从而有效打击证券、期货犯罪。”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内幕交易等五种证券及期货犯罪追诉标准划明





补充规定规定了五种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具体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

目前,刑法规定中有十几个罪名涉及证券、期货犯罪,为什么补充规定只对内幕交易等五个罪名的追诉标准作出新的规定?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主要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后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修改后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修改、补充,新增设了第169条之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85条之一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虽然刑法修正案(六)并没有进行修改,但是考虑到2001年的标准规定的比较原则,也需要进一步细化规定。

多次进行内幕交易纳入追诉范围

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两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补充规定一是将内幕交易数额追诉起点规定为买卖证券的成交额累计50万元、买卖期货合约占用的保证金数额累计30万元。

“二是增加了有关获利及避免损失的数额标准的规定,将获利或者避免损失15万元作为追诉标准。”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说,这是因为从司法实践已经判决的内幕交易案来看,有的进行内幕交易的数额不是很高,但是获利数额比较大。

三是对多次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应当追诉。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考虑到该罪侵犯的主要是上市公司的财产性利益,所以主要从上市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的数额以及因背信行为导致股票、债券被终止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等方面规定追诉标准。出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在损失数额上规定了150万元的绝对数额标准。

“内幕交易等5类证券犯罪追诉标准的重新调整,将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这样评价新标准的出台。

来源:中国普法网 <http://www.legalinfo.gov.cn/> 记者 赵阳 徐伟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12日

法治论坛

金融监管竞争、冲突与协调——兼论我国混业经营监管的制度选择

廖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如何应对因金融创新和混业发展而加剧的金融监管竞争与冲突,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混业经营监管体制,是当前金融监管中的一个突出课题。金融竞争有其自身价值,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对金融冲突也需要注意到其深层背景。金融集团的发展强化了金融监管竞争与冲突,也使得金融监管协调更为必要。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是金融监管协调的两种路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借鉴伞形监管经验,建立分业监管基础上的协调机制,是更为可取的选择。

关键词: 混业经营 金融集团 监管竞争 监管冲突 监管协调

在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水平高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全球市场的背景下,良好和健全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金融业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监管能力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 其中,如何应对因金融创新和混业发展而加剧的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构建适应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混业经营监管体制,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2003年《商业银行法》修订和2005年《证券法》修订时,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形式,为混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但是,对于与此相应的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立法部门并未明确化,





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面对以英国金融服务局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架构晚近以来的流行,关于在我国设立某种形式的综合监管机构的呼声不绝于耳。然而,且不论单一架构本身是否是理想监管模式这一问题迄今并无定论,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体制是否适合中国。单一监管所赖以立足的成熟的市场体系和监管实践,所意味着的巨大的机构和制度融合成本,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管权力的高度集中等等,都令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制度移植中的“排斥反应”。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建立分业监管基本格局基础上的协调机制,解决关键监管冲突,同时保持适度监管竞争,也许是更优选择。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金融竞争和冲突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第二部分分析金融集团的发展对于金融竞争和冲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讨论作为应对方案的金融监管协调的两种路径。第四部分结合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与特点,论证较之单一监管架构,分业监管基础上的协调机制更为可取,并就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提出建议。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一、金融监管竞争与冲突

(一) 金融监管竞争

在金融监管权被多个监管机构分享的任何体制下,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实践永远不会始终被规则束缚,即使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非传统金融产品也会带来产品定性和监管权归属的问题。而在混业经营体制下,无论是采取全能银行还是控股公司形式,不同性质金融业务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都大为加强,使得金融监管的竞争更加凸显。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政策的生成并非基于抽象的“公共利益”,而是不同利益集团各自特殊利益角力和妥协的结果。[2] 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不可避免的会更多受到各自部门内利益集团(亦即监管对象)的压力和影响,另一方面自身在争取监管权限和监管资源方面也有其特定利益。因此,现实中金融监管机构总是倾向于尽力维持自己的监管范围,同时积极进入和消减其它监管机构的势力范围。这种监管竞争被形象的称为“地盘之争”(turf war)。

金融监管竞争被广为诟病的一个可能产物是所谓“竞次”现象(race to the bottom),即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利益集团、吸引潜在监管对象或扩展监管势力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以致削弱整体监管水平,损害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来说,监管机构越多,监管结构越复杂,竞次风险就越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即提供相同产品的不同金融机构因受到不同监管者的监管,造成规则、标准和执法实践上的不一致,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尝试改变其类属,以便将自己置于监管标准最宽松或者监管手段最平和的监管机构管辖之下。[3]

不过,不应过分高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就竞次现象而言,一方面,在监管机构数量有限、监管体制相对集中的情况下,竞次问题并不会十分突出;更重要的是,通过为各监管机构设定更为清晰的监管目标和任务,并建立和落实有效的问责机制,竞次倾向可以得到抑制。毕竟,监管机构需要为自己的监管失败承担责任。就监管套利而言,该问题主要同以经营主体/机构作为监管划分标准的“机构监管”模式相联系,通过向着着眼于金融产品/业务的“功能监管”模式转变,并加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有可能加以解决。即使无法完全解决,监管套利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也未必全无益处。[4]

金融监管竞争拥趸的理由植根于传统的“分权与制衡”理念、金融机构的选择自由、以及对于监管弹性的追求。面对日益细化和复杂的金融市场,监管机构每每力有不逮,难免出现判断错误。基于此前提,多“脑”思考、多“眼”监督的监管体制,比集中判断的单一监管更有利于减少监管决策错误。[5] 更为重要的是,在合而为一的综合监管体制下,失去了监管机构之间的制衡,将没有力量制约监管机构可能的过度监管(over-regulation):单一机构的监管会不可避免的趋向严苛死板,而对市场需求变得感觉迟钝。保护金融经营者免受这种“监管狂热”之害的关键,就是确保其有多个监管者可供选择,这种选择自由可以成为独断和反复无常监管政策的制约因素。[6]

(二) 金融监管冲突

金融监管冲突可以在两层意义上加以理解。在基本意义上,金融监管冲突是指由于监管权限本身的划分不清,或者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超出既有规则框架,而导致不同监管机构之间职权/职责的冲突。如果说前者属于立法疏漏,那么后者则是市场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方面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边缘金融产品或替代金融产品的出现。这些金融产品兼具不同传统金融产品的特征,游走于边缘,难以完全归入任何传统金融部门。监管冲突既可以表现为积极冲突,即不同监管机构竞相实施监管,从而造成监管重复





(regulatory duplication),也可以表现为消极冲突,即不同监管机构均回避或遗漏监管,从而形成监管真空(regulatory gap)。

在另一层意义,也许也是更深刻的意义上,金融监管冲突是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因为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方法(手段)乃至监管文化方面的差异,在监管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矛盾和分歧。当监管领域出现交集时,这种分歧可能演变为现实的冲突;即使是在画地为牢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和消费者整体上也可能会因为这种分歧而受到不利影响。

从监管目标上看,由于银行同宏观经济的密切联系,银行监管者将防范系统风险、维护系统稳定作为核心目标;保险监管者将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作为核心目标;证券监管者则对投资者保护,确保市场公平、效率和透明,以及减少系统性风险三个目标给予同等重视。[7]与监管目标相适应,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侧重于确保被监管机构清偿能力(solvency)的审慎性监管(prudential regulation),而证券监管者在审慎性监管之外,更注重通过对业务经营行为(conduct of business)的监管,确保市场的公平、效率和透明。在监管目标、理念和方法上的差异,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各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风格或者说监管文化。与较为温和内敛的银行和保险监管不同,证券监管机构通常更为强硬,强调信息披露和自律监管,依靠更为激进的执法手段处罚不当行为人,遏制违规行为。这种立足于严格披露要求和严厉执法措施的监管文化,与银行和保险监管者侧重监管对象安全与稳定的更为“家长式”(paternalistic)的监管文化相去甚远。[8]

二、金融集团的发展及其影响

作为金融混业经营载体的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 [9] 既使金融监管竞争与冲突问题变得更为现实,同时也对其有所强化。目前对金融集团并无普遍适用的法律定义,就其基本内涵而言,大致是指具有统一协调的组织结构,主要业务为金融业务,并且在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中至少从事两种业务的企业集团。[10] 金融集团形式多样,代表性类型包括全能银行型、银行母公司型和金融控股公司型。金融集团的发展对于金融监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集团结构复杂、集团缺乏透明度、集团内交易带来的风险传播和利益冲突、各专业监管机构无法获得实施监管所需要的充分信息等。在金融集团银证联营乃至银、证、保联营的情况下,针对同一集团的审慎监管和业务经营监管之间的分歧会更为明显,系统性稳定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之间的冲突会更加频繁,不同监管方法和监管文化之间的碰撞也会更加激烈。[11]

在我国这样一个金融法律制度尚不发达,金融监管经验尚不丰富的国家,金融集团发展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加剧了监管的消极冲突,即因没有监管部门有效实施监管而形成的监管真空。我国虽然尚无金融集团立法,但事实上的金融集团已经广泛存在,其中既有历史形成的特例,也有近年来金融市场变化及金融混业政策逐步开放的产物。由于缺乏明确规范,我国金融集团的形态和结构不一而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由纯粹控股公司控股下属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集团;(2) 由金融机构设立/控股其它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集团;(3) 由大型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形成的混合集团。我国金融集团在立法滞后情况下的事实发展及其对监管消极冲突的加剧作用,在德隆事件中表露无遗。德隆旗下有200余家关联或控制企业,除工商企业外,还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几乎涉足了国内所有金融业务领域。金融与产业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合,是德隆能够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德隆事件充分显示了金融集团的发展对于监管消极冲突的强化效果:金融集团的监管权限、市场准入资质及许可、金融业务与工商业务的联营限制、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控制(“防火墙”制度)等关键制度均未建立,使得监管操作无章可循,监管对象有机可乘;而监管沟通与信息共享以及应急协调机制的缺位,则使得集团风险没有得到及时的识别、评估和化解,导致损失扩大。

三、金融监管协调的两种路径

金融监管内在的竞争和冲突,尤其是金融集团的发展带来的强化效果,使得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面对金融机构界限的日益模糊,传统的以经营机构作为监管基础的机构监管逐渐转向以业务/产品作为监管基础的功能监管,以使监管权限的划分更为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牵头监管者、伞形监管架构乃至单一监管机构等不同方式,协调监管运作。

(一) 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





所谓机构监管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entity regulation) 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 即同一类型金融机构均由特定的监管者监管: 银行监管由银行监管者负责, 证券公司监管由证券监管者负责, 保险公司监管由保险监管者负责。这是历史上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12] 在机构监管体制下, 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所有监管事项由相应机构监管者统一负责, 而不论其涉及何种金融业务。机构监管有其合理性, 但随着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 尤其是金融集团的出现, 机构监管方法逐渐不适应现实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往往提供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 而这些业务却受到不同监管机构按照不同标准进行的监管, 形成监管差别; 监管上的差别会导致激励方面的差异, 在其它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会使得市场竞争条件出现差别, 不利于公平竞争。

相比之下, 功能监管 (functional regulation) 的基本理念是, 相似的功能应当受到相同的监管, 而不论这种功能由何种性质的机构行使。[13] 在金融监管领域, 功能监管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美国, 在此之后成为美国历次金融改革法案的必备话题, 并最终在 1999 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 以下简称 GLBA) 中得以确立。[14] GLBA “规定了功能监管, 由州和联邦银行监管者监督银行业务, 州和联邦证券监管者统辖证券业务, 州保险委员会负责保险经营和销售……将最有经验的监管者置于其最熟悉的金融业务监管领域”。[15] 为了体现功能监管理念, GLBA 废除了联邦证券法对于商业银行的适用豁免, 要求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证券业务转交单独的关联机构或子公司进行, 并接受 SEC 的监管。同时, 为了解决功能监管下金融创新产品在监管归属上的潜在争议, GLBA 第 205 节专门规定了对“新混合产品” (new hybrid product) 的监管权: 原则上新混合产品归属 SEC 监管, 但 SEC 在制订规则之前, 应就与新混合产品有关的证券商注册要求与联邦储备委员会 (以下简称“联储”) 协商并取得一致。

在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强化业务监管方面, 功能监管优势明显。但是, 如上文所述, 在涉及整体风险和清偿能力的审慎性监管方面, 功能监管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这一点在金融集团的监管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各功能监管机构对金融集团各种业务实施功能监管的同时, 还需要有一个机构从整体上把握金融集团的风险和清偿能力, 实施审慎性监管。为此, GLBA 明确规定联储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总体监管者, 或所谓“伞形监管者” (umbrella regulator),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法定监管权, 有权基于审慎性需要, 对其财务、风险和合规情况等进行检查, 并随时要求其提交有关报告。[16]

(二) 单一监管: 最佳选择?

截至 2005 年, 已有至少 50 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综合监管体制: 或者设立全面负责所有金融部门监管的单一机构, 或者赋予特定机构监管至少两个主要金融部门 (银行+保险、银行+证券、证券和保险) 的权限。[17] 尽管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在北欧国家出现, 但综合监管这种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催化剂和焦点是 1997 年英国金融服务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的建立。下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以英国 FSA 模式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模式展开。

单一监管的拥趸列举了其诸多优势, 如更好的监控跨部门金融风险、更有效的监管金融集团、避免监管俘获、有助于消费者保护、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 等等。[18] 但是,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所有支持单一监管的主要论证中, 都能发现其一系列相应的抵销性的缺点。[19] 因此, 笔者不拟对单一监管的优劣逐一辨析, 而是试图从以下三个角度观察其是否一定是金融监管的最佳选择: (1) 金融监管者选择单一监管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以及这些理由是否充分; (2) 单一监管之于金融竞争与冲突的影响如何; (3) 单一监管有效发挥作用所需的外部条件如何。

在世界银行对实行综合监管的国家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中, 问题之一是采取综合监管的主要理由。各国监管者选择最多的三个理由依次是: (1) 更好的监管朝向全面混业发展的金融体系; (2) 最大化规模和范围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降低监管成本; (3) 解决既有监管机构沟通与合作不佳的问题。[20] 第一个理由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 即金融混业的发展不仅在模糊金融机构的界限, 也在模糊金融业务/产品的界限, 传统的金融业务疆界正在消失, 分业监管不再现实。然而, 研究表明, 不同行业的核心金融业务仍然是可以清晰区分的。[21] 例如, 银行业的核心业务是吸收活期存款和发放商业信贷, 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匹配性 (mismatch), 这一核心特征是其它金融产品所不可取代的。[22] 具有显著差别的核心业务的存在, 是功能监管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础; 非核心业务的模糊化, 则可以通过监管协商和冲突解决机制来应对。对于第二个理由, 该项调查报告本身即指出, 就规模经济而言, 并无确凿的数据表明新监管机构的运营成本低于之前各监管机构运营成本之和; [23] 而在范围经济方面, 经验表明综合监管者内部的组织结构趋向于反映传统的机构界限, 其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 尚待观察。[24] 至于加





强监管沟通与合作的问题,同样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综合监管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会自然比功能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更为良好。[25]

尽管单一监管可以消除监管机构之间的地盘之争,防止竞相现象,但监管制衡却也随之失去。结构的庞杂和权力的集中易于强化单一监管机构的官僚性,使监管趋向于固执和严厉,而对市场需求无动于衷。同时,在单一监管机构内部仍按传统机构界限划分部门的情况下,代表不同金融领域的各部门之间的机构内竞争依然存在,强势部门(如银行监管部门)有可能获得单一机构的主导权,从而产生片面监管的风险。同样的,反映传统监管机构特征的各部门之间在监管理念、监管方法和监管文化方面的冲突并不会因机构整合而自然消失,只不过由机构间冲突内化为机构内冲突。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整合监管规则,即以统一的监管方法和规则,取代各部门所依赖的传统方法和既有规则。然而,规则整合的难度更甚于机构整合;在设立综合监管机构的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制定了适用于整个金融体系监管的统一规则。[26]

在单一监管模式有效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方面,一项针对68个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实证研究显示,金融监管集中程度/可能性与制度环境良好程度成正比,与市场规模和中央银行的参与程度成反比。[27]换言之,这意味着:(1)制度环境越成熟,“良治”(good governance)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综合监管;(2)市场规模越大,越不易于实现综合监管;(3)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角色越积极,越不易于实现综合监管。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意欲效仿单一监管的国家不无参考价值。

四、我国的制度选择与完善

(一) 分业监管抑或单一监管

理解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最好的方法是用历史的眼光观察。美国坚持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架构、拒绝集中监管,固然体现了历史形成的牢固传统,英国采用单一监管架构、整合监管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形成而非刻意设计的结果。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对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也适用于对可能的借鉴与移植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经营和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混业经营,分业监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个阶段。现行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确立,如果从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起算,不过十余年;如果从1998年保监会成立和《证券法》颁布起算,还不到十年;而如果从2003年银监会成立起算,则不过短短数年。目前各监管部门还处在做好各自领域的基础监管工作,完善分业监管体制的阶段,更需要的是总结监管经验,巩固既有成果,获取更多的分业监管收益,而不是在缺乏足够论证和经验支持的情况下贸然启动监管整合。

总结我国目前对分业监管体制的诟病,其实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不能有效监管金融集团;第二,不能有效应对以形形色色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的发展。但是,通过确立功能监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法定监管协调机制,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相反,基于上文的相关分析,我国目前并不适于建立单一监管体制。

首先,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金融部门之间的差异多于共性,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之间还有着清晰的划分,远未发展成熟到需要/可以由单一机构实行一体化监管的程度。其次,如上所述,单一监管有两层含义,即机构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如果仅仅整合机构,那么所形成的综合机构与伞形架构其实区别不大,并不能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长处。然而,鉴于我国现有三大监管机构的规模,即使仅仅进行机构整合,也将意味着巨大的变革成本。至于监管规则的统一,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制度的实际情况,更是极不现实。再次,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存款类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在金融业内占据统治地位,金融业仍然以银行为主导,[28]实力上的显著不均可能导致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单一机构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使得监管资源分配或监管政策设计出现倾斜。最后,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立的时间较短,加之金融业国有比重较大,监管部门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监管独立性并未充分确立。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多头监管,大一统的单一监管模式更有可能为行政干预和利益集团监管俘获创造条件。

因此,从我国目前实际出发,单一监管并不适宜,保持和完善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至于因金融创新和金融集团发展而加剧的金融监管冲突,则可以通过加强机构间监管协调来解决。

(二)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建议

1. 建立人民银行主导的法定监管协调架构





2003年通过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其中,《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和《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应当在相互之间及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则授权/责成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是,迄今为止的金融监管协调仅限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不定期召开的监管联席会议,停留在政策层面,不是法定机制,内容也以“务虚”为主,实际收效甚微。事实上,从本文第三部分关于金融监管协调的分析中不难发现一个共性的特征,即存在一个总体意义上的监管者,对金融机构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惟其如此,金融监管协调才具有坚实的平台。反观上述法律有关协调机制条款,并未创设这样一个监管主体,甚至也没有提供推定出这样一个总体监管者的余地,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管协调。既然按照上文分析,我国并不适宜实行单一监管,那么当务之急,便是确定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者。

目前来看,最适合担任伞形监管者的,莫过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使是在实行综合监管的国家,中央银行在发布和修订有关审慎性法规、授予或吊销金融机构牌照以及制定有关金融系统整体的重要法律方面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9]出于有效履行货币政策职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有效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以及发挥比较优势和降低监管成本等考虑,中央银行需要行使一定金融监管职能。[30]同时,肩负宏观经济良好运行职责的中央银行,也能够更好的在防范金融风险与允许适度风险行为以保持宏观经济活力之间保持平衡,而不像并不承担宏观经济职能的其它监管机构那样,存在过度压制风险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的倾向。[31]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而治,缺乏人民银行那样的超然地位;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历史上曾经是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者,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能均袭自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拥有“三会”所不及的影响力。伞形监管者的职责,由人民银行承担最为适宜。

有鉴于此,应由国务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的授权,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认人民银行总体监管者的地位,建立人民银行主导下的常设金融监管协调架构。在此架构下,对各种金融理财产品以“功能”为基础协调监管,并由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定监管者。

2. 协调金融理财产品监管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类金融理财产品,是金融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监管乱局的源头之一。现有的理财产品涵盖各种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和外币代客理财业务、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信托业务、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管理业务和委托资产管理业务、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保险公司的投资连接保险和万能保险业务等。各类理财产品在法律性质上虽然尚无清晰界定,但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信托色彩,在功能、运行机制和监管思路方面也大体一致。[32]然而,由于缺乏监管协调,各监管部门在这一领域基本上是按照机构监管的原则各自为政,在投资金额起点、期限设置、能否保本、能否有固定收益、能否转让流通以及能否跨地区分支机构经营等基本问题上各执一词,既不利于相关业务的顺利开展,更不利于有效监管和投资者保护。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变监管方法,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对于已有的理财产品,根据其基本功能(如信托),由人民银行会同“三会”协商确定基本监管规则,报请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发布,作为该领域监管依据。在此基础上,有权监管机构根据相关产品的具体功能,可以制定实施细则;如果在实施中出现分歧,同样经由协商解决,如无法取得一致,可以通过常设协调架构中的争议解决机制,由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裁断。对于将来的金融创新,也依据功能原则加以协调监管:任何监管部门对可能涉及其它部门权限的混合金融产品制订规则时,应事先与该部门及人民银行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如无法取得一致,则可诉诸争议解决机制。

3. 明确金融集团监管权限

严格说来,即使是在2003年和2005年《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修订之前,我国法律也并未明文禁止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建立金融集团。《商业银行法》第43条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或“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并不禁止其它企业投资控股商业银行;《证券法》第6条要求“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而控股公司之下的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理论上也符合“分别设立”的要求。可见,至少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形式而言,其实一直不存在法律障碍。修订中增加“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只是为更多形式的金融集团(如银行母公司型)和金融混业预留空间。这样,对于金融集团一方面立法未予整体禁止,另一方面却又没有相应规则加以规范,导致我





国金融集团无序发展,形成监管空白。目前的主监管制度既无法律约束力,也难以清晰划分监管权限,作用有限。以立法形式明确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权限和分工,已是势在必行。

我国目前金融集团模式不一,在监管上也应有相应区别: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即由纯粹控股公司控股不同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集团,按照上述监管协调架构,由人民银行作为伞形监管者,负责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监管;各金融子公司的业务,则由各监管机构按照功能原则进行相应监管。对于金融机构作为母公司形成的金融集团(如银行母公司型),由母公司的功能监管机构(如银监会)在并表基础上对母公司进行监管,其金融子公司则由其它相应功能监管机构监管。

五、结论

金融监管竞争与冲突是与金融监管相始终的话题,金融集团的发展使得这一话题更加引人注目。如何应对和解决,并不存在绝对的理论标准或实践坐标,而是取决于一国需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纳监管竞争,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消弭监管冲突。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构建,正如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一样,受制于一国独特的国情,受制于其在政治、经济、历史、金融市场和监管资源方面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同于其它国家的、选择不选择某种模式的理由。

我国近年来金融集团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不断挑战既有的监管体制,也提出了监管协调的迫切要求。惟其如此,我们更需要对实践中究竟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冷静分析,而不是贸然移植“先进”模式。当此分业监管体制全面确立时日尚短,制度成本收益尚待进一步把握之际,保持制度的连续和稳定,应当成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在现有的分业监管格局下,通过确立功能监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央银行主导的伞形监管架构,足以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应该成为当前以及将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监管体制的基本定位。

注释:

[1] 参见温家宝:“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在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3/01/content_5788935.htm, 最后访问于2007年5月31日。

[2] See generally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3] See Christos Hadjiemmanui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 Trend Towards ‘Megaregulator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A Guide to Structural Reform*, Arner & J. J. Lin eds., Thomson, Sweet & Maxwell Asia, 2003, at 142.

[4] 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认为,监管套利带来了持续的金融创新,而单一监管则可能会阻碍这种创新。

See Alan Greenspan, *Financial Reforms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Decentralized Banking System*, available at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1997/19970322.htm>, last visited May 31, 2007.

[5] 参见约瑟夫·J. 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FSA经验的批判性重估》,廖凡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2辑(2006年6月),第568页。

[6] See Greenspan, *Financial Reforms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Decentralized Banking System*, supra note 4.

[7] See BCBS,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1997), Introduction; IAIS, *Insurance Supervisory Principles* (1997), § 3, Par. 7-8; IOSCO,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1998), Art. 4.1. See also Joint Forum, *Cross-Sectoral Comparison of Core Principles* (2001), at 13.

[8] 参见杨勇:《金融集团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Elizabeth F. Brown,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Singl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14 U. Miami Bus. L. Rev. 1, 52-57 (2005).

[9] 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金融集团在银行业的市场份额从53%增加到71%,在证券业的市场份额从54%增加到63%,在保险业的市场份额从41%增加到70%。See José de Luna Martínez





& Thomas A. Ros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96 (July 2003), at 10.

[10] See IOSCO, *Principl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1992), at 3; Joint Forum,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1998), at 64;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2/87/EC (Financial Conglomerate Directive)* (2002), Art. 2.

[11] Charles Goodhart, et al., *Financial Regulation: Why, How and Where Now?* Routledge, 1998, at 148, 156.

[12] See Roberta S. Karmel, *Functional Regulation*, 501 *Practicing Law Inst./Corp* 9, 9 (1985).

[13] 参见杨勇:《金融集团法律问题研究》,前注8,第190页。

[14] GLBA 第二章章名即为“功能监管”。See GLBA, 113 Stat. 1338 (1999), Title 2.

[15] James A. Leach, *Moderniz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5 *Iowa J. Corp. L.* 681, 688 (2000).

[16] GLBA, § 111.

[17] See Martínez & Ros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supra note 9, at 2; Brown,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Singl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Supra note 8, at 92-93.

[18] See Brown,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Singl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Supra note 8, Part V (at 74-87).

[19] 参见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 FSA 经验的批判性重估》,前注5,第544页。

[20] 有15个国家参加此项调查。See José de Luna Martínez & Thomas A. Ros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supra note 9, at 10.

[21] See Jonathan R. Macey, *The Business of Banking: Before and After Gramm-Leach-Bliley*, 25 *Iowa J. Corp. L.* 691, 709 (2000).

[22] Id., at 698-99, 707.

[23] See Martínez & Ros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supra note 9, at 9 (FN.8).

[24] 参见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 FSA 经验的批判性重估》,前注5,第567页。

[25] See Sundeep Tucker, *FSA Examines Governance of Retail Investment Fund Sector*, *Fin. Times*, May 7, 2004; Eilis Ferran, *Do Financial Supermarkets Need Super Regulators: The United Kingdom's Experience in Adopting the Single Financial Regulator Model*, 28 *Brooklyn J. Int'l L.* 257 (2003), n133, 135.

[26] See Martínez & Ros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supra note 9, at 31-32.

[27] See Donato Masciandaro, *Financial Supervision Architectures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s*, 18 *Transnat'l Law.* 351, 367-68 (2005).

[28]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总论(2007年5月),载 <http://www.pbc.gov.cn/detail.asp?col=100&id=2210>, 最后访问于2007年6月4日。

[29] See Martínez & Ros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supra note 9, at 12.

[30] 参见廖凡、王斯曼:《略论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职能的划分与协调》,载《金融法苑》2003年第8期,第53-54页。

[31] See Greenspan, *Financial Reforms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Decentralized Banking System*, supra note 4.

[32] 参见郭雳:《中国银行业创新与发展的法律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72页。

来源: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 发布时间:2008年06月02日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

席月民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肩负着反垄断的神圣使命，《反垄断法》的出台为银行业反垄断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法律保障。本文首先结合实例，就当前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表现及其危害进行了客观剖析，然后探究了银行业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最后就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及其化解展开了重点论证，并提出了自己的执法建议。

关键词：银行业 反垄断法 执法

一、当前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表现及其危害

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已经出现区别于过去以国家垄断形式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垄断行为，这些垄断行为给金融市场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具体表现在：

（一）相互串通收费，形成价格联盟。以银行卡跨行收费事件为例，2006年6月1日，跨行查询收费正式开始实施。但几乎与此同时，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这一收费提出了“究竟是‘国际惯例’还是‘垄断行为’”的质疑。透视该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我们发现，银行卡跨行收费实际上是中国银联与大银行协议一致的结果，其事先并未征得广大客户的同意，而属于此类收费的还有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跨行取款费等。应该说，价格竞争本身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方式，但价格联盟在反垄断法中却是一种本身违法的卡特尔类型。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在我国，小公司[1]在银行开户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说，小公司注册登记后，商业银行对小公司开户往往设置资本金、存款余额等限制，即开立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的最低标准是50万元或100万元，并保证在账户中维持3万元到50万元不等的存款余额。难怪有人评论说，商业银行通过提高开户门槛的作法，将小公司拒之门外，这直接促成了为小公司办理开户手续一条龙服务的中介公司的火爆。[2]然而，商业银行设置开户门槛并不符合有关规定，属于歧视政策。[3]应该看到，拒绝交易只是当前我国一些银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表现，捆绑式搭售、强制交易、价格歧视等其他行为也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使市场主体拥有的不是市场支配地位而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这种经济优势仍然有可能被滥用，而传统的民商法在交易自由与自愿精神的指导下很难对这种滥用行为进行规制。[4]

（三）并购重组使银行集中加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资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方式，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也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有助于巩固银行的资本基础、促使中资银行股权结构多样化、提升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和全面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外资银行的参股和并购战略有以下几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被参股银行的规模和地域性不断扩大，逐渐从沿海省市、发达地区向内地扩展；二是参股的对象由商业银行向其他金融机构扩展，如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三是参股的途径趋于多元化，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机制的实施以及中国商业银行上市进程的加速，为外资银行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并购提供了可能。[5]我们必须看到，金融机构跨国并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迅速获取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以获得定价权或提供领先服务的竞争优势，加强对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和管理日显重要。

（四）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行政性垄断是一种制度性的、具有取消竞争功能的垄断情形，在中国不仅种类多、范围广，而且危害大。[6]以房贷强制保险为例，消费者要获得所需购房贷款，必须对整个房屋（按房款算）进行全额保险，并将保单交给银行。一些商业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5月9日颁布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在其本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作出了上述规定。2005年2月22日，浙江省消费者协会、浙江省律师协会、浙江大学法学院联合向央行发出建议书并抄送银监会，要求重新审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有关不适当的内容，提出无论从合法性还是必要性角度，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都不应将购买房贷险作为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强制性条件。[7]尽管中国人民银行





于同年4月4日进行了复函,并表示其对该问题非常关注,但至今仍未与银监会对该办法进行修改。笔者认为,该办法的规定直接限制了房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已然构成了行政垄断行为。

上述垄断行为的存在直接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限制了市场竞争,使金融市场的供给严重不足,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为“地下金融”提供了机会,从而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金融稳定。[8]事实表明,加强我国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二、银行业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剖析

(一) 理论认识仍有误区。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部分认识误区,即认为银行业垄断经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需要,是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需要,不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追究。如有人提出,银行业应该是垄断法适用豁免的对象,其主要依据是公共利益要求和垄断的经济效益性。[9]当把银行业垄断与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时,商业银行的重要性即被凸现出来,银行业垄断的合理性似乎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但问题是,公有制与银行业的垄断经营有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只从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中去找答案。适合理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信用并不适合现实中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对此给出了有力证明。必须看到,放松管制已经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把银行业整个行业纳入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并不妥当,对金融安全并无益处。多年来,银行业垄断不但未能减少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反而成为其巨额不良资产产生的重要原因;不但未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稳定,反而使“地下金融”愈演愈烈,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行政权力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不但限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扭曲了市场行为,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深、干预的时间越长,反而加大了金融风险。因此,不能把银行业垄断与国家金融安全划等号。

(二) 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理论发展的产物。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公司是由股东、债权人和公司本身三者构成的利益平衡体,现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突破了这一狭隘的看法,引入了更多的利益相关主体,承认了公司经营对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要求公司承担更广泛的责任。我国现行《公司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10]由于《公司法》同样构成银行法的重要法源,因此,无论是《公司法》总则第5条的规定,还是其后分则中第45条、第52条、第68条、第71条、第109条以及第118条等规定,对银行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等各个环节都应有约束力,银行应予以严格执行,并注重弘扬社会责任精神。但从目前的实践看,利润和股东收益仍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目标,银行业垄断行为的出现与《商业银行法》等专门金融机构立法对银行社会责任的规定缺位不无关系,与商业银行及其高管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着直接联系。

(三) 反垄断法制不够完善。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前,有关银行业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规范却主要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中。这些法律、法规的特点是:部委规章居多,立法的权威性不够;立法形式散乱,不统一甚至冲突;立法内容存在疏漏;禁止性规范多于制裁性规范,导致责任追究不足。如《商业银行法》第9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这样的规定只是表明了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同样适用竞争规则,但在反垄断领域明显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一些商业银行之所以明目张胆地实施拒绝交易等垄断行为,无视广大消费者和小企业的利益,显然与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方面经济法制的不够完善有关,司法介入乏力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制的尴尬。

三、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及其化解

《反垄断法》的出台,为我国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重视并有效化解银行业反垄断中的执法难题,是今后贯彻执行《反垄断法》,完善银行业反垄断法制的关键。

(一)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管辖分工和协调。与美国的司法模式不同,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借鉴了欧共体的作法,采取了行政模式。在《反垄断法》起草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问题即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现在,该问题变得更为实际和迫切。银监会作为我国银行业的行业监管机构,其旨在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保护银行业的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因此,银监会对银行业的反垄断案件理应有一定的管辖权。就银行业反垄断执法而言,问





题直接表现为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案件管辖权所面临的冲突与化解。有学者提出,行业监管机构主要处理市场准入和与互联互通相关的案件,而在企业并购、垄断协议以及一般的滥用行为等方面,管辖权则应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11]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笔者认为,为减少摩擦和节约执法成本,两个机构应就银行业反垄断案件的管辖权进行合理划分,避免越俎代庖,禁止随意扩大或缩小管辖范围。在这一问题上,有赖于将来国务院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予以重视和明确。笔者建议,凡涉及银行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的审批,涉及对“问题银行”的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涉及对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银行的撤销,以及涉及对擅自设立银行或非法从事银行业务活动的取缔等,应由银监会予以管辖;而涉及银行并购、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案件,则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该二者之间是特殊管辖权与一般管辖权的关系,其中银监会的管辖权属于特殊管辖权。特殊管辖权确定的意义在于限制行业监管部门依据特别法排除反垄断机构管辖权的可能,从而明确反垄断法对行业竞争事项上的一般适用原则和只在特定事项不予适用的例外原则。[12]另外,根据《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银行业中的外资并购等经营者集中行为,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则必须进行双重审查,即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此类案件的双重管辖权并非上述排斥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因其审查的目的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还应加强反垄断执法机构和银监会之间的深层对话,创建双方的反垄断协调机制。

(二) 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机协调。《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国家的相关竞争政策实现了制度化和法律化,为银行业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然而,竞争政策的推行并不是孤立的,在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竞争政策的执行会受到国家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等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城乡、地区、不同产业和行业、不同利益群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也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民营和外资、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由于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其相互之间能否实现有机协调,能否在磨合中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是银行业反垄断执法将要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欧共体,竞争政策较其他政策有优先适用的地位。[13]欧共体条约强调保护欧共体市场的有效竞争,强调其成员国以及欧共体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与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一致,因此,欧共体竞争政策的优先适用性与其市场经济的发达和成熟状态是相适应的。我国的国情则有所不同,尽管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各种经济变量因受变革因素的冲击而更为活跃,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存在着结构性缺陷,金融控股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因此赋予竞争政策在银行业发展中的优先适用地位显然不合国情。笔者认为,不同的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的功能,金融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旨在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手段和工具,故在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应较竞争政策优先适用。鉴于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之间的互动性,笔者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执行竞争政策时,应优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的落实,这样才能避免竞争政策对金融政策的负面冲击,确保国家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和宏观调控的差异性,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以实现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银行业垄断行为的量化标准。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度”的合理把握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其直接触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银行利益以及消费者利益,因此,对于该问题的分析研究,必须采取理性的态度,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民族主义情结,将其进行必要的量化处理。从世界范围看,德国和日本在该问题上比较严格,而美国则相对比较灵活。透视我国的《反垄断法》,其在垄断行为的认定和处罚上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在第19条、第22条等一些条文中进行了一定的量化处理,规定了具体的量化标准。根据该法第27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时,应主要考虑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这就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被指控的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结构——行为——效益的经济定量分析。这些经济定量分析的引入,对反垄断中的定性分析有着直接影响,因此银行并购是否构成垄断,对相关指标进行定量调查分析时量化标准的确定即至关重要。但此时第22条的量化标准是否科学,对银行业集中是否适用,则需要采取灵活态度进一步研究确定。笔者认为,必要的技术分析需要因时、因地而做出,决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把限制竞争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进行区别。有学者曾提出,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必须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和途径予以解决。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度与条文设计包括量化问题的设计,并不是越细越好,越具体越好,更不是越严格越好。就我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反垄断政策,何时宽松,何时严格,都应该





由民主的机制适时因地而作出。[14]笔者赞同该种观点,故建议在这一问题上赋予法院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其在处理银行业反垄断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不应将《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认定的量化标准绝对化,应在追求法律稳定性的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四) 银行业垄断的行为豁免。《反垄断法》第15条、第28条等对垄断协议和经营者集中等垄断行为豁免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构建出了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旨在抑制过度竞争,以免资源浪费,其并不构成市场进入壁垒,只是采取了一种避免激烈竞争的规制方法。[15]因此,该制度是反垄断法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调国家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根据该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当然,我国《反垄断法》直接将垄断行为的豁免决定权交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从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看,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豁免同样适用上述规定。但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8月8日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其第五十四条对并购申报豁免所作出的具体规定对银行业垄断而言具有重要价值,银行业垄断的行为豁免应在《反垄断法》第28条的基础上,以该规定为蓝本进行合理构建。笔者建议,就垄断协议而言,应将登记或批准作为其豁免的形式要件,并适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对经营者集中而言,应严格执行申报程序规定,并以获得批准为豁免的必要条件。另外,在禁止行政垄断方面,《反垄断法》较之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16]而言,其在第五章中增加了四种行政垄断行为,如滥用行政权力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规定的垄断行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等,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和可喜的勇气。但不足之处在于,其没有规定适用除外制度。诚如美国最高法院1943年就帕克尔诉布朗一案判决书指出的那样,反托拉斯法不可能占领国家全部的经济领域,国家通过主权行为仍然可以实现其限制竞争的目的。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时应增加一条规定,即“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除外。”

(五)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从实际情况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已成为目前各国反垄断法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国反垄断法一方面允许甚至支持、鼓励本国企业对外国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又严格管制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为了能够在跨国公司限制竞争的活动中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各国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域外适用本国的反垄断法。[17]目前,美国、俄罗斯、保加利亚、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在其反垄断法中都有域外适用的规定,主张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已经成为各国反垄断法的普遍作法。当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突发性、区域性和关联性已成为金融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理所当然地成为构筑我国金融安全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格局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第2条关于域外适用的规定十分重要,但从实际操作的可操作性看,还应作出必要的限定,尽量避免片面的、极端的作法而引起不应有的法律冲突。有学者曾提出,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可考虑将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外从事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且可以合理预见的”限制或者不利影响作为对其适用的基本要件,并确立利益衡量原则作为对该基本要件的补充。[18]该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必须兼顾本国与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尽量避免并着力化解各国相互之间在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建议在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中借鉴和吸收该观点,把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不利影响的垄断行为,以“直接性”、“实质性”以及“合理预见性”作为必要条件予以限制,尽量减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必要冲突,使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免受国际上一些人为因素的侵蚀和恶意伤害。

注释:

[1] 这里的小公司是指注册资本金在50万元以下的公司。

[2] 《商业银行提高开户门槛 向小企业强加风险》,

资料来源: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708/16082716238.shtml>, 2006年7月8日。

[3] 《拒绝存款人的开户请求 商业银行涉嫌违法》,

资料来源: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708/16252716252.shtml>, 2006年7月8日。





[4] 孟雁北:《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法研究》,载《法学家》2004年第6期。

[5] 苗燕:《外资银行并购倾向于中小银行》,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月10日。

[6] 曹士兵:《论中国反垄断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

[7] 参见《住房贷款强制保险政策有望调整》,载《法制日报》2005年4月12日。

[8] 参见《中国地下金融规模近万亿》,载《华西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9] 参见游国城、郑赛花:《论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11] 王晓晔:《垄断行业改革的法律建议》,载《学习时报》2007年2月2日。

[12] 史际春、肖竹:《〈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之比较研究及立法建议》,载《政法论丛》2005年第4期。

[13] 王晓晔:《竞争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4] 徐孟洲、侯作前:《论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

[15] 曹士兵:《论中国反垄断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

[16]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17] 王晓晔:《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评析》,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2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 王先林:《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域外适用制度》,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来源: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29日 本文原载于《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

法学教育

中国法学教育的结构失调及对策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会副会长

- 法学教育的兴衰与涨落与法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息息相关,而非仅仅是法学自身的问题。
- 下一阶段应当适当地调整法学教育的规模,从以往数量扩展为主的办学模式过渡到提高办学质量为主和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
- 在我国法律职业市场上,“过剩”和“短缺”同时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法治国家的大环境推动下,我国法学教育空前发展,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以往备受冷遇的小学科一跃而成为世人瞩目的显学,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大批亟需的法律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学教育规模已超出市场接纳能力

但是急剧的扩张也容易掩盖发展带来和将会出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令人忧喜交加、毁誉参半的法学教育规模问题。之所以喜,是因为这样大的规模表明了社会对法治的认可和推崇,表明法律职业这一曾被打入另册的“非我族类”可以登堂入室,在社会发展中大展身手。之所以忧,则是因为其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现有法律人才市场可以接受的数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质量下降和就业难的问题。可谓喜也规





模, 忧也规模。

为什么说现在的规模已经超出了现有法律人才市场的接纳能力呢? 不妨先看一下我国现有法律职业群体的规模, 即 14 万律师、21 万法官、18 万检察官, 总计 53 万多人。

按照我国法学教育现在的规模, 如果现在全部在校法科学生四年后全部毕业, 可以把我国现有法律职业者中的 80% 更新一遍; 而研究生的培养是二至三年, 如果把将要入学的研究生数量考虑进去, 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在四年后把现有法律职业者统统更换一遍。显然现在不可能出现在未来四年中全部更新现有法律职业者的状况。

即使假设我国法律职业界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由于法院和检察院的编制限制, 这种有限的扩大, 似乎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的法科毕业生。因此法学院系毕业生从事非传统法律职业的比例将会非常大, 甚至一半以上的法科毕业生将无缘从事法律职业。当然, 学过法律的人从事其他行业工作或自行创业当然也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但是这已经足以促使我们反思一下现在法学教育的规模和毕业生的出路问题。

无独有偶, 在我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发展史上, 曾经也出现过法学教育大发展的经历。据记载, 在清末民初, 随着变法维新和废除科举的推动, 法学教育从无到有, 风靡一时。在 1912 年, 法政专科学校一度达到 60 所, 学生有 30803 之众; 在 1916 年, 则减少到 32 所, 学生 8803 人。潮涨潮落, 到 1926 年, 法学院系的数量回落到 25 所。我国法学教育是否会再出现落潮?

法学教育的兴衰与涨落显然与法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息息相关, 而非仅仅是法学自身的问题。

法学教育的兴盛得益于变法图强的社会需求、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政府对于法律人才的吸纳。而连年战乱、社会制度变革缓慢、政府和社会对法科毕业生需求的减少又直接导致了法学教育的式微和衰减。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规模问题也不能仅仅从法学教育的内部找原因, 而需要从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角度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法制建设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全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我们有充分理由说, 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建立、现代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影响, 走向法治和需要更多法律人才这一大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将保证当前的法学教育不会像民初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缩减。

适当调整法学教育的规模是当务之急

从上述数字分析看, 我国法学教育的规模确实有明显超出现有法律职业规模和大于现阶段法律就业市场需求的现象; 因此下一阶段应当适当地调整法学教育的规模, 从以往数量扩展为主的办学模式过渡到提高办学质量为主和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

为了有效地精简和控制法学院系过快的增长, 有必要分析当前法学教育盲目扩张的原因。

首要原因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法制建设, 而法制建设又的确需要大量法律人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的重建和发展为受过专门法学教育的人才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平台, 带动了大办法学教育的热潮。

其次是不少高校为了提高学校地位, 建成综合性大学, 急于开设法学院系, 并不断扩大办学规模。

其三是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 一些学校认为法学不像其他学科那样需要有较大的投资和专业性很强的师资队伍, 办学门槛低, 学生毕业后容易就业, 因此未经充分论证, 甚至办学条件也不完备, 便东拼西凑, 匆忙开设了法学专业。

其四是办学盲目, 缺乏对未来就业市场的客观分析。许多高校在开设法律专业之前, 并没有对社会到底需要多少法科毕业生进行调研, 更没有对所办的法学院系的定位进行清醒的分析, 缺乏明确的办学目标, 也不清楚其毕业生的未来的走向, 盲目上马, 一哄而起。

其五是利益驱动, 把办学当成创收的手段, 只要有人报考, 就来者不拒, 照单全收。

其六是某些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缺乏全盘考虑, 仅仅从政绩或规模角度出发, 在审批环节没有严格把关。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法学院系缺乏对法律人才市场的认真调研和对法制发展的全局分析,被当时特殊背景下法律就业市场的繁荣所诱导,造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盲目发展局面。

针对上述原因,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把关,慎重审批设立新的法学院系的申请,并对现有法学院系的办学质量进行认真的检查和评估,对于毕业生难于进入法律职业的院系必须要缩小其办学规模,甚至停止其办学资格。如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不主动采取行动,法律就业市场也会迫使法学教育进行自我调整。

优化法学教育的结构是根本

虽然对法学教育的规模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和调整当前法学教育自身结构的不合理的问题。如果再深入进行调查,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相当多的法学毕业生难于进入法律职业群体,另一方面在一些法律职业机构中又难于找到合格的高水平的法学毕业生。在我国法律职业市场上,“过剩”和“短缺”同时存在。所谓“过剩”不过是大家都挤在一起,把人才培养和就业的眼光仅仅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在大城市的基层法院中,书记员都要具有硕士学位,而在西部则缺乏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毕业生来充实法官队伍。所谓“短缺”则揭示出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短处,说明我们培养的毕业生缺乏从事上述“短缺”领域工作的能力和主动性。

这不仅仅是规模过大或发展过快的问题,而是揭示出我国法学教育结构不合理的深层问题。这个结构问题是片面强调法学办学模式的单一化造成的。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则是千姿万态,法学教育应当因地、因时、因需而分成不同的层次。

而这里所说的“分层次”办学,并非简单地分成“一流”、“二流”和“三流”的法学院系,也不是要简单地套用“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分类,而是主张按照所培养的学生的未来走向和办学宗旨找准自身的定位,分成不同的“层次”或“类型”,从而合理地调整法学教育的结构。

一些院系应当是“研究型的院系”,有些则应当是“应用型的院系”;有些是以培养基层司法人员或法律服务人才的院系,有些则是以培养国际型法律服务人才为目标的院系。每一个层次或类型的法学院系都可以按照相应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估,从而评价其办学的水平。如果一个法学院把自己定位在培养基层、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层面上,其毕业生成为当地司法和法律界的骨干,这个学院就是为我国法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流法学院,其毕业生也是法律界的“精英”。

我国法学教育的单一化暴露出当前法学教育结构的不合理性、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和贫乏、培养目标上的狭隘性和盲目性。

要解决上述结构失调的问题,首先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设立科学的分类评估指标体系,为各类法学院系提供有关的办学信息,建立合理的评估机制和程序。评价和评估指标体系是一根指挥棒,而表面化的单一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程序对法学教育的分类和分层极为不利。可以说,各种民间、半官方和官方的评价和评估体系没有看到我国法学教育应当具有分类和分层的客观需要,缺乏对我国社会和法制发展的深入了解,从单纯的学科角度进行引导和管理。这些是造成当前法学教育结构失调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为高校提供法律人才市场实际需求的客观分析,帮助法学院系找准自身定位、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在办学审批和评估中严格把关,推动从“数量为主”到“质量优先”的办学模式的转变,从宏观上引导法学教育结构的调整。

其三,要发挥各个法学院系的主动性,减少盲目性,明确定位,办出特色。

其四,要发挥人才市场的调整作用,把各个院系的招生和培养与社会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及时认识到我国法学教育规模过大的问题,并由此进而认识到其深层的结构失调的问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在学校定位、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上的种种现实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及时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我国法学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得到拓展,并将推动我国法学教育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

来源: 法制网 <http://www.legaldaily.com.cn/> 发布时间: 2008年06月01日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6 月

第 4 期[总第二十期]

本期要目

- 教育部 2008 社科招标公告
-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与当代高水平大学的使命
- 中南大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
- 周济：使高校思政课成为让大学生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变迁及其未来趋势——以美国为例

部委
文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年度项目招标公告

现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年度项目予以公布，凡符合《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6 年修订）》投标条件，具有正高职称，能按照规定要求从事驻所研究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均可参加投标。具体招投标事宜可与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10—58802730；传真：010—58803011，联系人：刘杰。招标课题和项目投标评审书可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下载。投标截止日期为 2008 年 8 月 30 日（以邮戳日期为准），逾期不予受理。投标者须在此日期前将投标文件按规定寄至：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研究管理咨询服务中心，邮编：100875。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08 年 5 月 23 日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08 年度课题招标公告

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遴选审议通过，并经教育部批准，现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08 年度招标课题予以公布。每个项目资助额度一般为 30 万元~80 万元。凡符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投标条件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师，经所在学校同意并提供担保，均可组织课题组参加投标。具体招标文件和有关要求可与高校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10—58581195，联系人：李建平。亦可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下载。投标的截止日期为 2008 年 8 月 30 日（以邮戳日期为准），逾期不予受理。投标者须在此日期前将投标文件按规定寄至：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4 号富盛大厦 21 层 B 区，高校社会科学评价中心，邮编：100029。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08 年 5 月 23 日

来源：光明日报 2008 年 5 月 29 日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与当代高水平大学的使命

摘要: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表现出五大趋势,即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促使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引领社会,国际一体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国际开放,高等教育大众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品牌质量,科技综合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学科交叉,以及知识信息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全人教育。为顺应这种趋势,高水平大学必须承担起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主阵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引领力量、政府咨询决策“思想库”和“智囊团”、先进文化和引领社会进步灯塔、地区与全球合作交流桥梁的五大使命,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加快自身的崛起步伐。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发展趋势, 高水平大学, 使命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知识经济浪潮、全球一体化、知识信息化越来越凸显,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现代高等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集中体现,并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党在新的历史阶段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出的新的重大战略目标,我国高等教育也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大跨越。我国高水平大学必须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勇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跨越发展道路,为地区、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一、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五大趋势

根据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表现出五大趋势:

1. 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促使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引领社会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已占GDP50%以上),大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and 使命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大学已经从农业经济社会的“象牙塔”、工业经济社会的“推动器”发展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机构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成为知识型社会的主要催化剂和工业发展的烽火台,成为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作为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职能更加凸显,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精神面貌,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决定着学生的就业与成长。当代大学已深深地影响了大至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社会的中心,是关注的热点,是评论的焦点。





鉴于此,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用了三个“无与伦比”评价现代大学的作用: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它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无与伦比。

世界上几个知识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都源自于高水平大学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高水平大学甚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创新造就了“硅谷”经济,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以剑桥大学为核心的剑桥科技园,成为英国乃至全欧洲高科技产业和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印度理工学院的科技创新成果为班加罗尔科技园提供技术支撑,使其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依托形成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先锋。

2. 国际一体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国际开放

一流大学普遍把国际化程度作为自身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体现,作为衡量自己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高水平大学必须面向国际、参与国际,活跃在国际科研和学术领域,具有很高的国际活跃度。全球视野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开放视野的国际化人才、紧跟学科发展前沿的科研平台和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机构、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文和原创性成果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就是一流大学高度国际化的体现。

高度国际化使一流大学成为世界的学术分享及文化交流的中心,使得他们长期保持世界领先,这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尤为突出:美国在读研究生中,外国学生约占40%;哈佛的留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留学生来自50多个国家。其他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也是如此:牛津大学的留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4,来自130个国家;剑桥大学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超过60%;东京大学的2000多名留学生分别来自60多个国家。同样,大学国际化也导致教授活动范围变化,有专家形象地把美国教授划分为三类:世界型教授坐飞机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地区型教授开车参加地区性学术会议、参加地区性学术活动,学校型教授仅在学校参加校内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例如,加州大学这三类教授的比例大约为60:30:10。

国际化促使一流大学更积极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热点问题,关注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和恐怖主义等危机。只有关注全球的大学才能受到全球的关注;只有面向全球,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为己任的大学,才是能够引领国际社会的大学;只有受到全球关注并能引领国际社会的大学,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将来再用20~30年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这些历史跨越的实现就是一步步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不断承担世界责任、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更要进一步适应这个发展趋势,要适应我们国家作为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人才需求。当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有大国风范,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能力、智慧、责任,所以四川大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这才是世界经济强国需要的人才。

3. 高等教育大众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品牌质量

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50%视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进入大众化阶段;2004年,世界有36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近些年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





到了大众化阶段,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23%。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一流大学的竞争力就更加集中、更加迫切地体现在品牌和质量上,就会更加重视和强化精英教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平均达到80%以上,但是他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MIT、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都更加注重学校品牌的塑造和办学质量的提高。MIT以精英教育为办学理念,一直保持着“全美最好的理工大学”的地位,造就了一批声名盖世的科学家,包括55名诺贝尔奖者。剑桥大学长期以来坚持培养拔尖人才、各领域领导人的精英教育理念,围绕拔尖人才的培养,着眼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吸引和招收最优秀学生,吸引和留住相当数量最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四川大学在研究型大学本科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也始终坚持精英教育不动摇,把精英教育放在首位,坚持质量为本。

4. 科技综合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学科交叉

现代科技发展综合化的主导趋势,使得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越来越难以在单一学科内取得突破性成果;而多学科融合、多学科交叉是产生新学科的源泉,是获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径,是解决重大技术、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依托。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对23位著名科学家(包括7位诺贝尔奖得主)进行访谈,发现他们所深度涉及的专业或学科领域最多达6个,平均为3.3个。20世纪最后25年,交叉学科获诺贝尔奖数接近50%;21世纪最初5年,这一比例超过70%。以培养精英人才、开发新知识、贡献重大科研成果为己任的世界高水平大学,都在积极实施跨学科研究和学习计划,并努力在实践中完善。普林斯顿、哈佛、MIT等大学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来设立和发展跨学科课程,研究生和教师一起共同进行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和跨学科研究:南加州大学2006年5月发布《美国南加州大学交叉学科研究发展规划建议》,提出设立交叉学科委员会、跨院联合聘任教授、完善评价体系、建立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措施、促进人才培养的系列举措。MIT在2003年成立计算机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CSBI),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来促进学科快速发展,已成为MIT最大的跨学科组织之一,其教育和研究成果也在全美处于领先地位。

5. 知识信息化促使高水平大学更加注重“全人”教育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交往不多,社会信息量较少,知识更新速度慢,大学所获得的知识足以满足学生一生的需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交往空前频繁,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社会信息瞬息万变,大学必须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由过去的“知识教育”转变为“全人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有责任的全面发展的“全人”,他们不仅在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备成为精英和栋梁的潜质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1989年UNESCO北京会议提出:“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全面发展的人,将是对新思想和新的机遇最开放的人”。

国际一流大学都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全人”。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各领域的领袖人才和未来的学者精英,这种精英应该是“全人”(the whole person),并据此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不仅着眼于学生未来的职业,而更着眼于整个生活;哈佛大学提出要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思维习惯良好的人;MIT始终坚持大教育观,认为应当培养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让他们体会丰富和完美的生活,提倡学生要有人文和社会内涵。所以,国际一流大学对于人才的培养,不单是强调知识教育,更注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



总之,这些发展趋势表明未来的高水平大学:肯定具有鲜明的办学理念和发展定位;肯定高度重视办学品牌质量;肯定具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学科交叉的机制;肯定能够很好



地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引领社会,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进步;肯定坚持开放性、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主动参与、融入国际竞争与合作。正是顺应高等教育的这五大趋势,四川大学提出了下一步的目标,即按照“科学发展,重点跨越,造就英才,引领社会”的指导方针建设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提出了“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确定精英教育、全人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宽广国际视野、强烈创新意识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并高速推进国际化进程,融入高水平大学国际竞争与合作体系。

二、当代中国高水平大学应承担的五个使命

从最初的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时代的教学、科研功能,再到现代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大学的功能逐渐丰富完善。当代一流大学都有明确而富有自己特色的大学使命。目前,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全社会对大学重要性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为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中国大学通过这几年的建设,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也肩负着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区域社会发展及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增强建设一流大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发展自身,奉献社会,振兴民族。

综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高水平大学应主动承担起以下五个重要使命:

1. 高水平大学要成为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大学应当成为高素质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培养基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资源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和最现实的生产力,是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及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我国高水平大学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坚定不移地实施精英教育,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四川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培养大学生最多的一所大学,迄今为止,学校累计为社会培养了20多万大学生。其中,除了朱德、郭沫若、巴金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之外,学校还培养了一大批各地经济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培养了一大批不仅有财富和智慧,更有文化和责任的企业家和管理精英。2007年,四川大学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规律和学校的目标定位,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四川大学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创新人才体系的方案》,提出了“精英教育、质量为本、科教结合、学科交叉”的指导思想,通过实施精英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教育、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育、研究式教学、国际一体化教育、创新教育、平等和谐师生关系等,为民族振兴和区域发展培养英才。

2. 高水平大学要成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引领力量

当代高水平大学具有“三个一流”的职能: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提供一流社会服务。所以,大学要主动与区域经济社会结合起来,要出重大成果即重大技术和专利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大学直接介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走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成为推动、引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大学又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外在动力。例如,我校“985工程”二期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就是针对西南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来规划建设的:“西南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与安全的基础研究”创新平台针对西南地区水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等问题开展研究;“重大疾病生物治疗”创新平台针对我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生物资源、中医药资源开展重大疾病生物治疗研究;“高分子与特种功能材料”创新平台针对西南地区的稀土资源以及高性能材料、特种功能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等开展研究。我校研发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成为中国民用航空相关领域自主创新知识的重大成果,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成果推广累计直接经济效益超过3.5亿元，占有国内市场份额90%以上；我校创制的“料浆浓缩法制固体磷铵”技术推动了中国磷化工业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成为中国磷铵生产的主流技术；已在西南地区建设并投产5套25万吨/年生产装置，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以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

3. 高水平大学要成为政府咨询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当代大学的科研水平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研究质量，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学要积极参与构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真正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如我校教授研究完成的服务型政府项目有力促进了成都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已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典型代表。

4. 高水平大学要成为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灯塔

大学不能受社会世俗化、市场化的影响，要通过坚持高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弘扬先进文化，以其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特别要深入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理论、新成果；重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和学术团队，使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例如：四川大学对儒、佛、道经典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处于领先水平的成果，对于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构建新型社会文化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在道教领域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丰硕成果，填补了中国该学科研究的空白，构建了以道教为主体的新的中国宗教文化体系，促进了以青城山为道教重要基地的四川旅游业的发展。在佛教文献研究方面，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重镇，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儒学研究方面，四川大学的《儒藏》涉及古籍5000种，文字约5亿，为抢救、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重要的是要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不断为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使我们大学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典范与楷模，成为大学精神家园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引领者。

5. 高水平大学要成为地区与全球合作交流的桥梁

大学是一个面向全球开放的平台，一流大学理所当然要成为区域和国际交流合作的纽带。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著名企业、国际基金组织等合作交流广泛的优势，推动地方与全球的沟通与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国际优质科研教育资源和国际资本。例如四川大学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仅2006年就成立了4个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与加州大学、优山美地国家公园、中国九寨沟管理局建立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牵头组建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与德国克劳斯塔工业大学组建中德能源研究中心和中德能源法研究中心，与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西部开发办、UNDP和世界银行共同组建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通过这些科研平台，促使了国际一流大学的优质教育和科研资源本土化，为世界顶尖级科学家直接参与研究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核心关键问题构建了新的平台，成为区域发展和国际合作非常重要的纽带和桥梁。



三、顺应趋势，不辱使命，加快中国高水平大学的崛起步伐





能否建成一流大学,关键在于能否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利用好机遇,通过高层次谋划实现自身的战略性跨越。中国高水平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就必须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勇于承担使命,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加快自身的崛起步伐。

1. 敢于确立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和先进的办学理念

短期内快速崛起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建校之初便提出了建成一流大学的目标。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乔丹指出,斯坦福“决不会因袭任何传统,无论任何人都无法挡住她的去路”;哈佛崛起的关键校长艾略特上任伊始就宣布要把哈佛“建成最伟大的大学”,他以超凡的魄力改造哈佛,为美国高等教育确立了标准,以致当时美国一流大学都“以哈佛的标准度量一切”;建校仅十几年便跻身一流大学之列的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开始就把自己目标定位为一所世界级大学,而不是一般的大学。因此,如果我们不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如果不真正按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四川大学在去年制定的《四川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就鲜明地提出了“建成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奋斗目标,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主动承担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四川大学的责任和使命。

2. 吸引一流师资,确保品牌质量

一流大学的核心是一流师资。有了一流师资,才能培养一流人才,产生一流成果,确保一流的办学质量,铸就一流大学的品牌。斯坦福大学也把招聘“引导世界”的教授作为建一流大学的战略举措;英国华威大学建校之初就提出“到优异的大学吸引优异的人才,从而构筑优异的大学”,形成“一流人才竞争一流岗位”的传统,这是他们迅速崛起的关键。四川大学近年来实施人才强校计划,优化了师资队伍结构,汇聚了一批优秀拔尖人才,院士数从2002年的4人增加到2007年的10人,“973”首席科学家实现零的突破、已达4人,长江学者从10人增加到2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数从16人增加到了35人,特别是通过重点基地建设,从耶鲁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引进了39名杰出的科学家,为学校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 集中资源,突出重点,建设1~2个学科率先达到世界一流

任何大学用于发展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只有将稀缺的资源集中起来,重点发展基础好的1~2个领先学科,才能更好地把这1~2个学科率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从而带动其他学科快速向世界一流迈进。集中资源、突出重点是世界一流大学实现崛起的共同做法。MIT重点发展物理学科,使其在7年内就进入美国前三名;斯坦福大学重点发展电子工程(微电子)学科,不到20年就位列美国前三强。四川大学近年来确定了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为重点领域,建设好“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组建创新突击队,力争在1~2个学科领域实现重点突破,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进而推动学校的整体跨越。

4. 注重国际交流合作,敢于与一流大学竞争

短期内快速崛起的大学都是把自己置于全球化的平台上,按照国际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规划自己,都是在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全面合作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印度理工建校开始就以国际一流的理工学院为目标,按照MIT的模式进行建设,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优秀教师,与MIT、加州理工等9所美国顶尖的理工大学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与柏林工业大学等6所德国顶尖理工大学开展研究生合作培养,与Intel、摩托罗拉等联合开展科研、建实验室,利用国际优质资源短期内迅速崛起。近年来,四川大学加大了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力度,已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所大学、科研机构及基金组织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2007年,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大活动就有6次: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来访并为“四川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揭牌;与韩国又松大学合作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校长理查德·拉肯斯率蒙纳士大学代表团来校访问,签订全面合作及双学位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Brandt校长来校签署“1+2”硕士合作协议,成立“中德能源法研究所”;与日立公司共建“四川大学—日立环境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罗校长来校访问、演讲,共建孔子学院、推进中美大学所建设、签署协议,学校正在快速融入国际高水平大学竞争和合作体系。

5. 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开发社会资源

短期内快速崛起的一流大学都是在解决地方发展重大需求过程中获得大量科研经费,并在科技攻关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科技的最前沿,始终保持一流大学的创新能力和活力的。MIT通过波士顿128号公路带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斯坦福通过“硅谷”、华威大学通过区域制造业的崛起、卡耐基·梅隆大学通过推动匹兹堡经济结构转型、印度理工学院通过班加罗尔软件工业园的崛起、香港科技大学在促进香港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跨越。作为高新技术的孵化器和辐射源,近年来,四川大学与成都市共同设立了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项目,与成都市共同投资,设立了以推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核心的中介服务机构——成都川大技术转移中心。目前,四川大学正紧紧抓住成都市作为城乡统筹“特区”的历史机遇,充分开发社会资源,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借此推动自身跨越发展。2007年,我校抓住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机遇,与成都市共建成都科学发展研究院,整合学校多学科优势,从理论层面、学术层面、非政府层面进行探索,特别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成都市的改革和发展纳入全球视野,从构建有显示度、有标志性的全球新型城市的目标进行构思和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处在新起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只要我们秉承“极乎高远而底乎平实”的优良传统,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勇于承担自身历史使命,借鉴各国成功经验,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一定能跨越发展、迎头赶上,其中的佼佼者就一定能快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5期

高校 博览

中南大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

中南大学将从2008年新生开始,全面实施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改革,将学习自主权全面交给学生。这是该校着力打造培养高新拔尖人才大学的重要步骤。

该培养模式的特点是改变了以往许多大学教育的一般规则,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无论是入校前还是入校后,学生都拥有广泛的学习自主权。

一是学生拥有自主的专业选择权。该校将现有的78个专业整合为33个招生大类发布招生信息。学生入校学习一段时间对各个具体专业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相关专业。





二是学生拥有学习的自主选择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选修本专业以外的课程,并可自由选择修课的时间,还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授课老师。

学生还拥有毕业出口方向的自主选择权。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方向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方向。

为了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该校将成立荣誉学院,对优秀生实行更加灵活的特殊教育。进入荣誉学院学习的学生,不仅将获得相关荣誉,还将有相应的因材施教学习计划和专门档案,一些学生还将被交流到境内外的相关高校参加学习。

该项改革还未实施,已经得到广泛认同。湖南省考试院一位工作人员说,改革将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并使教师感到压力巨大。

作者:白祖偕 来源:中新网 2008年6月10日

暨南大学全国首开应急管理专业

6月11日从暨南大学2008年招生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缓解国家应急人才的紧缺现状,暨南大学今年在全国首开应急管理专业。

据暨南大学副校长贾益民介绍,新开设的应急管理专业今年面向广东招生100人,主要培养具有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初步掌握应急管理知识体系,能够在各级政府应急管理专业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管理并擅长危机评估和应急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新开设的应急管理专业目前暂作为行政管理的一个方向,待教育部的最后审批完成后,将以独立本科专业的形式招生。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林毓铭说,根据暨南大学师资优势特点,以及政府危机干预和处理的要求,应急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公共卫生安全模块,二是灾难安全模块,课程覆盖管理学、新闻学、社会学、信息管理等多学科内容。而教材的编写工作将邀请全国知名学者专家参与,并将组织翻译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相关教材。

为加强师资力量,暨南大学已经选派一批教师赴美国进修,并将持续对相关教师进行国内外交叉培训。该专业将设置全英语教学的课程体系。

作者:郑天虹 来源:新华网 2008年6月11日

国内高校主办的首份综合性人文社科英文刊创刊

《复旦学报》英文刊于2004年底创刊,2005年至2007年以书代刊的模式共出版9期。2007年下半年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取得刊号,自2008年始,作为正式期刊(季刊)出版,从此进入了正式发行阶段,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份综合性人文社科英文刊物。近日,英文刊创刊庆典活动在该校隆重举行。

一、提高办好英文刊的认识,落实政策扶持和硬件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远远落后于国际地位。图书出口是一个国家对外文化影响的重要指标,而此项贸易在我国总体贸易中存在巨





大逆差。面对这一瓶颈,该校认为,出版和出口优秀的文科类英文学术刊物,以学术界为渠道扩展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学校提出,《复旦学报》英文刊要充分展示中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尤其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表达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和世界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观点,搭建与外国学者交流的平台,开创有中国特色的英文学术期刊的新路。

为此,学校将创办《复旦学报》英文刊作为传播中国学术文化、增进国际交流的重要举措来抓,作为扩大学校国际影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工作来抓。一方面,在配套硬件上,除保证办刊经费外,还提供了四间总计8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和一间50平方米的资料室,并逐步购置积累有关图书资料。另一方面,将《学报》英文刊的出版纳入了《复旦学报》(社科版)“名刊工程”建设,并广泛征询国外专家学者意见,建立网络国际审稿体系,使学刊自诞生之日起,在刊物性质、版面设计、文章内容和英语语言表达等方面进一步体现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更加贴近国际读者的需求。

二、积累办刊经验,做优做强《学报》英文刊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学报》英文刊积累了大量办刊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办刊基础。

1. 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编辑团队。通过招聘、选拔和工作实践,《学报》英文刊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稳定的编辑团队。现有包括主编、专职编辑、兼职编辑、特约评审员在内成员共7名。根据工作实践,编辑部制订和完善了编辑工作制度和规范流程,使工作逐步走向有序化、规范化。

2. 聚集了一批多学科分布的作者群体。英文刊启动以来,通过各种渠道,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师进行联系并征稿,仅05、06两年就收到校内稿件近200篇。05年下半年开始把作者群扩展到校外,面向全国征稿。同时,编辑部还定期邀请有英文写作能力、学术研究有基础的学者开展研讨活动,主动为英文刊培育作者群,进一步保证稿源。目前,英文刊的编委会、学术委员会也已组建完成。

3. 初步建立了英文刊电子数据资料库。鉴于期刊电子化的长远发展趋势,《学报》英文刊十分注意对各种数据资料进行电子化整理,包括文稿全文电子版、刊发情况、作者及评审专家信息等,从而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电子数据库。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08年6月10日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成立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6月7日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据了解,该研究会的宗旨是: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研究,以及教育教学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充分发挥科学认识世界、创新理论、服务社会等功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和造就一批中青年学者,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作贡献。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表示,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新局面,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引领作用;要把加强和改进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作为学科建设的工作重点;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作者:刘丹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8年6月8日





思想
政治
教育

周济：使高校思政课成为让大学生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6 月 5 日上午，教育部长周济专程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为在此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第 7、8 期研修班学员做“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的专题报告。

周济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点是抓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抓教材编写、教师培训和学科建设。认清这些形势、任务和使命，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济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开好，最根本的是要以人为本。要做到让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应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准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二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对大学生成长最有帮助的一门课程；三是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对大学生最具吸引力的一门课程。

周济指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紧紧围绕“以提高思想认识为前提，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教材建设为基础，以教学方法创新为重要环节，以加强领导为保障”。抓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大力加强教学科研组织机构建设，二是要认真做好教师的选聘配备工作，三是要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培养培训工作，四是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五是要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郑树山出席报告会。专题报告会由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主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第 7、8 期研修班近 200 名学员聆听了报告。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08 年 6 月 6 日

李卫红：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是思政教育生动教材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 5 月 30 日在第十三期全国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骨干培训班结业式上说，从拉萨 3·14 事件到 5·12 汶川大地震，青年学生的优异表现令世人感动，这充分说明了这些年来我们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高校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经受了考验，取得了优异成绩。

李卫红说，通过最近这两次事件中“80 后”大学生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强烈的爱国热情、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是正在健康成长的一代，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一代，是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代。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忧患意识，对时代和社会的崇高使命感，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感。

李卫红要求，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着力把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刻苦学习、发奋工作、抗震救灾、支持奥运的实际行动，倍加珍惜我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维



护国家利益。抗震救灾工作中涌现出的众多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正在凝练出的抗震精神,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教材,扎实有效地推进相关工作,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人民军队的教育,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专门安排了灾后心理调适教育专题,还请灾区有关高校的负责人,介绍了灾后学校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安全稳定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截至目前,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骨干培训班,已累计培训辅导员班主任骨干近3000人。**作者:**杨晨光**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31日

建立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机制

沟通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是现代大学管理的基本理念。大学沟通机制体现在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往中,就会产生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们在沟通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更好地实现着教育目标。深入研究高水平大学的沟通机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有效的高校教育沟通机制应该是系统的、多样的、社会的和持续的

沟通无处不在。在学生管理中,正常有效的沟通是学生管理的高境界,事实上,当前大学中面对的许多学生问题大都是由于沟通不畅引起的。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可以使人际关系和谐,顺利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高水平大学都具有有效的沟通机制,这种机制的特征主要反映在活动的系统性、方式的多样性、内容的社会性以及行为的持续性上。

活动的系统性。从沟通的主体方面来说,完整的高校沟通主体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者,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府、家庭、社区、企业、宗教、大众传媒等都要从不同方面参与到大学生的沟通中,共同承担起沟通主体的责任,从而形成大沟通的体系。例如,为了宣扬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政府注意保持与大学的密切联系和沟通,其领导人经常去各大学演讲,与大学生进行直接对话。一些国家还通过遍布全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把民众的宗教信仰巧妙地转变为对政府的顺从,”学生在宗教的影响下加深了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了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至于企业和传媒在大学教育时所进行的沟通活动则更是显而易见。从沟通的过程方面来说,大学教育的沟通活动并不局限于校内沟通,而应是延伸至家庭和社会,即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全过程。如日本通过建立PTA组织,即“家长教师协会”、“母子读书会”等,促进学校和家长的沟通和配合,实现了与高校教育的衔接和交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是对学校教育很好的补充和深化。

方式的多样性。指沟通方式不应是单一说教、讲授式的,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渠道与手段进行。从沟通的渠道方面来说,高等学校应不断探索适应时代发展和符合实际情况的沟通渠道,实现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的结合,课堂沟通与课外沟通的结合,通过课堂授课、情景教学、心理咨询、课外活动、社会服务等多种渠道开展沟通,同时注意发挥新沟通渠道的作用,如大学管理者和教师通过E-mail等网络工具实现与学生经常性的交流。从沟通的手段方面来说,高水平大学往往都会采取灵活运用各种手段,不拘一格开展沟通,运用讨论、辩论、演讲等多种方式方法。美国一些大学还改“秧田式”座位为无讲台的“围坐式”课堂,以此改善课堂沟通环境,他们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堂提问和发言,有些课程甚至规定了辩论和演讲所占成绩的百分比,并鼓励学生单个找教师提问或讨论问题。学生在表达真实想法的同时,也实现了与其他同学和教师的互动。哈佛大学学生公寓集学习、生活、娱乐、健身、交际等功能于一体,“寓教于学”,



“寓教于乐”，成为学生沟通交流的有效载体和平台，使学生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沟通活动，达到“无意识沟通”的功效。

内容的社会性。大学的沟通内容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专业问题或特定问题的，而是围绕核心价值观，包括各个方面的社会内容展开的。从目标来说，大学教育的沟通机制要实现的是社会性的目标，而不是单纯为了解决某一专业问题。如美国高校的专业课教学，要求学生“对任何一门专业课的学习都要回答：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学生根据自身经历和认识作出的回答成为讨论交流的主要内容。学生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进行的沟通活动不仅仅涉及某专业问题，还要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历史、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出沟通内容的社会性特征。应在大学生中普遍开展的社会服务计划，使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直接面对社会，在内容丰富的沟通活动中提高各方面的素质。

行为的持续性。沟通活动不是权宜之计，临时之举，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且又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从沟通的环境方面看，整个社会已形成良好的整体沟通环境和氛围，成为大学开展持续有效沟通的有力条件和依托。在社会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下，沟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高校学生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广泛而充分的沟通。从沟通的条件方面看，沟通实践与理论研究为沟通活动的持续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哈贝马斯的教育交往理论，丹斯的人际关系沟通认同场学说，施恩关于改善沟通关系的自治能力学说等，为大学沟通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西方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也为高校教育各种沟通模式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

二、如何建立有效的高校思政教育沟通机制

1. 树立大沟通的理念，构建网络式的沟通体系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学校思政部门的事，而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共识。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确立“大沟通”的理念。把沟通看作是众多主体参与，贯穿人的学习生活全过程的活动。首先，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沟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相辅相成，而联结整个系统的工具就是贯穿始终的持续不断的沟通。其次，社会各方应共同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形成合力。政府应主动、及时地与高校进行直接沟通，政府领导人有责任和义务为高校大学生作形

势政策报告，并形成制度，将主流价值观及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等及时传达给教师与学生，并认真听取反馈意见，尤其是就当代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开展交流，形成良性互动。家庭与高校应就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经常交换意见，可以建立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定期召开家长会，及时向家长寄送学生在校表现情况，邀请家长参加学生课外活动等，加强学校与家庭在教育中的沟通。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社区、企业、媒体等其他社会力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建立校企联谊会，社会实践基地以及社区志愿者、社区教育中心加强学校与社区、企业的联系，“全力打造多维立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平台，真正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立体性的沟通体系。”学校各部门、各条线应密切联系，协商一致，相互配合，共同构筑良好的校内沟通网络 and 平台。

2. 营造无缝沟通的氛围，形成零距离的沟通模式

“以人为本”是教育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沟通过程的根本要求。沟通过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环境紧密联系的。”要发挥沟通活动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必须创设良好的沟通环境，营造无缝沟通的氛围，使沟通无所不需，无所不在，相处双方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的点滴活动中不断地进行着有效的沟通。具体落实在大学教育中，首先，要减少沟通层级。沟通层级的增多必然导致信息的损耗和失真，在沟通过程中，应努力避免因沟通层级过多而给沟通效果带来的不利因素。



可以说,高校思政教育的沟通应是在所有教育环节中,所有日常生活中,只要是相处、相联系的双方均可完成的行为。一个人不论在何处,不论与何人相处,不论从事何事,都能随时随地进行到沟通。因此,可适当减少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校—院—系—班级—学生”等沟通层级,增加沟通主体与对象直接沟通的机会和范围。一些高校采取的小班制、校长接待日制度等措施就是朝这方面努力的有益尝试。还可以通过实施行政班级与教学班级、行政班级与宿舍区的分离与交叉,以扩大学生相互间沟通交流的范围。其次,要畅通沟通信息。无论是纵向沟通还是横向沟通,都有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资源向一方倾斜的问题,不利于调动沟通双方的积极性和沟通成效的发挥。因此,采取如班务公开、校务公开等一系列措施是必要的。同时,沟通渠道的多样性对保持信息畅通也起到重要作用,要采用多种方式,拓展各种渠道。例如,既可采用定期走访、座谈会、校院长、系主任信箱等正式沟通渠道,也可通过校内BBS论坛、聊天室、周末旅游、野餐、大楼咖啡吧、户外拓展训练等非正式沟通渠道,满足当代大学生的沟通需要,以提高沟通绩效。再次,要充分利用沟通科技。应充分利用现代沟通科技尤其是现代通讯工具,以实现随时随地传递信息,随时随地开展沟通。学校应建立手机短信、视频、校园网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建设,方便师生交流,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真正实现沟通零距离。

3. 强化双向沟通的意识,培养主客体的沟通能力

所谓“双向沟通”就是沟通双方互为主客体,并能在沟通过程中达成有机配合,其最大的特点是沟通双方具有平等性。“在沟通中师生应表现出一种友好融洽的关系。”师生间的沟通,绝不是教师单方面的意愿与行为,不能简单地把教师看成是沟通主体,是教育者,应该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学生只是沟通客体,是被教育者,这样会使沟通双方处于严重不对等的倾斜地位。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把沟通看作是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的意愿与行为,沟通主体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性的前提下,以沟通对象的思想实际和成长成才需要为出发点,实现沟通双方的平等对话。沟通过程的有效完成既依赖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也需要学生的理解和配合。教育者在开展沟通活动时,要加强自身学习,不断完善和更新知识和能力结构,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品质等,形成沟通所必需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教育过程中,要通过相关的训练和养成环节,来强化学生的沟通意识和能力,可借鉴一些高水平大学的经验,在高校中开设有关沟通的课程,如沟通基础、口才与演讲、人际交往等,经常性开展辩论赛、演讲赛等,让师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沟通的意识和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工作量很大,靠少数思政教师很难把沟通做细、做透、做经常。因此,要扩大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尽可能增加师生互动的机会。在高校教育中,导师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可以推行生活导师、学业导师、班导师等不同导师制,以改变无导师,无人管;或有学业导师,但思想教育方面则无人管等状况。

4. 夯实持续沟通的基础,建立长效型沟通机制

沟通学也是一门科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活动是有扎实、丰富的理论指导的活动。沟通是动态的,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进行研究,使之更有针对性。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课题研究。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要大力引介国外有关理论研究成果,多开展这方面的学术交流,探索符合我国高校实际的理论模型和沟通模式。要建立和完善信息传递反馈机制。只有顺畅的信息通道,才能为有效的沟通创造条件。不但在校内要用制度保证上下左右信息畅通,而且学校与企业、家庭、社会乃至政府也要建立一个经常化、制度化的信息传递机制。要建立和扩大保障学生权益的对话机制。沟通不是虚拟的,而是建立在相应的利益追求的基础上的,高校教育沟通离不开学生关心的切身利益,如校内,生活上有伙食、住宿条件等问题,学习上有图书资料、实验条件等问题,教学上有教材讲义、教室条件等问题,面向校外,有就业机会、实践条件等问题,此外还有特殊学生群体如贫困生等。沟通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建立经常性的学生与教师,学生与管理部门,学生与学校、学院领导有关上述问题的对话制度,并应把沟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教师的考核评价中。

作者:浙江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 王宇航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0期



域外
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变迁及其未来趋势
——以美国大学为例

摘要: 美国大学体制中蕴涵着独特的自由教育的精神。基于此,在分析美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体制与教育理念异同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化学术霸权与市场化带给美国大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最后分析了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以期对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由教育, 一流大学, 大学前段不分系

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特征是通过知识创新来创造财富,因而研究发展与知识创新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与生产力最重要的泉源。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扮演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大学中的研究创新是推动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建设以科学研究创新为主要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就成为高等教育改革最核心的工作。研究型大学对国家竞争力有关键贡献的最佳例证就是美国一流大学。美国一流大学研究创新成果与美国在世界知识经济的龙头地位,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或基调就应是:效法美国,打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一、美国一流大学的体制设计及特色

(一) “大学补助”计划

我们以所谓的“大学补助”计划来看。这个计划希望能通过补助方式使重点高校发展成世界一流大学(世界前100名)。然而若比较美国任何一所著名大学一年的科学研究总经费,或比较该大学当年度的校务基金(募款总额),就会发觉,这些补助款(每所学校一年约不足一亿美元)相较于美国一流大学,简直不成比例。而对这些补助经费各高校竞相争取。然而对身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与学术核心地带的美国一流大学而言,这些资金简直杯水车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本是脑力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竞争模式,在我国这样的资本游戏是否可行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美国所谓一流大学之排名与其每年所获得的科学研究经费,两者并不一定有密切的正相关。

(二) “大学合并”计划

我们可以观察所谓“大学合并”的相关计划。这些计划的基本想法在于认定所谓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必定规模很大,学生与师资、设备均十分充足,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因此要求大学合并是达成一流大学的重要武器。这样的看法与美国一流大学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事实上,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并非都很大。



表1是2005年,美国前十名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人数、本科生人数、高中生录取率(即报考本校的被接受率),以及(不含食宿费用的)学杂费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均有极高比例的研究生,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接近1:1;另外,这些学校的高中生报考录取率(被接受率)大约在10%到20%之间,竞争激烈;从学费中可以看出,这些私立学校的一年学杂费大都接近3万美元,若加上食宿费用将超过4万美元。此外,这些大学(全部是私立大学)大多属于规模适中的中型大学(1至2万人之间),只有1所学校学生刚突破两万人,有3所学校人数是人数在1万以下的小型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学生更只有2000余人,这在我国可以说是迷你大学了。

表1 美国前十大研究型大学学生人数、录取率与学费统计

学校名称	学生人数	本科生人数	录取率	学杂费
哈佛大学	20 130	6 635	9%	27 488
普林斯顿大学	6 849	4 837	10%	29 910
加州理工学院	2 172	891	16%	25 335
杜克大学	12 398	6 248	23%	29 770
斯坦福大学	17 823	7 054	12%	29 847
耶鲁大学	11 471	5 354	11%	29 820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	19 428	9 836	20%	27 544
麻省理工学院	10 340	4 112	16%	30 600
达特茅斯学院	5 683	4 098	18%	30 279
华盛顿大学	13 020	7 188	20%	29 700

资料来源: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教育统计报告(2005)[DB/OL]. <http://nces.ed.gov/Pubsearch/pubsinfo.asp?pubid=2006030,2006-08-10/2007-06-01>.

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中,私立学校规模一般比公立学校小。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1年的资料,在全国94所私立研究型大学中,学生人数在5000至9999者有27所,人数在10000至19999者有33所,这两者已占私立研究型大学的2/3左右。人数在20000至29999者只有7所,至于学生人数超过30000者的巨型学校只有2所。由此可见,私立研究型大学的规模绝不比我们想象的大。其实,美国规模较大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学系统中,以2001年为例,在166所颁发博士学位的公立大学中,有56所人数介于2万至3万之间,有29所人数在3万以上。此两者占这些公立大学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样的情况在私立研究型大学中,只占全部的1/10。

这是因为大众教育的责任落在公立学校之上,至于私立学校则以量少质精为原则。一流大学的重点条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这些名校均有高品质的教学与研究团队,有风格独特的办学理念,有跨学科且重视基础学术研究的传统。若一定要说这些学校具有一定的规模,主要不是指人数或资金多寡,而是指它通常有较完整的基础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由于基础学科的学院一应俱全,使得各种研究易于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形成一交叉研究的多学科整合的研究环境。尤其更深具特色的是,这些著名大学大都拥有高品质且深具自由教育传统的本科文理学院,除了为美国研究生教育,也为美国学术界及社会各行各业培育精英人才。





这一点通常为许多欲模仿美国一流大学的其他国家所忽略。舍弃这些内在的主要特色，一味地追求大量资金与扩大规模，并无法真正产生一流大学。

(三) 大学评鉴制度

就有关大学评鉴制度方面，严格说来，要求大学自身办理评鉴、要求大学教师在教学、研究及服务各方面建立起一套评鉴制度，有其必要性。甚至针对学校评鉴的结果进行排名并公布结果供学生及家长，以及提供大学各项支持的政府及企业参考。然而今日我国进行高等教育评鉴的最大问题却是：想要以一套量化的标准粗暴地套在大学学术活动之中，因而引起反对意见及无穷的争议。有识之士均认为大学评鉴应建立起多元化的指标。以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国际期刊引用索引系统（SCI、SSCI、EI、A&HCI）为例。由于教育部近年来将这些索引系统引入作为衡量学校或个别教师研究成果的重要依据，许多学校纷纷订出了教师期刊著作进入国际索引的期刊及高额奖励办法，同时它也成为教师聘任及升等及争取各项补助奖励的重要依据。一时间人人趋之若鹜，俨然成为衡量大学教师的惟一标准。

事实上，SCI等引用索引系统，在英美国家只作为一种数据查询的辅助工具，并非作为学术评鉴之工具。有资料表明，英语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均没有将此系统拿来作为学术评鉴之工具，也未拿来对大学进行排名。而在我国、台湾及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地区中，这些系统则在学术评鉴中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目前我国学术评鉴的发展来看，走向量化式的标准化评鉴模式已是大势之所趋。在所谓向美国研究型大学看齐的心态下，研究压倒了教学与服务，成为学校或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有理由担心最终它会演变成“以研究为导向的单一化排名模式”。事实上，这种单一化排名制度在美国高等教育评鉴中是不存在的。美国高教进行大学评鉴与排名（Ranking）已有很长的历史。然而其始终采行多元化的排名模式（见表2）。

表2 美国关于高等教育的主要排行榜

排行榜名称	主办者
教育排行	《吉尔研究》
哥曼报告	《普林斯顿评论》
《普林斯顿评论》最好的331所院校	《普林斯顿评论》
吉普林在线最好州立大学	《吉普林私人金融杂志》
吉普林最好私立学院	《吉普林私人金融杂志》
《货币杂志》对大学排行	《货币杂志》
国家研究理事会对博士专业排行	《国家学术新闻》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美国最好院校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雅虎网站之美国100所最好学院	雅虎网站

资料来源：范文曜，马陆亭. 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88-189.





以最权威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为例,它每年均公布各种大学之排名:如研究型大学(全国性综合大学)排名、一般公立大学排名、本科文理学院排名、各种不同研究学院之分类排名以及各学科或研究领域之排名等,不一而足。

二、美国一流大学的经验及其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阐明了美国高等教育在体制设计上及其内外环境上所具有的独特条件与优势。所谓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正是这个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今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疑惑,就在于只看到这个金字塔顶端的壮丽,而未能看见万丈高楼平地起。对于身处第三世界边缘地带的我国,我们有什么条件玩起学术霸权的游戏?美国大学的成功,对于我们是否有其值得借鉴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专注于金字塔顶端的华美,还是老实地从根基打起?我们应从管线末端入手,或是应回归基础建设?

答案应该十分明显。我们应该放弃或至少大幅度修正目前欲打造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昂贵计划,引进美国体制中真正值得学习之优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美国体制作为借鉴,彻底改变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效法美国建立一流研究型大学。其具体的政策及做法建议如下。

(一) 应推动大学本科教育向基础教育与自由教育转化,基础学科训练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根基

我国过去长久以来的大学本科教育就有强烈职业化与功利化的色彩。这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研究及创新的竞争力而言是不利的。因为基础学科训练才是为国家培育大量人才不可或缺的一环。以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大学发展状况而言,专业教育或学术研究应移至研究生教育阶段,大学本科应以基础教育为核心。其实,经过近十年向普及教育规模的扩张,目前我国的大学实际上早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与美国的情况相同,而这正是将本科教育转换成基础教育的契机。其具体的做法有以下两方面:1)在大学扩增过程中在本科生阶段应鼓励成立基础学科的科系,在研究生阶段才鼓励筹设专业性系所。尤其公立大学应强制规定如此。目前各大学全都成立具有高度应用性与职业性科系的情况,应深入检讨;2)在现有基础上,我国应特别强化通识教育,尤其让其成为有系统地、基础式地全面学习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的园地,以强化大学生的基础学科之训练。

(二) 在公私立大学中积极推动大学前段不分系制度

这一制度是实施大学本科阶段实施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制度基础,是其排除专业过早介入的必要前提,也是保证学生能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较为宽广的基础教育训练的必要条件。惟有采行不分系制度,所谓通识课程及基础学科训练才能真正成为大学的核心,也才能在课程中具体落实,不会沦为专业系所的附庸,沦为二流师资、营养成分。其具体做法如下:1)公立大学可由政策规定,分院逐步实施一大二不分系;至于私立大学可通过奖励制度来推动,以减少多年来的专业科系的抵制;2)必须有配套措施来辅助,例如鼓励建立寄宿制度、推动学程制、强化导师辅导制度,以及通盘检讨与重新设计基础课程与通识课程等。

(三) 政府应大量补助私立大学与学生家长,以提升私校整体教育品质,减轻学费负担,维持社会正义

在目前无法大量扩充公立大学或成立新的公立大学的情况下,我们应大量补助私立大学以改善整体教育环境。一方面应减轻私立大学学生的学费负担(以目前学费水平,应至少减低至占GDP的15%);另一





方面降低与私立大学目前在教育品质上的差距。让我国的私立大学发展成优质教学的园地,让其成为实施大学平民化教育的园地,以彻底改善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公正现象。具体的做法以下两方面。1) 补助金不应直接注入私立学校机构之中,而应仿照美国的模式,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补助于学生及家长,这样做才真正能使学生本人及家长在学费上受益,而且它也可以防止私立学校将补助金作其他不当用途。除教育券之外,政府亦可提供比现有制度更宽厚的助学贷款及高额奖学金,让一般平民阶级均可以享受此好处。总而言之,补助的实质在于使学生受益。2) 除上述补助模式之外,政府也应视学校表现的实际状况(尤其以建立自由教育为导向的高品质本科教育),提供私立学校大量的奖励。这一部分的奖励金额不应少于政府用于公立大学的各项研究奖助金总额。应由具公信力的第三者成立私校评鉴的法人机构,对私校的教学与其他各方面进行评鉴,评鉴应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大体而言,我国的私立大学大都没有发展成研究型大学的资质,因而评鉴应以教学、服务及辅导为主),评鉴结果成为政府奖助的依据。

(四) 应做重大调整,不再以打造一流研究型大学为目标,而应用于上述各项改进措施之中

与其将这些资金投入所谓重点大学,造成更大的不公,以及教师与学校的抢钱大作战。倒不如将这些经费转作上述改革之用。事实上,前述三个具体政策,第一与第二个政策,基本上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经费,它主要涉及制度与观念的变革,而非涉及资源资金的投入。然而,当观念还未根本调整的可能性时,制度变革容易步履维艰。因此,运用资源投入作为诱因,以引导各大学进行改革,这似乎是个可行方案。例如:鼓励大学本科设立基础学科的科系,凡设立者给予高额资金奖助;凡推动落实一大二不分系的学校,给予高额依此排名给予极高额资金奖励。

三、对北京大学“元培计划”的省思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之改革措施(尤其有关自由教育的改革),在我国极难推行,因为我们缺乏西方渊源流长的自由教育传统,而且功利实用心态以及科系挂帅等现象,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也许不强求在全国的层次上立即推行新政,而是在学校层次上,让学校及老师以实验的方式推动。就此而言,北京的“元培计划”值得我们深思。

2001年,北京大学推出一个大学本科生的改革实验,至今已满四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但迄今一直为我们所忽视的改革实验。这个计划最重要的宗旨在于发展类似美国自由教育精神,以为进入21世纪的具竞争力的大学本科生作准备。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元培计划以如下的方式展开具体运作:1) 成立元培计划实验班,分为文、理两班。并以校为范围,向全国进行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理科招生;2) 录进来的学生,在低年级主要实施通识教育,修习“素质教育通选课”,以及文、理科“平台课”,目的在于让学生在人文、社会、数学与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素质之养成;3) 到了高年级,实施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并以自由选课为基础之学分制,取代了学年制,实行导师制(前三年从22个院系中聘请了28位有经验的教授担任导师)以及弹性学制、自由选择专业制。



从这个计划的基本设计与实施过程看来,它确实与美国大学自由教育传统有很大的相似性。它简直是美国自由教育的翻版,其做法与本文所言的教改方向不谋而合。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来自我国最高学府的改革实验,它代表着有某些我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已体认到的大学改革的真正核心。由于这个实验是出自众所瞩目的北京大学,其后续发展值得全球关心华人高等教育人士的关注。

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邝伟乐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